

目 录

- 嘎达梅林起义轶事.....波·特古斯坤 (1)
- 达拉特旗阿尧尔色那梅伦领导的“独贵龙”运动
.....乌增德 (28)
- 华连、华里雅孙为首的科
右中旗旗民起义始末.....博尔古德作 (43)
葆 定译
- 我是怎样镇压嘎达梅林起义部队的.....李守信 (53)
- 达拉特旗康王父子三代王朝反动统治概述
.....政协达拉特旗委员会 (58)
- 阿拉坦鄂其尔事略.....陶布新 (78)
- 回忆阿王片断.....奇天祥 (90)
- 伊克昭盟“三·二六”事变的一些回忆.....李知非 (102)
- 绥境蒙旗地方自治指导长官公署的始末.....王运昌 (109)
- 我从茂明安旗出走的经过.....额仁庆达赖 (118)
- 我出生前后的热河南部的蒙旗社会.....李守信 (122)
- 内蒙古的“小北京”——定远营.....陶布新 (139)

嘎达梅林起义轶事

波·特古斯

王 坤

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一年间，在哲里木盟科尔沁草原发生的以嘎达梅林为首的广大农、牧民群众，反对达尔罕王勾结奉系军阀放垦蒙旗土地、劫掠人民生计的武装起义斗争，已经过去五十年了。这是一次震惊整个科尔沁草原乃至内蒙古自治区东部地区蒙旗社会的有深远影响的一次英雄壮举。它动摇了封建王爷的统治，打击了封建军阀的势力，表达了草原人民反对封建压迫和保卫广大农牧民生存的意志。嘎达梅林不愧是一位民族英雄。起义部队由于历史和时代的局限，并由于敌我力量的悬殊及其它各种原因，终归失败了。但他们的英勇斗争精神和许多可歌可泣的悲壮事迹，却深深地铭记在人民群众的心中，五十年来一直为人们所传颂。

一、嘎达梅林略历

嘎达梅林，名那达木德，亦名孟青山。蒙古族。他出生于一八九二年达尔罕旗（今科尔沁左翼中旗）塔木格勒的满达日哈屯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里。他的父亲名叫伊德日阿斯郎。嘎达梅林兄弟四人，他排行最小。“嘎达”意为幼子，因此乡亲们亲昵地称呼他老“嘎达”。“梅林”是他的官职。因为他后来做了带领达尔罕旗卫队一百二十名兵丁的军务梅林，所以人们习惯地称呼他叫“嘎达梅林”。

嘎达因为家境贫困，未能上学读书，从小就到外面给地

主、官僚家放牧。

一九〇八年，嘎达十六岁，到达尔罕旗旗卫队里当兵服役，五年后被提升为旗卫队章京（什长）。在他二十五岁那年，被达尔罕王任命为旗卫队的扎兰。这时他深深感到不识字的困难，于是便发奋读书，扩大视野，为他以后兼通蒙汉文打下了基础。同年，他同本旗伊申格勒的台吉（蒙古王公贵族的统称）的闺女牡丹成婚。嘎达结婚后，在西伊申格勒东北十五里的浩林毛都屯买了地、盖了房，把家迁到那里定居，并且雇了四、五个榜青^①的，生活一天天地富裕起来。

一九二五年，嘎达三十三岁。在这一年他被王爷提升为达尔罕旗军务梅林，统领旗卫队的一百二十名兵丁。在嘎达到任的时候，旗里的兵饷断了，旗卫队缺军装，少军粮，已经到了难以维持的地步。面对这种情况，做为小小军事首领的嘎达梅林又有什么办法呢？于是，他就去奉天（今沈阳）请求王爷（达尔罕王经常住在奉天小河沿的王府里）设法维持旗卫队的给养。达尔罕王决定从通辽附近的白音太来地方拨出六十方（方为四十八垧）土地，由旗卫队收租做为给养。

一九二九年，我国的政治形势正处于日本帝国主义大举入侵的前夜，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党所领导的第一次大革命已经失败，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和反动军阀在全国建立了法西斯统治，实行白色恐怖，广大人民被抛入水深火热之中。当时奉系军阀同达尔罕王互相勾结起来，变本加厉地对科尔沁草原上的各族人民进行残酷剥削和肆意掠夺。王爷出卖旗地，军阀强行开垦草原，社会生产力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人们背井离乡，挣扎在死亡线上。嘎达是一个富于正义感的人，同

①榜青：雇工或长工。

情人民的疾苦。他强烈反对王爷和军阀狼狽为奸，侵吞人民的土地和牲畜。

同年，嘎达梅林代表人民的利益到奉天告状，被诬为“犯上”而被捕入狱，判处死刑。不久，在他妻子牡丹的策划下，他被搭救越狱。随后在“打倒测彗局，不许掠夺民财”的口号下，率众起义。

起义后，他坚持武装斗争，转战于昭乌达盟、哲里木盟一带，队伍扩大到千余人。但终因寡不敌众，一九三一年，战死在科尔沁草原黄花敖包脚下的乌力吉木仁河，终年四十岁。

二、主持正义、愤然罢官

嘎达在任梅林期间，经常亲自带领旗兵到全旗各地巡视。每当遇到什么不公道的事情，他总是不畏强暴，挺身而出，主持正义，为人们解除了不少疾苦。

一次，有一个平民在他自己村子附近打羊草。达尔罕王的叔父赛兴阿派来一伙人，硬说那平民打草的地方是他赛兴阿的草场，不让那平民打草，还把他痛打了一顿，抢走了钐刀。这个平民忍无可忍，便找嘎达梅林评理。嘎达听了他的话非常生气，当下派了两个高士格（卫兵）去要钐刀。赛兴阿不但不给钐刀，反而大骂那两个高士格无权干涉这件事情，甚至于动手要打。这时有人飞马跑来向嘎达告急。嘎达立刻乘马来到赛兴阿的家，指着赛兴阿扎赫勒格其（王爷的管家章京）的鼻子问道：“谁给你这么大的权力，人家门口的地也算做你的草场？”赛兴阿仗着他是王爷的叔父，老着脸皮不示弱，闹得双方差点没动起枪来。不过，色厉内荏的赛兴阿到底理亏心虚，在义正辞严的嘎达梅林面前退却了。从此，他再也不敢抢占草

场了。

又有一次，达尔罕旗一个公爷的弟弟名叫那木海大喇嘛，强行要拉走一个平民打的几车羊草，硬说草场都归他们庙仓所有，不许平民割草。这位平民无奈，只好哭哭啼啼地找嘎达梅林诉苦。嘎达为他撑腰，告诉他别理喇嘛的威胁，那木海喇嘛再去挡你，你就叫他找我讲理好了，并且派了几名部下帮他割草。果不其然，没过多久那木海大喇嘛的管事就来找嘎达讲理了。嘎达气忿地对那个管事的说：“谁规定科尔沁的大甸子都是你们喇嘛的草场？这里的土地都属于全旗人民的，他们祖祖辈辈生活在这块土地上，这些土地是属于他们的。你们喇嘛要安分守己，不要横行霸道，危害百姓！”那木海大喇嘛那个管事的被训斥得哑口无言，退了出去。

驻扎在通辽的军阀队伍，经常伸出他们的触角，到达尔罕旗的一些地方强派粮食，赶走牛羊，勒索百姓钱财，闹得鸡犬不宁。人们实在忍无可忍，就找嘎达梅林求救。

深秋的一天，嘎达梅林得知军阀队伍又要出来闹事了，于是他带领一班人马，出外巡逻。当赶到一片黑树林的时候，走在最前面的嘎达梅林的坐骑突然惊起来，竖着两个耳朵，龇着鼻子躲闪，怎么也不前进了。嘎达不知他的马发现了什么，便向四周仔细观察起来。忽然，他发现在密林深处的一棵大树上挂着一个黑呼呼的东西，他立即跳下坐骑，亲自前去察看，原来是个上吊的男子汉，约莫四十多岁的年纪。他急忙抱住死者的躯体，让士兵解开绳索，放到地上抢救。过了一会儿，那人才苏醒过来。嘎达见那人死而复生，格外高兴，急忙把他扶起来。那人自言自语地说：“我是到了阎王殿了吧？请阎王给我做主。”说着，他便双膝跪倒，向嘎达梅林诉说起自己的遭遇：“我是个穷人，家里有妻子和四个孩子。昨天忽然闯来一

队兵马，硬要逼我交出六块大银洋和二斗秫米。要是不按时交付，就让我十七岁的大女儿去顶！我交不起呀，以后我又怎么见我的好闺女，走投无路，就上吊……”他说着就嚎啕痛哭起来，再也说不下去了。这人是个汉族，名叫孔祥。嘎达见这副惨景，问明住处，安慰几句之后，飞身上马，象离弦的箭一般向军阀队伍的驻地奔去。

到了军阀队伍的驻地后，嘎达找到军阀部队的连长问道：“你们到这里来，有何公干？”那个连长为了掩饰他们的卑劣行径，就吞吞吐吐地说：“啊，梅林，我……我们是来找逃兵的。”“那你们就应该把公函拿出来，我们可以给你们抓。”停了一会儿，嘎达见那连长搭不上腔来，就正颜厉色地说：“逃兵，逃到这儿来了，有什么证据？说找逃兵是假，抢掠民财倒是真。以后少折腾点儿老百姓吧！”那连长被训得舌卷入喉，鼓着一对蛤蟆眼睛退了出去，急忙召集部下，灰溜溜地跑掉了。

一九二六年冬，旗卫队的士兵们该换冬季服装了。嘎达梅林让他手下的人从白音太来的六十方地的地租收入中支出一笔款项，做为军服费用，并派人到郑家屯订做军服。趁这个机会，管家曹道、专依达（骑兵里带十七名士兵的小官）图布丹、笔贴式（文书）栋如布等几个头目，背着嘎达梅林私下商定每人做一件上好的细毛大衣。嘎达梅林发现后，立即制止了他们这种做法，并向他们解释：“军服款是按旗卫队人数拨给的，如果我们当头目的每人做一件细毛大衣，必定要多花费款项，拨的款不够了，那么军服不够用怎么办？你们只顾个人，不顾士兵的做法是很不对的。”

这几个人的打算没有得逞，反被嘎达梅林训斥了一顿。于是怀恨在心，伺机报复。他们趁嘎达梅林不在，就在兵营里搞

起聚赌来。当嘎达梅林获悉聚赌的情况，赶快回营房制止并严厉斥责。这些人对嘎达梅林更加怨恨，把他看做绊脚石非要搬开不可。于是，他们在背地里用“磕头拜把子”等手段拉拢一部分人，散布流言蜚语说：“嘎达梅林贪污了做军装的钱”，“由于梅林失职，过大年的时候，兵丁没有能穿上新军装。”煽动士兵反对嘎达梅林，想撤掉嘎达的梅林职务。

第二年（一九二七年）正月，王府举行额格力特楚古兰（开印典礼），旗卫队的十二个专依达带领全部人马集合报到。在会上，曹道管家和图布丹专依达等人，诬告嘎达梅林贪污了军服费，降低了军服质量，要挟王府印务处立即撤掉嘎达梅林的职衔。声称：“不然的话，旗卫队就要拉出去（哗变意）！”当时，虽然经印务处梅林色音勿力吉等人调停劝解，但终无成效。于是嘎达梅林毅然表示：“纸里包不住火，事实真相终会大白。”“今天弟兄们只要不拉出去祸害百姓，我甘愿辞职。”结果印务处根据情况决定：嘎达梅林暂不带兵，一面进行调查，一面呈报王爷定夺。

时过不久，嘎达被叫到奉天王爷府去。福晋（太太）听说嘎达已经来到，就叫人把嘎达唤来，见面之后，福晋对嘎达表现得特别殷勤。原来福晋曾向嘎达提出要把旗卫队收租的六十方土地交给王府支配（实际上由福晋支配），卫队的兵饷再由王府发给。福晋的这一要求当时就被嘎达梅林拒绝了。现在，她觉得时机已到，想通过封官许愿拉拢嘎达，把六十方土地的支配权弄到手。

福晋对嘎达开门见山地说：“你只要愿意为王爷效忠，我不能只凭下面告的状撤掉你的职务，还要你照样统领旗卫队。不过，你首先得跟王祥林（福晋的亲信、王爷的侍从）一起去通辽，把白音太来的六十方土地的租粮卖掉，把款如数交给

我。你只要把这件事办妥，那以后你的事情就好办了。”嘎达听了这番话，心想，我绝不能为了个人的一官半职，断送旗卫队一百二十名兄弟们的军饷。于是他对福晋说：“那六十方土地的租粮，旗卫队已经用完了，很对不起，在这桩事情上，嘎达我不能为福晋效劳。福晋实在需要花钱花，我自己可以尽力设法凑几个钱。”说罢，他立刻离开王府，返回家去。福晋乘人之危想捞一把的诡计破产之后，恼羞成怒，当即通过王爷下令罢免了嘎达的梅林职务，任命其亲信王祥林为军务梅林。

王祥林上任后，嘎达向他交割了军务和财务事宜。清算账目的结果表明，营房反倒欠了嘎达牛、马、粮食和二百块银元。嘎达把营房所欠的牛、马、粮食分给了士兵们。至于那二百块银元，他本来是不想收下的，不过他为了证实他不但没有贪污大家的钱财，还为了大家垫过自己的财物，便收下了。

三、执法遭难，决不屈服

一九二八年，王祥林依仗福晋的权势，把自己的三亲六故安插到重要岗位上，有的做了副官，有的当了稽查。他们用假公济私搜刮来的民财，在郑家屯、通辽、八面城等地置地盖房，闹得乌烟瘴气。

达尔罕王的陵寝在康平县境内。守陵的丁户中，有些人利用陵地发了横财。王祥林对这块肥肉早已垂涎三尺，正在他找不到机会插手捞一把的时候，得悉康平县姓葛的一家砍伐了陵树。王祥林抓住这个机会，便带领旗卫队的四、五十人出发，去康平县葛家问罪。但是，那葛家不让他们进围子。于是双方开火，王祥林打死了葛家的人，攻破了围子。当王祥林打进围子立足未稳的时候，闻讯赶来的康平县县大队的人马便包围

了王祥林的队伍，接着又互相射击起来。终因寡不敌众，王祥林乘夜率队突围逃遁。事发后，康平县告到奉天省政府。省政府当即发函要达尔罕王爷府交出杀人抢劫犯王祥林。王爷被逼无奈，即命王府印务处逮捕王祥林交康平县衙。王祥林做贼心虚，就领着部下潜逃了。

王祥林为了寻找藏身之处，即假借“王府支援张(作霖)大帅”之名，把旗卫队带到大林站准备上火车“拉出去”。旗卫队的士兵们见事不妙，坚持不答应到外地为王祥林卖命，便纷纷逃了出来。声称：嘎达梅林不亲自召回他们，他们就要独自“拉出去”。

在旗卫队即将哗变的紧张情况下，王府印务处无计可施，只好连夜派人请嘎达磋商。嘎达到了王府，先是婉言拒绝，但后来考虑到这事关系到全旗人民的安全和声誉，就应承下来。他把自己的安危置之度外，亲自到出事地点和旗卫队的弟兄们进行谈判，最后把旗卫队带了回来。印务处将嘎达奋不顾身，把即将拉出去的旗卫队又带回来，以致转危为安的功劳呈报给王爷，并要求王爷重新任用嘎达，恢复其兵权。没过多久，王爷下令嘉奖嘎达之功，恢复嘎达的梅林职务，撤销王祥林的军务梅林。命印务处火速逮捕王祥林交康平县归案，借以缓和康平县和达尔罕旗之间的紧张局势，命令嘎达梅林办案。

王祥林企图骗走旗卫队潜逃外地的诡计未得逞后，便带领他的一部分亲信到处骚扰，抢劫老百姓的牲畜到奉天倒卖。嘎达梅林经过周密调查，带领几个精明强干的部下追到奉天，逮捕了王祥林，并送交省警察厅。王祥林的亲信把王祥林被嘎达梅林逮捕送交省警察厅的情况报告给了福晋。福晋盗用王爷的印鉴，在保释王祥林的同时，打通关节，用嫁祸于人的伎俩，反把嘎达梅林逮捕起来投入监狱。

嘎达梅林被捕入狱已经十几天过去了。他的妻子牡丹为了搭救他，奔波于达尔罕旗与奉天之间。然而却被王爷拒绝。没办法，牡丹只好把身上带的银两钱财，连同变卖头面首饰、银镯金戒指的钱都用来买人情、送贿赂，最后通过奉天省政府总算把嘎达营救了出来。但是王爷的福晋并不就此甘心，一方面向王爷“进谏”，一方面责令印务处革了嘎达的梅林职务，又任命她的另一个亲信刘昌林为军务梅林。

坎坷的道路，严峻的事实，使得嘎达得到了深刻的教训。被革职回家后，他深有感触地对牡丹说：“我算看透了这个王府，王爷和福晋是一对吃人的豺狼。我决不肯屈服于他们的压力……”

四、反垦请愿，身陷囹圄

远在一九二二年左右，东北军阀张作霖就同达尔罕王勾结起来，妄图一口吞并达尔罕旗的肥沃土地。那些封建王公们由于生活荒淫无耻、奢侈无度，便利用封建特权，加紧对蒙旗劳动人民进行无止境的剥削。王公所豢养的爪牙们更是一群嗜血成性、贪得无厌的豺狼。他们一方面绞尽脑汁为王爷搜刮民财，一方面挖空心思，中饱私囊。当他们感到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还不足以填满他们的欲望的时候，便在出卖蒙旗土地上打起主意来。而这正是军阀们梦寐以求的。于是，人民的土地被剥夺，被侵占，被非法出卖；广阔的草场荡然无存，牛马羊群无处放牧，人们的生计受到了严重的威胁，被迫离开了祖祖辈辈生息的故乡，孕育他们成长的美丽温暖的摇篮——科尔沁草原。

张作霖为了侵吞达尔罕旗土地，极尽笼络王公贵族之能事。他把女儿嫁给了达尔罕王的大儿子，跟达尔罕王成了亲

家。他还大兴土木，在奉天小河沿修建深宅大院，豪华门庭，做为达王府邸。于一九二八年，奉系军阀在辽原县郑家屯设立了旨在霸占蒙旗土地的“荒务局”。不仅如此，奉系军阀还明目张胆地攫夺辽北荒和西夹荒中间的一带土地做为司令长官的牧马场①。

与此同时，达尔罕王府的那些脑满肠肥、腐败不堪的官员们，争先恐后，各显“神通”，横征暴敛，占地卖地，牟取暴利，大发横财。其中“红运”亨通的莫过于王府的印务扎兰（掌管达尔罕旗官印的官衔）韩色旺了。韩色旺媚上欺下，积极主张卖地，于是晋升为荒务局主任、辽源县蒙汉办事处处长、奉天蒙汉交易委员会会长、省政府咨议。他大权在握，抖擻淫威，欺压百姓，大收贿赂，成了暴发户。

军阀强行开垦土地，王公肆意榨取民财，老百姓被迫背井离乡，卖儿卖女，甚至投河上吊的悲惨景象，是屡见不鲜的。

在王爷、军阀铁蹄下被蹂躏的人们，怨声载道。嘎达耳闻目睹这些事实，面对严酷的现实，对保卫自己的故乡土地的重要性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他不甘于自己的小康生活；他要投身到生活的激流中去。

一九二九年农历正月，军阀强行开荒的测量队即将开始丈量土地的时候，嘎达再也不能沉默下去了。这时嘎达对达尔罕王爷还抱有一定的幻想，企图通过劝谏、说理等方式，促使达尔罕王不出卖人民的利益，对百姓发善心。于是，他跟一个在庙里较有威望也比较公正的大喇嘛一起商定，分别在达尔罕旗

①自郑家屯到白城子铁路线东侧的荒叫“东夹荒”，铁路线西侧的荒叫做“西夹荒”，“辽北荒”是指通辽以北一带的荒地。“司令长官的牧场”位于金宝屯到门达站之间的一带地方。

的舍伯吐、古力本芒哈等地，先后主持举行群众集会。两处参加会议的约有五百多人。会议决定选派代表去奉天向王爷和省政府请愿，要求立即禁止买卖土地和破坏牧场，以保障旗民自由地生息在自己的土地上。与会者纷纷签名，并选出了嘎达、韩曾格嘎力布、张舍楞尼玛和赵舍旺等四人为代表，持请愿文书去奉天。这里需要交代的是，这四名代表中除嘎达真正代表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外，其余三人都代表着在野的闲散王公贵族和上层喇嘛的私利。

代表们到达奉天后，即把请愿书分别呈递给达尔罕王和奉天省省长，并且迫切要求当面陈辞讲理。但那迷恋于享乐和沉溺于酒色、鸦片的王爷、省长又何尝理会过人民的呼声。他们故意拖延时日，拒不接见。代表们终日在王府门庭或省府门前坐候，表示不达目的决不返回。

过了一段时间，省长没奈何便接见了代表们。他盛气凌人地说：“开荒是国家大法规定的，是为了充实边疆。你们反对开荒是一种违反国法的不轨行为。”嘎达毅然决然地反驳：

“你做为一省之长，口口声声以国法压人。请问，蒙古民族现在居住的地方算不算中国的土地？蒙古族人民算不算中国人民？你们以充实边疆为名，任意草菅人命，强占蒙古族人民的土地，掠夺蒙古族人民的财产，土地无法耕，牛羊喂不肥，使人们背井离乡，流离失所，要说违法的是你们，而不是我们。”省长无言以对，便悻然拂袖而去。

软硬兼施向来是统治阶级对付人民的惯伎，达尔罕王也不例外。当他感到他那拒代表们于门外的“不理睬政策”失灵之后，就指使韩色旺等人出而利诱嘎达，说：“只要嘎达梅林你领头回旗，再不阻挠开荒，王爷情愿送给十方子好地和一万块银大洋。当然，对其余三个人也不会亏待。”嘎达为全旗人民利益

而奔波的意志，坚如磐石，他的信念并没有因重利引诱而有丝毫动摇。但另三位代表却因为来奉天已有数月，事情茫无头绪，就想“借高骑驴”，就此回家了。嘎达为了稳住他们，便对他们说：“我们来这里请愿是为了保全蒙古族人民的土地、牧场，而不是为了一己之利。我们是代表全旗人民前来请愿的。如果就这样一事无成，半途而废地回去，那怎么向在水深火热之中期待我们的乡亲们交代呢？”在嘎达的耐心说服下，他们又继续坚持斗争。

软的不吃再来硬的。王爷和福晋见诱骗不成，就施展起高压手段来。他们叫韩色旺代表王爷到奉天省政府，请求逮捕反对王爷、阻挠出荒的嘎达等人问罪。于是，在是年农历七月二十七日深夜，奉天省警察厅的巡警奉命逮捕了嘎达等四人，关押在警察厅。一个月后，即于农历八月二十七日，又把他们四人押解到达尔罕旗，投进王府的笔切根格勒（印务处）监牢里。

五、营救越狱

嘎达被投进监牢后，福晋和刘昌林为了更加肆无忌惮地剥削压榨广大劳动人民，决心要拔掉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他们急不可耐地对嘎达下毒手了。

跟嘎达一起被捕的那三个人，被另眼看待，自由自在地住在优待室里。赵舍旺是温都尔王府的包依达（管家），关押不久被保释了。韩曾格嘎力布是宋公爷的包依达，张舍楞尼玛当过胡硕梅林（管旗务），他们都是当时社会的上层人物。而且他们抗垦的目的与嘎达不同，是为了牟取私利，因而先后被分化瓦解了。唯独嘎达一个人被关进黑牢里，忍受着种种折磨。

新任军务梅林刘昌林，奉福晋密旨将嘎达毒死，并在嘎达的食物中下过毒药。这事幸好被监牢伙夫、嘎达的老相识汉族张师傅发现，给偷偷换掉。张师傅还常常趁送饭的机会，把外面的情况透露给嘎达。

有一次，刘昌林等人为了杀人不露痕迹，策划用满口袋沙子压死嘎达，然后诡称嘎达在牢中病死。张师傅知道这一阴险毒辣的阴谋后，立即设法告诉了嘎达的妻子牡丹。牡丹得悉嘎达的生命危在旦夕，便急忙以探狱为名，会见了嘎达，密商了越狱事宜。

越狱，谈何容易。要使嘎达顺利越狱，就必须细致、周密地做好一切准备工作。

牡丹的唯一亲生女儿——五岁的天金良，前几个月因患麻疹死去了。现在最使她操心的倒是从娘家带来的两个尹吉（从嫁的女侍役）。她们都十五、六岁了，带在身边，显然是累赘；送给别人抚养，不但会株连人家，甚至会因此而暴露劫狱的意图，误了大事。

正在牡丹左右为难，一筹莫展的时候，从扎萨克图旗（今科右前旗）来了一位老人。这位老人叫官布舍楞，曾在嘎达当梅林时为营房放牧过马，对嘎达的为人深为敬服。他听说嘎达被捕入狱，便远道而来，想为搭救嘎达助一臂之力。当他听了牡丹的苦衷后，不但当即坚定地表示把那两个女孩子带回家去照管，而且为牡丹的劫狱计划出了不少好主意。

有一天牡丹把过去给嘎达当过警卫的丹日布、嘎达的侄儿阿木日楞贵（他虽只有十九岁，但机警而有胆量）和嘎达的好友、能骑善射的斯楞格等人找来，讲了营救嘎达的打算。来的人们听了牡丹的话都一致坚决表示要舍身营救嘎达。牡丹便秘密地准备枪支弹药。为了把准备的情况告诉嘎达，牡丹便悄悄

来到王府，又以探狱为名见到了嘎达。她把准备的细节一一告诉嘎达后，嘎达对群众的支持深为感动。最后嘎达吩咐牡丹，赶快行动，里应外合，随机应变，绝对保密。

一九二九年农历冬月十日这一天，牡丹忽然听到军务梅林刘昌林带领全旗卫队剿匪去了，估计五、六天后才能回来，这真是天赐良机。牡丹把十响的匣子枪掖在腰上，穿上大皮袄，又探监去了。那天，值勤的笔贴式哈斯敖其尔和牢头宝音乌力吉二人，对突如其来的牡丹说：“你探嘎达也来得太勤了。军务梅林刘昌林去剿匪之前已有严令，不让嘎达同外人接触。你以后不要再来了！”牡丹意识到暗害嘎达的期限逼近了。但她表现得很镇静，说：“我知道上面管得很严。可我已经来了，不管怎么说，两位大哥还得赏点面子，让我跟嘎达见一面……。”那两个人拗不过，又看她是个妇女，就让她到牢里去了。牡丹见到嘎达后，把带来的手枪交给了嘎达，并约好在十三日半夜劫狱。牡丹走后，嘎达在狱中积极争取看守士兵，准备越狱。

到了十一月十三日那天，牡丹以祭祀祖宗为名，杀猪宰羊，请乡亲们来喝“博力根阿日黑”（吉祥酒）。席间，牡丹对乡亲们说：“梅林为了蒙古族人民的利益，反抗王爷勾结军阀出卖土地，请愿未成，反而被捕入狱。现在他性命难保，所以我决计今晚劫狱，营救嘎达。”接着她又说：“我这是被迫而为，绝不是为非做歹。”乡亲们听了她的话，非常激动，纷纷要求参加劫狱行动。牡丹担心人多容易暴露目标，同时也不需要那么多人马，便谢绝了大家的要求，只留下事先约定的丹日布、阿木日楞贵等七个人，准备到时候行动。

黄昏时分，天色骤变，北风呼啸，白雪漫天，离几丈远就看不见人影。牡丹等八个人顶风冒雪地跑了三十里路，来到笔

贴根格勒监牢附近。他们按照预定计划找了个僻静地点，留下两个人做“马桩子”。阿木日楞贵，丹日布等五人摸到监牢外面大墙下，准备接应嘎达越狱过来。只牡丹独自一人，暗藏手枪，阔步闯进了营房。

正在暖烘烘的屋子里躺在炕上抽大烟的笔贴式哈斯敖其尔和宝音乌力吉二人，被牡丹突然的出现，弄得瞠目结舌，不知所措。牡丹走到他们跟前心平气和地说：“二位大哥，不要见怪。我这次来不是为别的，今夜我要解救受难的嘎达。望二位多多关照，开开牢门把嘎达放出来，以后我们一定好好报答你们的大恩大德。”那两个人现在已经镇定下来了，听了牡丹的这番话，就一骨碌坐起来大声喝道：“胆大包天的女人，竟敢说出这样的大话！简直是目无王法！”牡丹见这两个家伙不吃软的，便倒退一步，“嗖”地一下掏出手枪，对准了他们说：

“你们能吓唬我牡丹，但这小玩艺儿可不怕你们诈唬！快滚下来，给我去打开牢门！”那两个人只好乖乖地爬下炕来，领着牡丹来到监牢，打开了牢门。

嘎达自从跟牡丹约好越狱的事情后，为了争取看守士兵的同情，避免在越狱时发生冲突，就给他俩讲《三国演义》，讲抗暴的道理，讲得两个看守象是着了迷。这天夜里，嘎达正给他们讲得津津有味，突然牢门大开，牡丹拿手枪逼着两个监牢的头目，闪了进来。见了这意外的情景，两个看守早已失魂落魄，跪在地上磕头哀求饶命。嘎达见了这副情景，就对他们说：“弟兄们，我要出去了。咱们一无仇二无冤，只要你们不阻挡我，我绝不为难你们。”说话间宝音乌力吉和哈斯敖其尔跪着给嘎达解下手铐、脚镣。嘎达为了越狱安全和为看守减轻“罪责”，就把手铐、脚镣拿来给宝音乌力吉扣上，然后把这四个人锁在监牢里。嘎达出来后，找到跟他一起坐牢的韩曾格

嘎力布和张舍楞尼玛二人，约他们一块儿出去。但这两个人却迟迟不动。嘎达看出他们不愿意跟他一起走，便跟牡丹来到大墙下面，攀着从外面投进来的绳索，越过高墙，同墙外等候的弟兄们胜利会面。

六、反垦起义，众望所归

嘎达梅林被营救越狱后，第二天走到一个牧铺前^①。他们便在这里一边烤火，一边商讨今后的行动计划。他们知道刘昌林决不能善罢甘休，一定会马上带领旗卫队跟踪追来。为了暂避一时，嘎达等人决定：即刻离开达尔罕旗，先奔向洮南一带，打击东北军的零散小股部队，补充枪支弹药，扩充人员马匹，建立一支强悍的抗垦军，跟王爷和军阀斗争下去。嘎达见弟兄们都愿跟他同甘共苦并肩战斗，激动地说：“只要我嘎达活在世上一天，就坚决不让王爷出卖土地，坚决抵抗军阀蹂躏科尔沁草原！”

嘎达等人按照既定行动计划，向洮南进发了。但没走几里路，就发现驻扎在胡力罕苏木庙^②的扎木苏、希日布等旗卫队的头目，带领三十多个骑兵迎面扑来。嘎达便带领大家弃道钻进森林。但是，对方已经发现他们，纵马追了过来。这时，牡丹的坐骑突然打了前失，连人带马滑倒在斜坡下的深雪里。嘎达急忙拨转马头，回来救她，但已来不及了，结果他俩双双被擒。

当扎木苏、希日布认出被捉住的竟是关在监牢里的嘎达梅

①牧铺：牧民们放牧时住的木房子。

②胡力罕苏木庙：是达尔罕旗的一座拥有千余名喇嘛的大寺庙，旗卫队的一部分人马驻扎在这里。

林和他的妻子牡丹时，非常惊讶。嘎达见他们惊呆了的神色，断定这些人还不知道他越狱的事，就撒了个谎，说：“你们不要惊奇我们的突然遭遇，王爷发善心把我们放了，我现在奉命和弟兄们去打那些军阀狗腿子。由于弟兄们误认为你们是土匪，才故意躲开的。”扎木苏和希日布听了嘎达的话，将信将疑，可又没有别的办法，只好放开嘎达让他去找逃散的弟兄们，而把牡丹留下来，做为人质。

扎木苏、希日布等人在野外等了很久，不见嘎达返回，方知中计，就要把牡丹送交衙门处理。牡丹见事不妙，便决定干脆直说，晓以利害。她说：“嘎达是我搭救逃出了监牢的。现在你们把我送交衙门，我不怕。我担心的倒是你们。将来衙门问起你们为什么放走主犯嘎达，只把我送到衙门时，你们将怎样回答？”听了牡丹的这番话，扎木苏真有点儿目瞪口呆，不知所措了。他想：王爷要是知道我放走了嘎达，非但领不到赏，还会被捉起来问罪。他在跟希日布商量后，就把牡丹带到附近的一个屯子里留下来，然后带着队伍悄悄离去了。

嘎达离开扎木苏、希日布的队伍后，在寻找弟兄们的路上，遇见了一位名叫王春的汉族老乡。王春很早就敬慕嘎达，并同情他为了达尔罕旗蒙汉人民的利益而到处奔波以及现在的处境。王春劝嘎达在他家休养几天，好观察形势，再作定夺。嘎达同意了，便到王春家住了下来。几天后，刘昌林带领旗卫队到胡力罕苏木庙和北山一带搜寻嘎达。他们到处张贴通缉嘎达告示，悬重赏缉捕嘎达，但是没有一个人肯用嘎达的头颅去换取奖赏。相反，在王春的帮助下，没过多久，牡丹同嘎达相会了。接着嘎达又与失散的弟兄们秘密地取得了联系。

又过了一些时日，通过王春的推荐，嘎达结识了白龙。

白龙是一位富于正义感的汉族人。他率领一些被王公贵

族、地主老财逼得走投无路、背井离乡的汉族人和少数蒙古人聚众起义。白龙同他的部下，对嘎达是很敬佩的。他们的民族成份虽然不同，但是他们的敌人是共同的。经过磋商，他们合在一起干。王春老汉为他们的合作而高兴，并且自告奋勇参加了他们的队伍。队伍扩大了，大家推选嘎达做头目，人们依然亲切地称呼他为“嘎达梅林”。

嘎达和白龙合伙后，当众宣布：合作不是当土匪，而是为黎民百姓除害。于是在“打倒测量局，不许抢掠民财”的旗帜下，一支强悍的起义部队，驰骋于广阔的科尔沁草原。当时在达尔罕旗的地面上，大批测量队的人员，在垦荒军的武装保护下，强行丈量地，使得农牧民携儿带女，离开他们祖祖辈辈居住的地方，奔走异乡。王府的那些贪官污吏们，眼看人们逃荒殆尽，便加紧强行征收、摊派各种各样的赋税；奸商、地主和高利贷者，怕债户走掉，也一起逼上门来讨债；加上那时迫近旧历年关，天寒地冻，人们吃喝无着，种种灾难有如泰山压顶，一齐临头。就在人们处于这样危难境地的时候，嘎达梅林的队伍打过来了。他们勇敢地打击垦荒军，赶走丈量土地的测量队，拔掉测量旗帜，毁掉地界牌子，撵走地主、恶霸和高利贷者与奸商。

农历十二月的一天，嘎达在胡力罕苏木庙的群众集会上，讲明了他率众起义的宗旨和斗争决心。号召大家和他们一起抗荒、反抗王爷和军阀，保卫土地，保卫家乡。

义军反抗开荒、打击恶霸、惩罚奸商的消息，飞快地传开了。穷苦人民奔走相告，都感到有了出路。嘎达的队伍所到之处，群众象迎接亲人一样欢迎他们，招待他们。有的人主动前来送情报；有的人自愿支援枪弹、马匹；有的人还报名参加起义军。有些老太太献出她们精致的“查克萨”（护身佛），要

佛爷来保佑义军。

七、义军声势浩大，军阀王爷闻风丧胆

嘎达梅林起义初期的基本队伍，还不到四、五十人。但是，由于深得人心，仅仅一个多月，队伍就壮大到二百余人。除普通穷苦百姓外，一部分被官衙逼得走投无路的官兵、“土匪”和外旗的地方小官吏也来投奔起义队伍。

其中就有前面提到过的希日布。他是达尔罕旗卫队的专依达^①。那次在路上偶然捉住嘎达和牡丹并把他们放走的事，让军务梅林刘昌林知道了。因此，刘昌林准备逮捕希日布问罪。当希日布发现刘昌林的阴谋后，就带了六、七个人，投到嘎达的队伍里来。

博王旗（今科左后旗）有个台吉，人们称他为官布达^②的，原是博王旗的一个努图克（区）达。有一年，在他管辖的地方发生过一个行商被盗的事件。事发后，郑家屯的一个大商号的掌柜向博王旗的军事统领额尔敦必力格（汉名包善一）行贿，诬陷官布达同那起被盗案件有关，要他赔偿全部损失。威胁他如不赔偿，就要捉去问罪。为了这桩冤枉案子，官布达便跟那个大商号掌柜的打起官司。长时间的官司，使得官布把家产都折腾光了，弄得一贫如洗。结果不但没打赢官司，反让那个大掌柜的把他的十几岁的女儿强占了去。于是官布被迫铤而走险，带领他手下的几个人，杀死了那个大掌柜的，救出了女儿。此后他便拉了一帮人马，举行了武装暴动，同额尔敦必力格对抗起来。

①专依达：满语，相当于现在军队中的排长。

②官布达：官布是人名，努图克达，即努图克的长管、首长。

他们打了几次仗，但最后因寡不敌众，于一九二九年底，率领其部下二十余人投奔了嘎达。

还有一个欠债户，因为还不起债，他那仅有的一头耕牛被恶霸强行拉去，他的妻子也被那个恶霸奸后霸占了。他有理无处说，有冤无处伸，在他内弟巴雅尔的带领下，投奔嘎达参加起义。

汉族老汉孔祥，由于交不出六块银大洋和二斗秫米，女儿差点儿被军阀抢去，他自己被逼上吊寻死，被嘎达救活（前面已有叙述）。当时孔祥的女儿已经长大，并且是个聪明伶俐、俊俏能干的女孩子。她生长在蒙古族聚居的地方，会说一口流利的蒙古话。

反动军阀的一个连长看上了她，就经常来找孔祥的麻烦。于是孔祥老汉一来为报答嘎达的救命大恩，二来为女儿找个归宿，几次寻找嘎达的队伍，亲自把女儿交给了牡丹。牡丹非常喜欢她，把她当做自己的妹妹留在身边，并且给她起了个大号，叫做金花。她们平时都女扮男装，牡丹常常亲自教金花骑马打枪，并且发给金花一支“六轮子”手枪。金花显得更加英武飒爽了。

起义队伍在迅猛发展、壮大，到一九三〇年初，义军队伍已壮大到五百余人。他们同王爷和军阀展开了殊死的斗争，主动出击，奔袭于千里草原，转战于西拉木伦河两岸。他们越战越强，敌人望风披靡。关于这一点，从当时官方报刊也可以看到：

扎鲁特左旗，因地处极边，东与辽属达尔罕旗接壤，西与察属乌珠穆沁旗暨外蒙古毗连，故盗匪出没无常。……近二年来，因警力单薄，匪势仍猖獗，去冬有大帮马匪孟梅林、洪顺等，率众由达尔罕旗串入境内，始仅三百名，巡扰边境。嗣各股合伙，愈集愈多，迩来竟增至六、

七百人……本地蒙汉警兵，虽经年兜剿，祇以人少、势微，枪弹不济，莫能御制。

（民国二十年三月二十三日《蒙藏周报》第六十五期）

这里所说的孟梅林就是嘎达梅林，因为他汉名叫孟青山。这里所说的洪顺，原是一支“流子”的头目，后来跟嘎达梅林合伙，为嘎达梅林义军的一个首领。从这个报道中，我们不难看出义军之迅猛壮大，敌人“莫能御制”的情形。

一九三〇年的初春时节，荒务局主任韩色旺配合奉军派来的垦荒军，领着测量人员，选择了达尔罕旗境内的架马吐、舍伯吐和白音太来等三处肥沃的地方，强行丈量土地。正在人们走投无路的时候，嘎达梅林的队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袭击了垦荒军，赶跑了测量队，毁掉了地界牌子和旗子，烧毁了地主、恶霸、高利贷者和奸商的账簿、契约，没收了他们的不义之财，为穷苦百姓报了仇，雪了恨。

是年农历三月中旬，荒务局主任韩色旺又带领测量队的一部分人员，在垦荒军大队人马的保护下，窜到舍伯吐一带丈量土地。嘎达梅林闻讯后，带领起义军，日夜兼程赶来，把他们团团包围。

韩色旺是个专横跋扈、自命不凡的人。他认为自己的队伍枪弹充足，人马齐全，垦荒军又是奉军里的精锐部队，而嘎达梅林的队伍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因此根本不把嘎达放在眼里。但是战斗打响后，嘎达梅林声东击西的战术，很快把敌人消灭了。在这次战斗中打死敌人九人，俘虏五人，缴获大小枪支二十余支、全鞍马二十几匹和一分子弹，以及大量测量仪器等物资。被俘的五个人里，有韩色旺带领的测量队三个人，有垦荒军的两个人。嘎达梅林只没收了他们的枪支、弹药和马匹，在警告他们不要再干祸害百姓的事之后，予以释放。

在这次战斗中，起义军虽然伤亡很少，但嘎达梅林却沉痛地失去了他的得力助手机智勇敢的炮手丹日布。

在斗争中，起义军得到了锻炼，士气更加高昂了，战斗力更强了，粉碎了刘昌林带领的旗卫队的多次“围剿”。

达尔罕王见旗卫队屡遭失败，又采用福晋和刘昌林的好计：让嘎达梅林的莫逆好友管旗章京巴珠尔去劝降嘎达梅林。席间，当嘎达听出巴珠尔是来劝降以后，就愤怒地说：“你我过去确实是好朋友，但现在你是替我的敌人王爷和军阀说话，企图瓦解我的队伍。根据我们的规矩，本应把你当作奸细立即处决，不过看在我们过去友情的份上，给你留下一条命。回去告诉他们：嘎达铁了心，要斗争到底，决不让王爷卖地，只要我嘎达活在世上，他们就休想出卖‘西夹荒’和‘辽北荒’！”巴珠尔听了嘎达梅林的话，吓得面色如土，连声应允而去。

正在义军到处打击垦荒军和测量队的时候，嘎达梅林得到一份重要情报，王爷已请求东北军派大部队配合旗卫队，来围剿起义军。为了应付新的局面，嘎达梅林决定招纳当时在地方上活动着的“流子”，壮大力量，联合抗击敌人。而当时那许多大股、小股的“流子”，互无联系，有被官兵各个吃掉的危险。因此，他们也愿意跟嘎达梅林合伙，接受嘎达梅林的领导。没过多久，玉山、黑塔、高山、天龙等为首的大大小的“流子”归顺了嘎达梅林。到一九三〇年秋，嘎达梅林的起义队伍已扩充到了一千多人。但是敌人也部署停当，一场严酷的斗争开始了。

八、反动大军围剿，义军终归失败

达尔罕王在软硬兼施的伎俩都遭到失败的情况下，便乞求

于东北军阀。在达尔罕王的请求下，东北军阀答应派出军队镇压义军，于一九三〇年底，调动了洮南、白城子、郑家屯、通辽、开鲁等地驻军和守卫军几千人马，配合达尔罕旗刘昌林卫队，展开了空前的大扫荡，拼命“围剿”嘎达梅林的起义军。

当时起义军的处境是十分不利的。敌人大兵压境，起义军本身也存在不少问题：一是起义军虽然发展壮大，但是随之队伍的成份也复杂了。有一些“流子”的头目在同嘎达梅林合伙时，尽管答应不再为非作歹，一致反对卖地出荒，保护旗民的土地和牛羊，可是，由于动机不一，有的为了名利，有的迫于形势躲避风险，一旦有机可乘就不免于出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来。这样就给嘎达梅林起义队伍的声誉带来损失。二是有些人在敌人的威迫利诱下，分化瓦解了。三是队伍扩大了，人数多了，往往在一个村子或者甚至方圆十里、二十里范围之内也住不下，给群众带来很大的负担。最后一点，也是主要之点，从一九三〇年起战事频繁，经三十几个大小战役，嘎达梅林起义中的不少英勇善战的士兵牺牲了，而且还有一部分骨干不幸阵亡，再加没有后方支援，给养奇缺，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困难局面。

面对这种情况，嘎达梅林、牡丹和官布达等义军首领们研究决定：为了保存实力，行动灵活，首领们各自率领所属部队分散活动。大队人马分散后，嘎达梅林的基本队伍只剩下二百人左右了。而这时牡丹因妊娠临产，不能随军作战，便留在老北山里一个可靠人家中隐蔽起来。嘎达梅林的队伍人员减少了，领导力量单薄了，但是他们却以老北山为根据地，坚持斗争，继续主动出击，消灭小股来犯之敌。

一九三一年春，嘎达梅林的起义军在敌人的强大攻势压力下，活动范围越来越狭小了。他们被困在老北山的哲布图、奈

木拉基一带，以险要的地势为依托，用有限的、而且是朋友们援助的一点点子弹，应付敌人的多次围攻。但是，时过不久，连这种被动状态也难以维持了。他们和外边的联系已被掐断，孤立无援，粮食奇缺，子弹几乎打光，形势逼着嘎达梅林必须迅速作出选择：要么维持现状，但这样被动挨打，坐守待毙，最终会导致全军覆没；要么设法突围，这样可以变被动为主动，重整旗鼓，打击敌人。突围虽是上策，但存在许多困难，如弹药不足，部队极度疲乏，不明敌情，行动路线难定等。正在他举棋不定的时候，意外地接到了一份十分重要的情报，使得嘎达梅林喜出望外，下定了突围的决心。

就在同年正月底，官布达的一个高士格，历经艰难，给嘎达梅林送来了官布达的一封机密手书，说：官布达自从同嘎达梅林分散活动后，途经达尔罕旗的舍伯吐、花吐古拉，最后转战到通辽西的茂林苏木庙一带活动。并告诉嘎达梅林，他得到一个确切可靠的消息：达尔罕旗荒务局主任韩色旺已经成了“骑两个头的马”（脚踏两只船）的蒙奸了。韩色旺不但是王爷的宠儿、军阀的走狗，而且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奴才。韩色旺勾结日本帝国主义的特务机关，从奉天秘密领到了“三八”式大盖步枪和弹药两大马车，不久将运到舍伯吐。然后韩色旺就募招兵买马，当什么“兴安军”的司令了。官布达在信中说，切望嘎达梅林带领队伍前往劫走那两车枪支弹药，而官布达将伺机接应。

嘎达梅林同部下商量后决定突围，到舍伯吐补充枪支弹药，打算重整军容，继续战斗。

由于敌人在每一个自然屯都布下了许多军队，而且又占据了交通要道和隘口，所以起义军突围时就不得不日以继夜地边打边走，因而伤亡重大，付出了很大的代价。等到起义军突破敌

人的重重包围，赶到扎鲁特旗东部边界的花结，胡结两个地方的时候，只剩下八十多个人了，子弹也快打光了。于是嘎达梅林便派人到鲁北县（今扎鲁特旗鲁北镇），给县长下了一道最后通牒，限令他在两天之内送来一万粒子弹。不然，起义军将进驻鲁北。

鲁北县的高县长是一个诡计多端的狐狸。他一面满口答应给嘎达梅林提供子弹，一面却暗中遣人向反动军告密。反动军得知嘎达梅林的起义军已经弹尽粮绝，便集中精力布下了陷阱。当嘎达梅林的部队行进到前德木尼·穆达罕苏木庙的时候，遭到了早已埋伏在那里的开鲁军的突然袭击，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肉搏战。

在这一次战役中，嘎达梅林又损失了五十多名战士，他率领剩下的三十几个人，经过阿鲁芒哈（北部沙漠），来到了达尔罕旗境内的舍伯吐东北的黄花敖包脚下。当他登上制高点观察地形时，感到问题十分严重。前面西拉木伦河支流川丁高勒（狼河，即现在的乌力吉木仁河）已经开河，大块的冰排随着汹涌澎湃的水势，奔腾咆哮，强渡是十分困难的。可是后面驻开鲁县的蒙古骑兵——“黑马队”已经追击过来。义军的子弹几乎打光，迎战的可能是没有了。嘎达梅林决计强渡川丁高勒河。

嘎达梅林把大家仅有的一些子弹集中起来，命令部队迅速强渡川丁高勒，他自己留下来阻击敌人。起义军中的神枪手巴布和斯楞格二人，要求留下来，和嘎达梅林一起共同抗击敌人。

部队在渡河，敌人在接近。嘎达梅林、巴布和斯楞格三人，利用有利的地形，阻击着敌人。他们弹无虚发，打退了敌人的几次冲锋。可是渡过河的弟兄们却寥寥无几，绝大部分人连人带马被那无情的冰排吞没牺牲了。这时，嘎达梅林等三人

的子弹也快打光了。敌人渐渐逼近，情况十分危急。巴布、斯楞格坚决要求嘎达梅林抢先渡河。嘎达梅林拗不过，便飞身上马，向河岸驰去。

嘎达梅林来到河边，纵马跳进一道一丈多宽的激流，上了还没有完全开化的冰层上。快到河心的时候，因为那里的河面冰层被前面过河队伍的马蹄压得下沉了，突然，扑通一声，冰层塌陷下去，嘎达梅林掉进河水里，他抛开坐骑，爬到一块大冰排上顺流漂去。

弹雨在呼啸，敌人射来的子弹打在嘎达梅林周围的水里、冰上。突然，一颗罪恶的子弹击中了嘎达梅林，他那殷红的鲜血染红了冰排。

一九三一年春农历二月十二日，为了保护科尔沁草原，为了人民的生存，嘎达梅林壮烈地牺牲了。终年四十岁。

巴布和斯楞格二人，见自己的首领、亲密的战友嘎达梅林壮烈牺牲的情景，用最后一粒子弹击毙冲在最前面的敌人后，便携枪毅然投河殉难。

前往接应的官布达的增援部队，虽然隔河跟敌人接火互相射击起来，但已经太迟了。

因妊娠临产而离开部队暂时隐蔽在老北山的牡丹，已经早产。在嘎达梅林牺牲后，敌人为了捉住牡丹，实行了大搜捕。牡丹不忍看到乡亲们为了掩护她遭到屠杀，便毅然挺身就捕。

嘎达梅林牺牲了。但他实践了自己的誓言——打击了达尔罕王和东北军阀的反动统治，阻止了“西夹荒”和“辽北荒”的开放。科尔沁草原的人们，永远敬仰和怀念为蒙古族人民利益而牺牲的嘎达梅林！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写于通辽

（哲盟政协供稿）

附记：

一九五四年，中央歌剧院的同志为编写歌剧《嘎达梅林》，来到哲盟科尔沁左翼中旗，搜集有关嘎达梅林起义的资料，历时五个月。其间，从长春把嘎达梅林的妻子牡丹请回来，同嘎达梅林的同事、一起坐过牢的笔贴式（文书）韩曾格嘎日布（现住通辽县大林公社济民大队）一起，回顾、口述了以上资料，并作了记录整理。当时波·特古斯同志做翻译，无意中把原记录稿保存下来。以后我们又参照了群众提供的材料和义都贺喜格等同志整理的《嘎达梅林事迹》一书，加以编纂整理，成为现在这个资料，供研究历史的同志们做参考。

达拉特旗阿尧尔色那梅伦 领导的“独贵龙”运动

乌 增 德

达拉特旗阿尧尔色那梅伦领导的“独贵龙”运动，是伊盟蒙旗农、牧民反对封建王公统治的一次较早的武装斗争。由于这次武装斗争有计划、有目的、规模大、时间长，并且基本上取得了胜利，因而对以后各蒙旗反封建统治的“独贵龙”运动，发生了很大的影响

一、“独贵龙”运动的起因

达拉特旗位于伊克昭盟北部，全旗沿黄河两岸共有土地二万五千平方公里。这里土地肥沃，牧场良好，牲畜多，并较早地发展了农业生产。全旗原有蒙旗人口六万多人，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汉族人口日渐增多。全旗在旗政府以下，分八个参领区①，各设甲浪（亦称参领）一人；共有四十个苏木②，各设章盖、孔夺各一人。

民国初年，达旗王爷是逊博尔巴图。此人从小不好读书，骄奢淫逸，宠信坏人，吃喝嫖赌，无所不为，特别是好女色。他自宣统元年继承扎萨克后，为了满足其腐化生活的需要，大

①参领：见43页注②。

②苏木——旗下一级军事、行政单位，汉语称佐，相当于乡。

量放垦、出租、出卖土地，一次就将河套地区约三百顷土地租给王同春。这样，到民国初年，全旗牧场即已开垦了80%。蒙民放牧日感困难，被排挤到深山、沙窝里。牲畜大量死亡，再加苛捐杂税繁多，人民生活困苦不堪。在逊王上台前，该旗本来就有很多苛捐杂税，如扎萨克进京费、朝贺费、敬神费、嫁娶费、埋葬费、修建费等，年达四五万元；逊王上台后又新增加养兵费、结婚彩礼费等名目繁多的捐税，人民叫苦连天。

逊王由于生活腐化，好女色，少年即患梅毒，鼻子塌陷，人称“塌鼻少爷”，到四十多岁时，已娶过三房妻子。第三个妻子是归化^①都统文俊之女，生二男一女，长子叫康达多尔济，次子名章巴拉多尔济。后又娶一李姓夫人，生一子名汪庆道尔济（即汪鹏程）。

逊王上台后，宠信坏人，排斥贤良，对王府原有仕官，或加重用，或调离原职甚至强令辞职。如当时的东官府、西官府^②的道济色令、乌力吉巴达尔胡和、承启官达庚子等，对他处处逢迎，则加以重用；有的如加克尔齐^③石劳巴音、西梅伦^④补林特固色等人随声附和，也留任使用；而仕官胡日格、东梅伦阿尧尔色那等主张公道，反对他的胡作非为，则视为眼中钉，予以调职辞退，或待机清除。逊王为便于胡作非为，又把从小就侍候他，顺从他的林德山提为白通达^⑤，作为他的主要参谋。把管家朋色克升为总办，把苍头乌尼尔升为副总办，调明

①归化——亦称旧绥或绥远城——今呼和浩特市。

②东，西官府——亦称协理、协理台吉，辅佐扎萨克掌管全旗事务。

③加克尔齐——即管旗章京在扎萨克及协理台吉指挥下，管理全旗行政、司法和军事。

④梅伦（梅林）——分东西梅伦，承协理及管旗章京之命办理旗务。

⑤白通达——王爷私宅内最亲信的人。

盖（明耀庭）为副白通达，并把展旦喇嘛若格登和树林召喇嘛丹曾等拉到王府作耳目。另外，有个阴险狡猾的娜木尔桑寡妇（与老王爷私通多年，逊王称之为姨姨）常住王府，在逊王面前出坏主意。由于逊王周围有着这么一群人包围，逢迎阿谀，助纣为虐，逊王更是为所欲为，无法无天。

其后，逊王在民穷财尽的情况下，又要大兴土木，扩大新建的王府，并修建方圆四华里的砖城。对此，阿尧尔色那梅伦忠言进谏，劝阻逊王停止放垦卖地，减轻捐税，停止修建王府，以体谅民命。但逊王在林德山、朋色克等的唆使下，根本不予采纳，依然胡作非为，有增无减。

袁世凯当了大总统，宣布蒙旗王公各升一级，逊博尔巴图由贝子晋升为贝勒^①。他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与当时的包头镇守使赵守钰和归绥都统蔡成勋等拉拢勾结，拜为把兄弟，大赠名马财物。民国二年初，北京政府召开五族共和会议，伊盟盟长郡王旗^②王爷年老不能前往，派逊王代表出席，并向袁大总统表示祝贺。逊王进京带了大批礼物，朝贺袁世凯，高呼万寿无疆。袁大为欣赏，加封逊王为御前行走多罗郡王。授予三等文虎章、一等嘉乐章。其随从的林德山也授五等文虎章、双眼大花翎。主仆二人喜出望外，便在北京狂嫖滥赌，花天酒地，还娶了个名妓蔡小娘，命为贞洁王夫人。为了隆重庆贺，还广邀宾朋，张席设筵，并且派人四出大肆搜刮，这就更加激起了人民的不满和阿尧尔色那梅伦等一班正直官员们的反对，从而引起了“独贵龙”运动。

^①满清宗室及蒙古王公爵位分为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将军、公等各等，袁世凯时代还在沿用。

^②郡王旗、扎萨克旗——为原伊盟两个旗，解放后，合并为伊金霍洛旗。

二、“独贵龙”运动的发动

本来，逊王对阿尧尔色那梅伦已衔恨在心，这次逊王新娶贞洁王夫人由北京返旗，大排筵宴，高朋满座，举行庆贺之际，阿尧尔色那盛怒之下，将酒席踢翻，扬长而去，致使逊王气恼非常，必欲致阿于死地而后快。而阿尧尔色那梅伦对逊王也深恶痛绝，下决心组织反抗。

民国初年，外蒙古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①搞蒙古独立时，曾派人来伊盟拉拢各旗王公投靠外蒙。这年九月二十日在昌汗苏巴尔汗召开的盟务会议上，决定派阿尧尔色那梅伦等为代表前赴乌兰巴托复命，向外蒙提出“九条疑问书”，实质上是表示拒绝。阿尧尔色那梅伦完成复命任务后返旗，路经阿什家林召正值举行庙会，旗府派员征收地盘税，并开放赌博。当即被阿尧尔色那强令停止。逊王据报后对阿更加不满，认为他到乌兰巴托复命后，既不回旗述职，而又揽权多事，擅自停止放赌，大大影响王府收入。于是在楚格拉大会时，逊王当众责问阿尧尔色那梅伦过失。阿尧尔色那毫不畏惧，当众进行抗辩，历数逊王的罪恶，诸如不顾人民死活，将全旗公有的草场开放净尽，将河西到河套肥沃土地大量出卖；任意加重负担，迫使旗民无法生存，流离失所；搜刮民脂民膏，任意挥霍浪费，嫖娼纳妓，污辱旗府门庭等等。经此一席揭露，与会不少官员交口称赞，有的甚至公然叫好，只气得逊王面如土色，无言可对，浑身哆嗦。结果，阿尧尔色那梅伦被杖笞四十，气愤之下，托病辞职回家。至此以后，以阿尧尔色那梅伦为首的一部分同情人民的正直官员和逊王的矛盾越来越尖锐，他们积极行动起来反对逊王的倒行逆施。这一天阿尧尔色那梅伦到柴登胡日格

^①呼图克图——蒙语，意为活佛。

家，莽格奈、乌力吉讨格特乎等人也一齐到来，秘密研究如何发动“独贵龙”运动，并决定分头负责联系，计划以柴登、恩克背村为中心，以西联系哈日根图村、宿海图村；以南联系乌美尔庙、速记村；以东联系伊林滩、改改召一带。“独贵龙”总领导下面划五个地区为五个“独贵龙”小组。各个地区均选举了领导人。柴登、恩克背的领导人是胡日格、乌力吉讨格特乎、森盖。乌系阿尧尔色那手下的秘书，文化程度高，口才流利。森盖很年轻，也是旗府的一个文书，胆大好武。哈日根图地区的领导人是阿德牙、朱力吉格，一个当过参领，一个是章盖，均能说能干，很有威望。宿海图地区的领导人，除莽格奈以外，又选了图布什和、乌坝二人。乌美尔庙速记地区的领导人是赛巴彦尔，此人过去给南商^①当过管家，为人老实；还有阿力斌和吉林太二人，都很勇敢。伊林滩地区（现在的新城召滩）的领导人先有乌尼尔，后有贡坝。贡坝过去当过仕官，家资很富，是由中间派转过来的。除此而外，还有选择地吸收了喇嘛界的积极分子阿什泉召的丹生，妇女界代表乌仁吉地。上述这些人在柴登召开了会议，成立了“独贵龙”总部，共同选出阿尧尔色那为总领导，胡日格、莽格奈为副总领导。“独贵龙”还设有秘书、宣教等机构，由吉若格利巴图、乌力吉讨格特乎、补林巴彦、图布升巴彦等负责。

这年冬天，在阿尧尔色那、胡日格主持下，草拟了“独贵龙”的行动纲领和口号，广泛进行宣传；各地还秘密开会，联络群众，进行组织鼓动工作。广大群众积极响应号召，仅三个参领区中五个地区就有二千五百余户牧民参加了这个运动，并拟定次年正月正式宣布起事。从此，阿尧尔色那梅伦领导的达

^①南商——商：蒙语府院的意思。王爷的家族分居后所住府院称作“商”。

旗“独贵龙”运动就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三、“独贵龙”运动的高涨

民国三年春节过后，正月二十日的开印日^①楚格拉会即将来临。全旗仕官及五个参领区的甲浪、章盖等，均携带牛羊、税款、礼物到会，唯独西部三个参领区不见有人报到。这时“独贵龙”派代表前来递上请愿书。代表四人，都是瞎子、聋子、拐子，穿的衣物破烂不堪，一副非常可怜的形象，开口就痛哭流涕地诉说困难。其请愿书内容，大概有如下十三条：

第一条，近年来余旗由河西到河套，优良的牧场全部开垦，将牧民挤到深山、沙窝，致使人民没有扎帐、羈马之地。要求立即封闭草场，归为公有，以利生产。

第二条，自贻穀^②出任将军后，旗的领导与其合谋，大量出卖公有土地，并且变土地为私有，任意出租。要求立即停止出卖和出租土地，追究责任，将出售的价款追回归公，土地今后平分共享。

第三条，废除各种苛税杂捐，减轻人民负担。清朝皇帝退位已有三年，仍征朝贺费、进京费以及人丁差事钱等十余种苛捐，都由王爷私吞。要求立即废除并清算追还。

第四条，近几年另加各种非法负担，如念经费、生孩子百岁费、升官贺喜费、娶妻出嫁费、修盖王府费等等，致使群众不仅将乘马、奶牛变价交纳，甚至将妇女头带手饰都折价掠去。要求立即全部废除。

第五条，王府大量出租土地和占领土地，通过出租放垦年收

^①开印日——即楚格拉大会。是当年第一次大型的旗务会议。

^②贻穀——清朝光绪二十八年至宣统元年的绥远城将军。

入高达四万银元之多，再加巨额粮、面，就连王府所养的狗都吃高标准的粮和肉。王府把平民抓到王府当奴隶，分文不给，还要自带口粮。要求限制王府收入和退回多占土地，引差坐班人应由公费供应。

第六条至第十条，要求废除乱处罚打骂人的不法行为，要求限制养兵，废除捉丫环、拉奴隶、捉役马以及用全家奴差陪姑娘出嫁等办法。

第十一条，民国以来，虽然宣布蒙旗制度不变，但是必须改变王爷一人独裁，要求民主管理旗务。

第十二条，要求立即废除娼妓蔡小娘的王夫人称号，并驱逐出境。

第十三条，扎萨克逊博尔巴图，专横无道，已失德于众，应废为庶人，另立其弟庆贺巴图为达旗扎萨克，以利旗政。

逊王看了这个如同檄文一样的请愿书，吓得面无人色，立即召集亲信仕官开会商讨对策，大家也提不出什么好办法。于是一方面给盟长写报告，说阿尧尔色那鼓动群众造反，同时还给绥远都统和包头镇守使等处写信求援，另一方面召集兵丁，加强戒备。

“独贵龙”方面除向逊王送交请愿书外，还分别呈送盟长、都统和各旗，正式宣布起义。阿尧尔色那召集各“独贵龙”的领导人开会研究，拟订内部制度，联络暗号。制度规定：“独贵龙”运动是民主组织，不设官职，大小领导人均称达尔古^①。有总的达尔古，有地区达尔古，还有百户、五十户达尔古。领导人不向外暴露。还规定“独贵龙”是群众的请愿组织，不脱离生产，加入的人完全自愿，但要遵守纪律，严禁打人骂人和抢劫财物。互相间的称呼，以年龄大小称叔、侄、

^①达尔古——即“官、首长、领导人”的意思。

哥、弟。还规定一些行动的暗号，如向前即后退，后退即向前，散会即集会等等。在西部三个参领区内，还进行了政权整顿，对忠实于王爷和不可靠的章盖、孔夺等人员均予改换，同时明确宣布旧有的不合理的税收负担一律取消。因此，牧民群众非常满意，热情高涨。对于农民方面宣布废除杂税，减少地租，将原来的“二八·五”分租，降为不得超过“一九·五”比例^①。这样，农民群众也很拥护，进而加强了民族团结，积极地给“独贵龙”送粮送草。有些地主、富农，也在大势所趋下，表示投靠，交租交粮。因此，在“独贵龙”的范围内，不仅有二千五百余户蒙古牧民参加，还有三个参领区近一万户汉族农民表示积极支持。由于影响的扩大，河套地区群众也表示支持，由吉拉、达尔玛兄弟二人，带领部分青年从河套自动前来参加，这是“独贵龙”运动的最兴旺时期。

“独贵龙”还建立了自己的武装，由莽格奈担任领导，下面有左格独尔、森盖阿德雅、达尔玛、阿力斌、王玉山等青年分别担任头目。五个地区共组织了二百名武装，筹凑了二十余支步枪，七八十支火枪和刀矛等武器。在数月内，“独贵龙”运动声势浩大，发展很快。但是，由于阿尧尔色那本人领导思想上偏重于讲道理，对武装斗争重视不够，因而强调不脱离生产，没有集结训练部队。造成“独贵龙”后来的失败。

四、逊王派员安抚，“独贵龙”先礼后兵

看到“独贵龙”运动的浩大声势，王爷和仕官们非常着急，连三赶四地报告上级并派人与有关方面联系求援。七月初

^①二八·五、一九·五分租——即地主收租28.5%、19.5%，其余留给农民。

盟长指示：由旗自己进行安抚，以后看情况再说。因而王爷召集仕官们商定，由乌力吉巴达尔胡西官府组成了代表团，进行安抚，实际上是打算去咋唬。双方约定会晤时间和地点。那天西官府和林德山等人，大摆王爷钦差的架子，头戴顶帽，身穿礼服，一行十余人威风凛凛来到柴登召。“独贵龙”的招待场设在柴登召以西的壕赖畔上，群众集会，设下帐篷。代表下马时群众表示迎接，在广滩上铺垫些绿草，有个庆贺斗林老汉，手提开水，向前行了鞠躬礼说：“唉，民等既无草场，又无土地，身负重捐多税，实在穷困没办法，今天官府和林老爷光临，只好垫绿草喝白水吧，很对不起！”代表团对此冷淡态度当然很不高兴。林德山说：“我们奉王爷命令，前来调停安抚。现在召集开会，让你们的负责人前来，官府有重要话讲。”这时，“独贵龙”的男女老少齐声说：“我们都是负责人，请你讲金玉之言吧。”官方代表说：“王爷非常关怀你们，你们搞‘独贵龙’请愿，有些要求是可以解决的，有些要求虽然过分，也是可以商量解决的。王爷宽宏大量，绝不计较，只要你们安分守己，好多问题都能解决。”林德山说：“大总统早已宣布，蒙旗旧制度不变，理应服从原有规章制度。至于卖地放地问题与上级有关，并非出于王爷一人。缴纳税收是公民应尽的义务。娶妻纳妾，是固有的婚姻制度。你们听信少数坏人的煽动，搞‘独贵龙’是不法行为。只要你们觉悟了，老实归顺，还不算晚。现在盟长愤怒，都统不满，要派兵前来，你们如执迷不悟，一旦大兵到来，玉石难分，希望你们再三考虑。”若格登大喇嘛也附和说：“刚才林白官（指林德山）的话很对，劝你们不要做违犯法制的事，应及早投诚。这是我在王爷面前说了多少好话，才得到王爷宽恕的！”

群众听了官府老爷们的这些话，非常愤怒，乌力吉讨格特乎

大喊一声：“谁后退！”这一来，大家一拥向前，大呼：给这些官府老爷们招待“馒头面条”（馒头是打拳头，面条是打鞭子），“吃圪达”（手扭），“骑白马”（压棒子）！刹时间把这些王命大臣、官老爷拉倒在地下，任凭群众惩治。他们高喊救命求饶。若格登大喇嘛也被几位妇女痛痛地收拾了一番。胡日格、莽格奈出来教训他们说：“你们不吃这嘴，不知群众的厉害！快滚回去告诉你们王爷，‘独贵龙’的十三条要求不实现，决不罢休！”这些官老爷被整得头破血流，一个个灰溜溜地逃命去了。

逊王据报后，越发感到坐卧不安，连忙报告盟长，联系调兵，加强戒备。这次斗争由于狠狠打击了王爷的爪牙，“独贵龙”的影响更大了。在王府的下层人员中，也有不少人自动投靠“独贵龙”，从而把“独贵龙”运动进一步推向高潮。

五、阿尧尔色那之死和“独贵龙”围攻王府

逊王派人安抚“独贵龙”没有成功，急忙上报盟长和都统，请派大员调停。九月末，上边派人来到展旦召，通知双方派出代表谈判。在谈判中，根据“独贵龙”请愿书逐条研究。经过一个月的反复讨论，除了十二、十三条外，其余条款都有着落，唯独关于退回蔡小娘和废长立幼两条，王爷表示不能接受。谈判决定过春节后再研究。

盟长考虑“独贵龙”运动如不及早解决，必然要影响全盟各旗，扩大事端，非同小可。民国四年二月间，盟长调去达拉特旗东官府刀尔吉包令商量，让逊王接受废长立幼的条件。但逊王拒不接受，并派人到绥、包活动，由包头调来一团晋军进驻达旗。同时加强保安队，把惯匪二秃子也暗地收容来。这时，头年

派往外蒙复命团的加克尔齐石劳巴音和吉格济扎布等回来了，看到旗里的情况，石劳巴音持中间态度回家养病，吉格济扎布回家后参加了“独贵龙”，充当文书（此人是笔者的父亲，在世时多次给我讲“独贵龙”的情况）。

自从双方谈判破裂，逊王从包头调兵加强防卫，“独贵龙”方面也继续坚持斗争，大家决心非把逊王废掉不可。“独贵龙”秘密集会研究，胡日格等主张提高警惕，加强自卫，将自卫的武装力量集结训练，并采取主动，先下手为强，以奇袭手段将逊王捉来，好实现“独贵龙”的目的。阿尧尔色那不采纳这个建议，还是主张说理斗争，绝不先动武力。同时认为春天到来，搞生产重要，更不能集结兵力。这样，阿尧尔色那也就回家搞生产去了。这是“独贵龙”最大的失策。

逊王从包头调来一团晋军，还加强保安队力量，认为有恃无恐。经过密谋，为击败“独贵龙”，擒贼先擒王，作出了暗杀阿尧尔色那的决定。于是，以聋二秃为首，挑选了四十余名精干的枪手。赏给聋二秃三十元白洋，十两大烟土；其余人各赏十元白洋，五两大烟土。民国四年四月十三日晚，这帮人由王府出发，向距离一百三十里的恩克背村前进。十四日凌晨把阿尧尔色那家包围。这时，阿尧尔色那已经起床，正与附近的一个汉族地主王玉庭围坐吃茶，听到外面枪声，急忙出门，被一枪打倒。王玉庭上前拉他，也被一枪打倒。那时，阿尧尔色那家虽有四支枪，有两个兵，但没来得及还击，即被聋二秃等闯进来缴了枪。他们把家中细软财物抢劫一空，把阿尧尔色那的头砍下带在马上，即匆匆跑回王府领赏去了。

事情发生后，“独贵龙”据群众报告，立即派左格独尔等带领兵马追击，追到柴登东北的刀劳汗庆附近，聋二秃等在仓皇逃窜中将阿尧尔色那的头颅掉下。因为追兵人少，不便穷

追，只好将阿的人头捡起带回。“独贵龙”群众听到阿尧尔色那被杀消息后，群情悲愤，痛哭流涕，举行追悼会，葬埋尸体。胡日格、喀日哈、莽格奈等“独贵龙”领导人，均在灵前宣誓讲话，表示复仇决心。追悼会变成了誓师大会，“独贵龙”群众的斗争情绪更加高涨，会后经过研究决定进攻王府。

首先推选胡日格为总领导，莽格奈具体分管武装，分别在柴登召、宿海图、茶窑沟等处设前后方据点，集结部队进行训练，筹备武器和弹药。由于现有武器质量数量均差，不能适应当前需要，遂决定联络外蒙革命后流散在乌盟中公旗^①后山一带的一部分武装，以壮大进攻力量。这部分有三十多人，全副武装，弹药充足，作战勇敢。“独贵龙”经过几个月的准备，组织好二百一十名正式武装部队，有六十余支步枪，还有火枪、刀矛等。此外还组织了六百多名男女老少武装的群众。就在当年十月八日晨，由老英雄胡日格率领，将逊王府包围得水泄不通，展开了激烈的战斗。

逊王派人杀死阿尧尔色那后，知道“独贵龙”不会善罢甘休，于是调兵遣将，由晋一团分兵防守王府及以西三四十里的郑守坝地带，连同自己的保安部队，以新建城垣为据，日夜严加防守。当“独贵龙”前来围攻时，逊王和仕官吓得魂不附体，连忙跑到关帝庙磕头许愿，仕官每人赏给大烟三两，银洋五元，以激励战斗。“独贵龙”攻城紧急时，群众大喊：“活捉逊博尔巴图！打死逊博尔巴图！举印投降，饶你狗命！”口号声震撼云霄，王爷更加害怕，浑身哆嗦成一团。这时蔡小娘也吓得披头散发，面无人色，碰头寻死，哭嚎乱嚷。逊王爷只好两

^①中公旗——今乌拉特中旗。

头招架，既要到外边给士兵们加油打气，又要回家安慰美人，里外夹攻，心乱如麻。“独贵龙”勇猛攻击，自早晨到下午，战斗七个小时，终因王府城墙坚固，兵力雄厚，武器好，虽然城墙西面和东北角攻破三处，由于火力封锁严密，也没攻下来。最后一次攻城战斗，好多“独贵龙”英雄已攻上了城墙，但因高德海、王玉山等头目阵亡，以致攻城受挫，只好撤退下来。次日天明，胡日格率领“独贵龙”部队撤至柴登村小召以西，进行整顿，准备再战。这次攻城，虽然没有达到目的，但是给了王爷以沉重的打击。

六、“独贵龙”运动的结束

“独贵龙”撤退到柴登后，逊王一面向盟长和都统报告，借口“收容国际土匪”之罪名，诬蔑“独贵龙”造反，对于阿尧尔色那之死则推委不知；一面委派林德山为指挥，集合晋军及保安队六七百人，向“独贵龙”反攻，占领了伊林滩地区，挺进到柴登村东部麻池一带，扬言剿灭“独贵龙”。

“独贵龙”由胡日格带领，做好应战准备，相机打击来犯之敌。为了挫败王府军队的来攻，“独贵龙”出其不意，派遣轻骑绕过晋军驻地，到展旦召北官府营子，把西官府乌力吉巴达尔胡和西梅伦补林特固色抓来，胁迫他们交涉退兵。战斗开始后，

“独贵龙”奋勇迎击，虽然武器不好，但打退敌人两次进攻。在柴登召东坨一带战场上，尸体纵横，王府军队死十八人，伤三十余人；“独贵龙”死八人，伤十余人。在这次战斗中，有左格独尔、森盖、达尔马、阿德雅等几位英雄好汉，骑马冲锋，三进三出，英勇斩杀，所向披靡。可惜左格独尔马失前蹄，坠马被虏，当晚即被敌人乱刀剁死。经此战役王府军大伤

锐气，退到柳陶以东，不敢再作进攻。而“独贵龙”也以缺乏粮草弹药，不得不退却，把原来占据的伊林滩、改改召、柴登的麻池以东等地区放弃。

在此情况下，盟长和都统以什拉官府为首，派来几十名官员，到达展旦召，通知双方停战，各派代表进行谈判。在谈判中，盟和都统方面，当然庇护逊王，认为“独贵龙”联系外匪，公开武装围攻王府，已远远超出请愿范围。“独贵龙”方面坚持追究王府杀害阿尧尔色那问题，要求必须澄清罪责，实现十三条请愿书所提出的要求。谈判到最后，逊王看到“独贵龙”率领部队向东挺进，准备再次投入战斗，才被迫承认杀害了阿尧尔色那，在此基础上议定了十三条和解书。其内容主要是：停止开垦牧场，已开的牧场，适当封闭一部分。停止出卖土地，土地公有，不让王爷一人作主。停止出租土地，已出租土地的租金，归旗共有。废除进京费、朝贺费、念经费等十一种税收。禁止王公转卖或相互赠送奴才，严禁全户奴才陪嫁姑娘。给蒙古人按人口多少拨给户口地。汉族农民佃户租额不得超过“二八”开（即百分之二十）。在王府和政府当奴才的工作人员均由公家供应生活费，限制打人骂人。王爷卫队不得超过原编制。废除蔡小娘的王夫人称号，作为姨太太，生子不能当台吉，另选贵门之女作为王夫人。最后，把原提的废除逊博尔巴图王爷一节取掉，加上王爷暗杀阿尧尔色那实属非法，引起“独贵龙”武装围攻王府的互相残杀，在法律上各不追究。但对阿尧尔色那举行公祭。逊博尔巴图必须到灵前赔罪道歉。抚恤其家属，将恩克背周围方圆四十华里大的土地，划作永远户口地，以资瞻养。

以上和解条款，于民国五年二月达成协议，双方在调解书上签字后，立即执行。从此，“独贵龙”组织宣告解散，武装

交由旗政府统一编制安排。对阿尧尔色那由旗政府方面出钱葬埋，举行隆重的葬礼。在公祭大会上，胡日格详细介绍了阿尧尔色那梅伦的一生，特别是他对“独贵龙”运动的卓越领导和贡献，同时向群众详细交代了谈判的结果和执行情况。胡日格在灵堂痛哭失声地说：“我们没有能力把你的意志继承下去，没有把‘独贵龙’干下去。到九泉之下也无颜见您！”参加公祭大会的人无不痛哭落泪。会后，群众在恩克背村北梁上，为阿尧尔色那修建了一座高大的石砌坟墓，至今还屹立在那里，为人民所敬仰。

伊克昭盟达拉特旗，由阿尧尔色那为首的“独贵龙”运动，轰轰烈烈地进行了二年零三个月，它沉重地打击了封建王爷的反动统治，激发和鼓舞了群众反抗压迫和剥削的信心，给后来相继兴起的杭锦、乌审、鄂托克等旗的“独贵龙”运动以很大的影响。

一九六三年六月二十四日

华连、华里雅孙为首的 科右中旗旗民起义始末

博尔古德(作) 葆定(译)

国王的残暴压迫剥削

光绪年间哲里木盟科尔沁右翼中旗扎萨克^①图什叶图亲王色旺诺尔布桑布继承王位后,立即委派协理、管旗章京、梅伦章京、参领^②大管事和小管事等大小官吏,分布在王府^③和全旗十三佐。为了满足他的荒淫无耻的生活,规定全旗人民大户每年缴纳小畜一百只,中等户缴纳五十只,贫困户缴纳四只。为了过冬,全旗征犏牛四十头,乳牛四十头。为了王府经费,另向全旗征犏牛二百头,绵羊一千只。为了支差,每年另征牛车四十辆,车夫四十人,各种手工艺匠人和壮工五十名(征用车夫、工匠、壮工均义务工,不给任何代价)。

图王每年进京一次。在京吃喝嫖赌、吸大烟,尽情挥霍。钱不够花时,就向高利贷者贷款。每次回旗,负债银子五、六十万两。为偿付债务,或出卖土地,或放垦荒地,还规定全旗上等地

①扎萨克——官名。蒙语执政之意。世袭制,是一旗最高当权者。

②协理、管旗章京、西协理,相当于副旗长;管旗、梅伦,见29页注②③④;章京,相当于秘书长,参领——亦称扎兰,甲浪。既是相当于区一级行政区划,也是该区划的长官。

③王府——即旗政府。

④佐——即苏木。

每垧(十五亩)征地租银四两四钱,下等地每垧征租银一两五钱。为保卫王府、修建王府、园艺,无偿征调数千老幼平民,为他在大钦塔拉王府四周掘壕引水,在王府院内修建洋式楼阁亭台,在花园内种植奇花异草,竹林果树,饲养珍禽异兽,修假山、湖池。为了发泄兽欲,强征民间美女,名为王府作奴,实是供他发泄兽欲。对下属官吏、奴婢,稍不如意,轻则毒打,重则下狱瘐毙。有时,还随便捏造罪名,如贿赂、私通福晋^①等,肆意毒打、杀害。图王的残暴几乎达到“不见人血吃不下饭,不闻呻吟哭啼夜不能眠”的程度。因之,全旗人民无不切齿痛恨。

旗民起义的缘起

光绪二十六年八、九月间,以钢宝、仓宝和王老虎等为首的旗民队伍,在扎萨克图旗图胡木地方起义,反对扎萨克图王出卖全旗荒地、设立县制。他们袭扰扎萨克图、镇国公两旗^②的官僚、富户,威胁扎萨克图旗王府,强迫他们交出粮食、牲畜。扎萨克图旗王爷乌泰避居齐齐哈尔。镇国公旗公爷拉喜明珠尔调扎赉特旗官兵二百多名保护公府。科右中旗图什叶图王惊恐非常,遂强征民夫数千人,加深加宽王府周围的壕沟,防备起义队伍袭击。严令大台吉、梅伦额尔登瓦其尔率府兵一百多人昼夜巡逻,保卫王府。而王府官兵为保护家园,纷纷要求离开王府回家。图什叶图亲王严词拒绝,说什么:“正因图胡木地方起义队伍威胁袭扰,才不允许官兵回家”。因之,王府官兵均抱怨愤懑。图什叶图王一经发现,就严刑处罚,官兵不满情绪愈益高涨。

^①福晋——清代宗室和蒙古亲王、郡王及亲王世子的正室均称为福晋,侧室则为侧福晋。

^②扎萨克图旗,今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科右前旗;镇国公旗,原科右后旗,今并入科右前旗。

那时，在王府充当御马侍从的华连和华里雅孙弟兄二人的父亲沃杨阿，在王府任管旗章京。有一年春天，科右中旗和达尔罕旗因新甸地方发生纠纷，图什叶图王派沃杨阿前去谈判。途经博王旗时，该旗送了他旅费六十两银子。事被随去的台吉阿庆嘎告发，说是沃杨阿受贿。图什叶图王大怒，立即将沃杨阿逮捕，并钉死在哈达松地方。华连兄弟二人平日因受虐待，愤恨图什叶图王。这时，二人密商，发誓要为父亲报仇。原来也在王府当差的太平阿，平日和华连兄弟同样受图王虐待，久欲反叛。华连兄弟和太平阿密议，让太平阿设计逃出王府，在王府外进行反叛准备工作。有一天，太平阿服侍图王，忽然昏倒在地，口吐鲜血。图王看见，非常惊讶，急问：“太平阿！你怎么了？”侍从回答：“太平阿已经患了恶性传染病”。图王立即下令将他赶出王府。原来，华连兄弟和太平阿密议，让太平阿口含山羊鲜血，故意在服侍图王时，假装昏迷晕倒，吐出口内羊血，迷惑王爷。另让侍从说是患恶性传染病，促使图王下令将其赶出，借以脱离王府，在外作准备工作，约期起义。太平阿离开王府，回到家里，积极进行起义准备工作。

光绪二十七年（一九〇一年）三月初三，忽然阴云密布，天降大雨。华连、华里雅孙、德克特、嘎勒仓、陶克陶胡和伊木扎布等人，带领王府内所有侍从、兵丁，手执枪械，砸开武器库房，取出全部枪支子弹和旗帜。打开监狱，放出所有犯人，和在王府外的太平阿会合，号召挖掘环王府壕沟的奴隶们举行起义。

华连兄弟起义前，王府领兵梅伦额尔登瓦其尔因事请假回家。额尔登素常也是不满图王的。华连兄弟起义后，率领队伍至诺果成拉金地方暂住，派人和额尔登联系，告以起义经过和打算，希望赞助。额听后，欣然同意，并立即为华连出谋献策，率领所属部队与起义队伍会合。从此，起义队伍由额尔登瓦

其尔率领，到贝子府（白沙堡）收缴王府牲畜、马匹，起义队伍的声威日益大振。此时，王府台吉嘎尔玛巴扎尔听到起义消息后，也来参加起义队伍，并和额尔登瓦其尔计议，列举图什叶图亲王四十八条罪状写成状子，并在未征得本人意见的情况下，就把占毕德勒格尔列作第一署名人，其他署名人均为当时著名人物如那木海宁宝、额尔和巴图等，将诉状送给副盟长、扎萨克图旗郡王乌泰。

消灭暴君图什叶图王色旺诺尔布桑布

华连兄弟、额尔登瓦其尔等起义后，图什叶图王非常害怕，因为起义队伍在贝子府庙附近，对他威胁很大。他先派福明阿、额尔和巴图和乌斯胡布彦等人到起义队伍，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并请他们回王府商谈。华连、额尔登瓦其尔等严词拒绝，立即扣捕来人。后来，图什叶图王又派人和起义队伍商谈，去的人，也被杀害。而图什叶图王左右的侍卫、侍从和卫兵等大部逃散，扎萨克图旗图胡木的起义队伍，也多次来恫吓他，图什叶图王难以安居，就下决心逃往热河省，想借兵消灭起义队伍。三月二十三日深夜，图什叶图王亲率侍卫托克托胡、额尔其木、莫尔根葛根（即活佛）和叶什达瓦四人，带枪五支，骑着快马，奔向热河。由于图王身体过于肥胖，乘马驮他吃力，几次跌倒，走到莫尔根葛根水晶宫时，太阳已经落山，只好住在那里。额尔登瓦其尔、华连等人得知图王逃跑消息后，立即派华里雅孙、陶克陶胡和伊木扎布等带领三四十名士兵，华连和德吉特嘎勒仓二人带领一百多名士兵，分路追捕图王。华里雅孙出发前，先到王府遍问图王去向，首先遇见图王的三福晋，华里雅孙一见她，非常愤恨。原来他的父亲沃杨阿就是

他进谗言，才被图王逮捕钉死的。所以立即令士兵将她捆起，押送贝子府。在押送途中，恰遇被起义队伍扣留后逃出来的福明阿，和押送士兵商量，把她松了绑，送回王府，三福晋乘机逃跑。华里雅孙未弄清图王去向，又在王府收缴三十多支枪后，即奔向素被图王信任已退休的参领锡凌阿家，逼问图王去向，也没有结果。但根据图王出走时间，估计他可能在水晶宫休息，就强迫锡凌阿带路，奔向水晶宫。他们到达时，华连和德吉特嘎勒仓带领士兵也赶到了，就把庙院包围，将葛根喇嘛叶什达瓦从庙内叫去，令他转告图王：“不准外逃，必须立即返回王府！”华连为防备图王再逃，还令士兵将图王乘马牵出收藏。这时，随图王逃到水晶宫的何春喜、托克托胡、莎斌阿等早已逃逸，只有葛根——叶什达瓦、额尔其木等几个人了。华连等迫使锡凌阿去见图王，列述图王罪行十数条。图王深知他已被围，外逃已无希望，只好亲笔复信，承认自己罪行，愿回王府，改过从善，将信让锡凌阿转交。起义部队接信后，怀疑不是亲王亲自写的，立即撕毁掷弃，又令锡凌阿转告图王：认罪已经晚了。如愿葬身祖坟，现有毒药、尖刀、绳索三种“筵席”，任其选择。否则，手枪在等待着他。图王听后，对叶什达瓦说：“快在佛像前点灯焚香，准备温水，待我净了身体再去西天。”这时，锡凌阿邀请华里雅孙进庙，站在窗外，接过图王从窗户交出的手枪，图王再三恳求饶恕。华里雅孙不与理睬，接过手枪后，即将三种“筵席”递给图王，说：“由你自取”。图王正哀求“救命”，华连从庙外跑进来，不听华里雅孙劝阻，开枪打死图王，跟在华连背后的德吉特嘎勒仓，也对着图王打了一枪。在庙院的人们，听到枪声，一齐跑了进来时，图王已被打死在地。那时，满清政府刑律规定，平民杀死王爷要论摸脐罪行——把所有的男人杀尽。因此，额、华、

等人商议，洗去尸体上的血迹，用棉花填住伤口，抹去枪杀痕迹，用图王所扎红色洋绸带，把尸体吊在梁上，显示是他自缢而死的。

随后，华连兄弟二人和陶克陶胡、伊木扎布等商议，把图王的亲属、福晋、官员弄来验尸，用他们的名义上报图王病死，并呈请批准继任王位人选，以免朝廷对他们论罪。商议既定，留下锡凌阿、叶什达瓦及数十名兵丁看守尸体。二十四日，华连、德吉特嘎勒仓等人带领武装队伍，回到王府。先找到福明阿，指出他途中私放三福晋的罪行，威胁着要处决他。福明阿哀求“饶命”，华连等当即警告他：从今以后不准再听福晋、协理的话，绝对服从我们命令，向上呈报图王病死。原来，福明阿是图王的笔贴式，素为图王信任，图王的一切文稿均由他拟办。福明阿听后，连连发誓“照办！”在此同时，华里雅孙命令士兵在王府周围警戒，防止闲人进出王府。命福明阿立刻派何成阿叫回图王的正福晋、姑娘、叔叔文丹赞尼玛和喇嘛弟弟叶什达瓦等亲属，以及占毕德勒格尼玛协理等。二十六日，华连等带领图王的亲属、官员到水晶宫看验仍然吊在梁上的图王尸体后，教喇嘛念经，把尸体解下来。亲属和官员没有详细检验尸体是否有伤痕，就埋葬了。亲属和官员们认为图王既死，就该呈报朝廷。经过商议，由福明阿拟具呈文，说明图王因呈文病死亡，请求批准图王胞弟喇嘛叶什达瓦继承王位。朝廷接到后，信以为真，不加追究地批准叶什达瓦继承了王位。次年（光绪二十八年、一九〇二年）五月，朝廷正式任命扎赉特王为盟长。将图什业图王叶什达瓦任盟长时的官印、绶带等作了移交，这件事未出任何麻烦就这样结束了。

华连兄弟和伊木扎布等人率领几百人的起义队伍，带着胜利的喜悦，回到了贝子府，向额尔登瓦其尔梅伦汇报了事情处

理经过。接着大家就计议起义队伍今后的行动打算，有人主张和扎萨克图旗的铜宝、仓宝和王老虎起义部队会合，继续进行起义活动，华连、华里雅孙不同意，两人就径自回家了。额尔登瓦其尔梅伦带领着所剩起义队伍，聚居在科右中旗东部诺尔果嘎勒金平原上，直到同年八、九月间。同年九、十月间，铜宝、王老虎等人的起义队伍被打败，额尔登瓦其尔率领的起义队伍失掉了希望，也都逃散、回家，起义队伍遂告瓦解。

扎萨克图旗王爷的控告

图什叶图亲王色旺诺尔布桑布生前，为哲里木盟盟长，被杀后，盟长官印、绶带等物按规定应该移交副盟长、扎萨克图旗王爷。不料扎旗王爷死后，扎旗协理朋斯克强令把该旗一个一般台吉的儿子乌泰举为该旗王爷并兼副盟长，该旗封建头子多数不服。图王死后，将盟长官印、绶带等移交扎赉特旗王爷。移交时，乌泰正在齐齐哈尔避难，听到科右中旗起义情况和移交印、绶之事后，忌恨科右中旗没有把盟长遗物移交给他，因而向满清皇帝控告科右中旗起义队伍和移交官员，并添枝加叶地尽情加以渲染，说明原盟长、科右中旗图王色旺诺尔布桑布并非因病死亡，确系被人杀害，请求查实按律核办。其控诉呈文大意如下：

一、哲里木盟盟长、科右中旗图什叶图亲王色旺诺尔布桑布生前，於光绪二十七年三月十日，呈报该旗台吉额尔登瓦其尔梅伦等十一人为首，率领一百一十八名暴民，冲入王府，抢劫了子弹一万七千粒，火枪五百支，弓六百张，刀三百把，军装三百件，牛数百头，枪一百支，撒

袋①二千个，火药二千斤，快枪一百二十支，铅弹数千发，军用篷幕数百顶，以及军旗、军粮等，因而使仓库空虚，大凌河畔官马群亦全被劫走，且经派人彻查属实。

二、据查额尔登瓦其尔等六名台吉，系假冒占毕德勒格尼玛协理名义，书写控告该盟盟长色旺诺尔布桑布四十八条罪恶诉讼状的。

三、据该旗协理呈报：三月二十二日夜半，该旗扎萨克携带何春喜、托克托胡、额尔其木、莎斌阿、喇嘛叶什达瓦等人，悄悄离开王府而去等情。

四、据该旗占毕协理派遣布和托克托呼前来呈报，该旗王爷色旺诺尔布桑布猝于三月二十四日因病死亡等情。另据该旗葛根庙的喇嘛珠格仓布呈控：自从八月该旗发生队伍叛乱后，该旗扎萨克屡派部队防守该旗各处要隘，以防不测，另派部队侦查盗贼行踪。就在这时，该旗官兵竟把抢劫的洋枪五百支，以及车马衣服等物，也都均分了。对此，该旗扎萨克色旺诺尔布桑布经过调查，认定他的部下确有杀害逃窜兵民、分赃财物的事实，屡经缉察，要严加惩办。但是该协理占毕等人因此怀恨在心，便率领多数士兵冲入王府，把所有武器完全抢去，又在同月二十一日率领队伍包围王府，开枪进行威胁。对此，图王惊怕非常，一再要求进行商谈，但对方始终没有撤除包围。在此紧迫情况下，图王只带数人，外出逃生。这些人发觉后，跟踪追到莫尔根葛根的水晶宫，把该庙葛根叫出，恫吓他将图王交出，否则即将庙内所有的人都打死。随后占毕、胡图力等三十七人，冲入图王住室，图王没有答应他们任何要

①撒袋——装箭的箭筒。

求，就被他们拉到外边，即用图王所系腰带，将图王绞死，并悬挂在屋梁上，诡称图王是自缢。在此同时，他们另派人进入王府，除抢劫三十万两银子外，还逼迫福晋说出她决不泄漏真情口供。另派胡图力勾结扎赉特旗王爷的部下管旗章京革本格，鼓动该旗王爷旺染帕勒济派穆荣阿带领队伍，把盟长的印，绶带等物抢劫而去。该占毕协理又派胡图木贿赂革本格银子一万两，由他假报图王因病死亡，希图掩盖此事，不使成为诉讼案件。另又贿赂银子七千两，要他荐举因病已成哑巴的图王弟弟喇嘛叶什达瓦继承王位。凡此种种，几经调查，人民群众均皆证明属实。

当图什叶图王色旺诺尔布桑布兵权被夺时，本可保全性命，但由于扎赉特旗王爷为满足提高个人爵位奢望，迫使图王部下，绞死图王，致成这次惨剧。而科右中旗协理占毕以及胡图力、那木海宁宝、乌斯胡布彦、福明阿等三十七人，早就怀恨图王，素具报复之心，遂利用这次叛乱机会，唆使部下杀害图王。这种杀害王爷，蔑视朝廷刑律，实属残暴至极，绝不应赦免。现因该王亲属无能，即使愤怒在胸，也无能控告。为此，恳请理藩部进行彻查，明辨是非，以彰刑律，是为万分期望。再，复查扎赉特旗王爷旺染帕勒济宠信部下革本格，致使假报图什叶图王色旺诺尔布桑布因病死亡，妄荐图王哑巴弟弟喇嘛叶什达瓦继承王位的报告，理藩部也有存案，伏乞圣主洞鉴，并示严正处理，至所期待等。

起义英雄的牺牲

皇帝看到乌泰王奏折后，于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敕谕刑部

大臣裕德会同驻盛京^①将军增琪调查处理。裕德立即到盛京与增琪会商，决定派参领连仲去科右中旗，佐领^②遇春和永琪二人去扎赉特旗，将有关人员带至盛京。连仲到科右中旗与代理旗务的那木海宁宝会晤后，将杀害图王的有关人员除个别未在家或有病者外，全部拘捕带至盛京，其中包括协理古毕、管旗章京胡图力、额尔克图、乌斯胡布彦、梅伦额尔登瓦其尔、侍从托克托胡、额尔其木、莎斌阿、葛根——叶什达瓦、锡凌阿，主犯陶克陶胡、伊木扎布、华连、华里雅孙和德克特嘎勒仓，以及图王的福晋、姑娘、叔父丹赞尼玛等人，全被带往盛京。遇春、永琪二人到扎赉特旗将穆荣阿、革本格二人拘捕带至盛京。经过审问，判明真象后，判华连、华明雅孙、陶克陶胡和伊木扎布四人死刑，德吉特嘎勒仓无期监禁，梅伦额尔登瓦其尔削职为民。并于光绪二十八年五月十三日将判处死刑者斩首后，又将头颅用油煎熬，带至科右中旗高悬木杆之上示众。

华连兄弟等人，为了反抗残暴的封建统治，举行了英勇的起义和斗争，为民除害，打击了反动势力的气焰。但终于遭到封建统治者的摧毁和镇压，有的献出了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这一英雄事迹，至今仍为科右中旗及附近人民所称颂不绝。

一九六五年八月

①盛京——亦称奉天，即今沈阳。

②佐领——佐即苏木，佐设佐领。

我是怎样镇压嘎达梅林 起义部队的

李守信

嘎达梅林蒙名老嘎达，是哲里木盟达尔罕王旗（现科尔沁左翼中旗）的带兵梅林，汉名叫孟青山，所以又称为孟梅林。他由于反对出放蒙地，惹本旗王爷恼怒，将他关在土牢里，准备捏造罪状，把他处死。嘎达有两个老婆，二的名叫牡丹，会使手枪。她联络了四五名亲属，打开土牢将丈夫救出。从此嘎达被王爷逼上梁山，便组织了许多牧民，展开武装斗争，震动了整个科尔沁部和辽宁热河边境。由于牧民缺乏革命经验和战斗装备，必须联合马贼①来对付王府的“小队”②，难免有不少坏分子被吸收进去，将牧民起义的性质变成流寇式的活动。嘎达无法制止，最后被我指挥的东北军骑兵第十七旅全部歼灭。

此事发生于何年何月，我已记不清准确时间。战争的结束，则记得是一九三〇年农历二月二十日。那时张学良已经继他父亲张作霖统治了东北四省。他和热河省政府主席汤玉麟都站在王爷这一边。所以嘎达起义以后，辽宁派张海鹏部骑兵由洮南向西追击，热河电台驻防开鲁第十七旅的崔兴武部到鲁北从东防堵，以期把嘎达的部队包围解决。我那时任崔兴武部三十四团团长。这一年冰雪很大，崔旅长养尊处优，不肯亲自出动；四十一团团长孙寿卿在开鲁装病，根本没有随军前往；二

①马贼——旧中国时东北的蒙族土匪。

②小队——旧中国时蒙旗政府或旗长（扎萨克）的武装。

十七团团长沙凤阁，到了鲁北也躲到烧锅房（酒坊）图舒服去了。因此我好大喜功，这三个团骑兵一千多人，全归我带领指挥。我那一团人是由马贼和胡匪组成的。嘎达梅林遇见我这个对头，不仅全军在热河的扎鲁特旗遭到覆没，连他本人也被我亲手击毙在北老哈河里。

嘎达梅林的部队共有七百多人。他们因为被张海鹏部压迫得不能在科尔沁部存留，企图沿着草地畔子，到热河北部大小巴林旗的坝前整体。坝后下了四五尺深的大雪，察哈尔乌珠穆沁的牧民赶着牲畜和车辆，在坝前支起帐幕放牧。乌珠穆沁的牧民相当富有，携带着大量的白面炒米，嘎达梅林计划利用这一部分给养，在那里度过严寒的冬季。张海鹏部的奉军，饷精非常充足，官兵都不愿吃苦受罪，将嘎达梅林的部队赶到达尔罕旗的草地即停止前进。崔兴武部是由热河游击马队编成，系东北军中的游杂部队。官兵都想利用打仗发财，所以越省进入达尔罕旗北部。我从鲁北出发时，判断到嘎达梅林必然要采用民国初年的“蒙匪”战术。在他们被张海鹏部赶到草地畔子被我部堵住以后，即紧紧“焊上”跟着不放松一步，形成他们做熟饭，我们赶上去端碗，使他们没有喘息的余地。否则，他们一空室清野，我们就找不到衣物，便会越追越远。

达尔罕旗和热河东北部的几个蒙旗，地形越往北越宽广，越往南越狭窄。由于北面的牧区人烟稀少，牧民听见嘎达梅林的部队过来，恐怕抓人赶马，都将蒙古包移到南边的农业区。农区均有地主武装，听说他们仇视汉人，都以“联庄”（各村联合）的形式开出民团戒备。因此嘎达梅林部队只好在中间的半农半牧区，南北有四五十里的空间地带由东向西流动。在一个名叫土列毛都的村子附近，我们把嘎达梅林的队伍截住，经学堂地（村名）和东西巨勒克（村名）往西直追。一白天追

越了五个旗的境界。追到林东北面以后，我感觉这样追不是办法，因为他们能赶牧民的马群，骑累了可以更换，所以跑得很快，这样敌人必然会走脱。同时我知道乌珠穆沁有七八百“小队”，在大小巴林旗的坝底下保护牲畜，绝不让嘎达梅林的队伍过去就食，一定要进行抵抗。我不分昼夜追了三天，官兵都把手指冻坏，腹部全冻成铁青，很难再追到大坝底下，和乌珠穆沁的“小队”夹击他们。于是决定转进土列毛都，以逸待劳，另等他们从坝底下碰壁回来，再在这个地方将他们一网打尽。

嘎达梅林被我追了几天，以为我一直在他们后边跟着。当他们在龙头山被乌珠穆沁的“小队”顶住，不得不由西向东折返。因为来时的路上已经抢掠一空，又怕碰见我的队伍，于是朝北沿着牧区的边缘退却。嘎达梅林部队走到土列毛都附近，由于周围再没有村庄，两条路在这里归到一起，必须进村休息。我撤至土列毛都，对外进行了严密封锁，所以嘎达梅林不知我们驻在这里，冒然走进我的埋伏圈内。正是午前晌（上午）的时候，我瞭见一片黄尘底下来了一千多穿着汉族妇女红绿衣裳的“乌合之众”，以扇面队形向土列毛都跑来。走到临近，我朝天打了一排手枪子弹，士兵全上马追击，一口气冲了七十多里，在东巨勒克川把他们打散。除沿途被击毙俘虏二三百人外，还被东巨勒克川的农牧民用铁锹劈死徒手的一些人。马匹东西全被我们卤获，士兵们拣“洋捞”（发洋财的意思）拣得忘了寒冷。

中午，嘎达梅林利用我们打尖的时候，把剩下的二三百人都集中在一座小土山上，准备进行抵抗。我们吃过午饭，用两门重迫击炮轰击，骑兵跟着往上冲锋，嘎达梅林的大太太被炮弹打死，他们连尸体都没顾上携带，即仓皇退去。我们继续追

了七八十里，天已经昏黑，我叫我手下最能打仗的胡宝山（跟过巴布扎布）^①连长，在野滩上拢起好几十堆野火，其余三个团的兵，吃干粮和歇马。我知道嘎达梅林白天“赔了夫人又折兵”，绝不肯善罢干休，一定黑夜前来摸营，故布了这种疑阵。果不出我所料，后半夜他们突然冲来，胡宝山的兵在火堆附近打，隐蔽的兵从外边包围，打死了一二百，其余的人因各自逃命，突围以后互不掩护，我们一直追了二百多里。到了天亮以后，大都沿途四散，嘎达梅林只带着四五十人，朝南面败退，连那个名叫牡丹的二太太，也扔到一个牧民家里。胡宝山走进去看她的脸部和我们冻得一样铁青。经过恐吓，她说了实话，便被胡宝山带上做了老婆。后来我投降日本担任了伪蒙古军总司令，胡宝山跟着我升了团长，牡丹给胡宝山在呼和浩特生了一个男孩。胡宝山在宝昌死后，她下落不明。

我带领着部队紧追嘎达梅林残存的四五十人，始终没让他们走脱。他们进入农业区，被民团打得无法进村，只好忍着饥寒落荒而走。我的一千多骑兵对他们越包围越紧，最后把他们围到达尔罕旗舍伯吐北的洪格尔敖包的老哈河边。因为我的马快，带着十几个卫士跑在河边把他们卡住，令队伍往上兜捕。其时正是开河时期，老哈河里流着冰排，嘎达梅林一看冲不出去，便骑马泅水过河。我下了马和我的张副官爬在一个土埂上，叫士兵给装子弹。我两个用步枪一替一枪地向这四五十个人射击。一共打死二十多个，泅上岸的有二十多个。打死的有八具尸体被马拖上对岸，其余均被冰排冲走。我看见泅过河

^①巴布扎布——卓索图盟土默特左旗（现为阜新县，属辽宁省）人。民国初年，聚众为匪，响应外蒙哲布尊丹巴活佛称帝，窜扰东北，与日本特务勾结，参与“宗社党”活动，后在攻打林西的战斗中阵亡，所部溃散。

的二十多个人聚到一起突然折回，知道一定是嘎达梅林没有安全泅过，他们冒死前来接应。我的兵也骑马跑进河里十几个，有一个被冰排冲走，其余都泅到对岸，还有不少的兵也硬泅过去，均被我制止。接着泅过河的兵和河北岸上的兵，一齐向这二十多个人开枪，他们不敢前进也不后退，似乎在等待什么。我在河北吆喝着过了河的士兵，将八具尸体上的人头完全割下，用刺刀挑了起来，这二十多个人才向东南退去。

因为把十几个兵搁在河那边，我很不放心，我叫他们带上人头和大队隔岸顺河而走。走到有渡口的地方，找了两只渡船，放下去也被冰块打碎，后来走到河宽水浅的地方，因为天已黄昏，决定第二天由此处全军泅水而过。我便带着大队和过了河的十几个兵，在河谷的冷风中露宿了一夜。第二天从这个水浅的地方一齐安全渡过，经过达尔罕的一个部队的住处，哈丰阿的父亲滕海山在那里当队长，他代表该旗的王爷给我们准备下肉面，叫我们在那里吃饭。我在东巨克勒川捉住嘎达梅林的一个小兵，原来是滕海山的差人。因为回去探家，被嘎达梅林的人裹到里边。他怕我带到开鲁枪毙，看见滕海山就哭。我把这个小兵交给滕海山。这个小兵告诉我，八颗人头里有一颗镶金牙的，便是嘎达梅林。滕海山过去认了一认，也说是嘎达的脑袋。我以前把嘎达领的人当成是“蒙匪”，所以死命追剿。听见滕海山说是反对王公的起义部队，感到非常后悔。

我把人头带回开鲁交给崔兴武，崔认为奇货可居，用木匣装起交给汤玉麟，汤送到沈阳交给张学良，张交给达尔罕王爺，在旗下悬挂了好长时期。我们那个军队，打仗时谁拣来东西归谁，士兵们共拣了三百多枝枪和四千多匹马。

（刘映元整理）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十日

达拉特旗康王父子三代王朝 反动统治概述

· 政协达拉特旗委员会 ·

（一）图们巴雅尔王朝

一八九八年（光绪廿四年）间，达拉特旗盐店一参领区，有一个蒙古人名叫图们巴雅尔。他年约四十多岁，身材短小精干，精通蒙古语文，汉话也说得很流利，待人接物态度和霭，附近蒙汉老乡都欢喜和他接近，认为他是有求必应的人。他的高祖原是达拉特旗的贵族（台吉）^①，曾因争夺王位，与南商（当时的王公）在北京理藩院^②打官司。官司失败被判充军之罪（未走），并罚五世之内，不得再当王爷。从此家境日渐贫困，到了图们巴雅尔时，家庭生活更是困难，老母妻子以放牧为生。但他却酷嗜赌博，整天在外聚赌，人皆称之为闲散台吉，又称赌博台吉。他的母亲因他不务正业，屡加劝阻，他的老婆也因此常和他吵嘴。但他满不在意，却凭借他的聪明，在赌博方面学得一套技术，几乎成了赌场上的常胜将军。所以越赌越热，越不想守田园了。

当时达旗王府也为禁止赌博出过布告。图们巴雅尔利用闲散台吉的身份，拉拢王府仕宦，因此官府也奈何他不得。当时

①台吉——历史上蒙古贵族的称号。

②理藩院——清廷管理少数民族工作的机构。

在王府中，总管事务的仕官是“加克尔齐”（管旗章京）^①毛呖肯。他红极一时，深得王爷信任，图们巴雅尔与之过从甚密。毛呖肯是一个鸦片烟瘾极大、爱摆架子、官气十足的人。图们巴雅尔就经常送给他大烟土和金钱，这样也就得到毛呖肯的支持，更是大赌特赌起来。每逢庙会跳鬼^②的场合，他就搭起宝棚，设场聚赌。当时的赌风甚炽，有为此而倾家荡产、鬻妻卖子，甚至男盗女娼的，但图们巴雅尔却大发其财。有一次他在赌场中赢了三百多两银子，带回家中，又将部分银子暗送与毛呖肯，让他在王爷面前多加美言。毛呖肯一见银子喜笑颜开，应其所求。在过去那样黑暗的社会中，钱能通神，只要有钱就好办事，所谓“有钱能买鬼推磨”。当时达拉特旗的世袭王爷是都拉尔王。都拉尔上台后，仅八个月的时间，就闹得天怒人怨。这个都拉尔王整天过着花天酒地、养尊处优的生活。左有娇妾，右有美妾，呼奴唤婢，贪酒好色，吃喝嫖赌，为所欲为。由于他无所不好，穷奢极欲，横征暴敛，大兴土木，闹得老乡们不能安居乐业，有的流离失所，无以为生；有的典卖仅有的衣服牲畜，交纳赋税。都拉尔王不管民间疾苦，不问群众生活，老乡们哭号无告，敢怒而不敢言。特别是蒙古群众，更是在奴隶制度下过生活，有人丁差、加头税；有的背上吃米为王爷轮班服役，名曰坐班制。为王府听差，少有迟慢，不是挨打，就是受罚。还规定下一套封建的压迫人民的残酷刑法，有绞刑、杀头、活埋、徒刑；设置的一套刑具，有手铐、脚镣、脖锁、皮鞭、木狗子、竹板子、禁闭室、监狱；王爷独操生杀之权。他规定仕官以下犯轻罪的鞭五十，庶民犯错误的鞭

^①管旗章京——见29页注^③。

^②跳鬼——或称跳神，喇嘛教攘灾的仪式。在一定的节日，喇嘛们戴上各种面具，来往跳跃，表示以神的威力驱除灾魔。

一百，犯重罪的则任意处罚。在当时情况下，真是人人自危，朝不保夕，看见王爷如见活阎罗一般。只有毛呖肯在王爷面前吃得开，他还敢说话，所以人们有事都求他办理。

图们巴雅尔借毛呖肯的力量，也出入王府。他看见都拉尔王威风凛凛，作威作福，不可一世，也是十分畏惧。蒙古人平素见到王爷如接天神，见面先送哈达，跪地磕头，虽在水深火热中过生活，也是敢怒而不敢言。他长叹一口气说：“这样的灰王^①长久不了！”这时毛呖肯正听见他的长叹，就笑着说：“我看王爷这种做法也长不了。他少年得志，趾高气扬，贪酒好色，影响健康。一旦不幸，连个继承人也没有。你既是台吉，不一定还有争王位的希望呢！不过争王位也不简单，第一得有福分，第二得有机会，第三得有心腹人给活动，第四得有群众拥护，第五得有钱打点^②，第六得是‘台吉’。”图们巴雅尔问需多少钱，毛说：盟长王爷那里得走水礼^③，将军衙门得送人情，理藩院也得花钱，到处需钱，最少也得千头八百两银子。图们巴雅尔知道自己财力达不到，便不再问。

这时包头街上为敬神正在演戏，官家为了筹款，允许放赌，到处宝棚满座。图们巴雅尔即去包头，仅以四天的时间，就赢了三百多两银子。不久都拉尔王因贪色过度，病魔缠身，医治无效，病势日见沉重。图们巴雅尔到王府探听病情，毛呖肯说：“王爷的病屡治无效，看来不行啦。一旦有个三长两短，他们二苏木的台吉，按行辈只有萨尼萨达能继承王位，可他现在只有八九岁，能行吗？民不可一日无主，看谁能争这个王位吧。”图们巴雅尔本是一苏木的台吉，只因高祖输了官

①灰王——内蒙古西部地区方言，“灰”即坏的意思。

②③打点、水礼——内蒙古西部方言，行贿之意。

司，失掉了争王位的机会。现在已经够五辈了，又遇上这样的机会，只恨自己家贫，没钱办理。他素与史家哲子大地主史套相交甚厚，遂到史家谈及此事。史套本想勾结封建王公，以保持他的地主权利。认为如果帮助图们巴雅尔争到王位，自己是第一功臣，于是史就答应给图们巴雅尔垫一二千两银子，实现图们巴雅尔当王的目的。图们巴雅尔得到史套的支持后就找毛呖肯设法活动。

这时王爷着人来叫毛呖肯去谈话，嘱托后事。毛见王爷面色黄白，朝不保夕，就进行了一番安慰，说：“希望王爷好好养病，我再给您去包头请名医去。无论如何，也得设法赶快治好您的病。”王爷笃信鬼神，说：“夜来得了一梦，梦见父亲叫去。恐不久于人世啦，给我安排后事吧。我继王位以来，才八个月的光景，没想到一病不起。我们南商自清初封王以来，连我才十三辈，都是勤政爱民，深得旗民拥护的。我少年得志，不能克制自己，把身体搞垮，危在旦夕。谁能继承王位呢？我打算把萨尼萨达过继^①，恐他年幼无知，希你们研究考虑吧。”言讫而卒。

毛呖肯找来东官府伊里肯、白通达耳居巴图等，商议治丧，请喇嘛念经，通知各参领^②大小官员，备礼送殡。有的苏木赶来马、牛、羊，有的带上银子、大烟来旗随礼，为王爷治丧送殡。送葬之日，全体穿白带孝，如丧考妣一般。达旗的政务暂由伊里肯（东官府）代理，并研究继承王位人选问题。图们巴雅尔因平素同毛呖肯过从甚密，又知道萨尼萨达年才八岁，不能代理王位，认为机会难得。他又平易近人，在群众面前也有威信，就暗托毛呖肯代为活动，并说事成之后，毛的职位永

^①过继——收作自己的孩子。

^②参领——见43页注^②。

远保持，花钱问题有人支垫。事有凑巧，萨尼萨达的生母接到娘家急信，说老母有病，思女心切，速盼早归，便带上八岁的萨尼萨达回土默特旗探母去了。东官府伊里肯虽暂代王位，但他是个没主见的人，整天胡吃闷睡，外人称他“睡不醒”。毛呖肯受图们巴雅尔的委托，又贪恋职位，遂与伊里肯商议，并送了一批银子、大烟，买通伊里肯写份公文，言说王爷升天，无人继承王位，共同议定由远房台吉图们巴雅尔代理王位。并让图们巴雅尔筹借银两，由毛呖肯和耳居巴图先到盟长王爷那里进行办理，暗将水礼送给盟长，并又打点左右，多加美言。那时的盟长系郡王旗的王爷，原是轮选出来的，对各旗的王位继承问题，了解不够清楚，不便过于认真，遂允其请，批准上报归化城^①将军衙门。毛呖肯带上公文到了归化，又花不少银两，才转报北京理藩院。事情办理得很顺利，共花银子一千二百两。

图们巴雅尔王位到手后，认为是一步登天，喜出望外。诸事安排就绪，通知各旗官员来旗庆贺。择于正月廿日在楚格拉大会^②上开印即位，并由毛呖肯一手筹备，大摆喜筵，杀牛宰羊，祭天地、敬鬼神。凡来庆贺的，每人领酒一大杯，说这是新王爷的喜酒。由于敬酒的人多，图们巴雅尔也喝得酩酊大醉，尽欢而散。

图王自即位后，由于出身牧民，亲身体验过群众的疾苦，知道百姓的困难，大改都拉尔王的吃喝玩乐、横征暴敛的腐化作风，奋发图强，励精图治，与民休养生息。根据旧的一套统治人民的编制，让东协理（也叫东官府）总管全旗的升迁调补、民事纠纷及应兴应废的一切事务。西协理总管财政税收等。在东西协理的领导下，让“加克尔齐”总管全旗的行政事

^①见29页注①。

^②楚格拉大会——见33页注①。

务及外交等。在这以下，又有东西梅伦，分别领导八个参领区，四十六个苏木。将不称职的及贪污腐化民愤大的撤职查办，又将蒙民的户口地作适当调整，并给没地没牲畜的蒙民，调拨了土地牲畜，蒙民甚为满意。蒙民对种地不甚习惯，因而他们大部分又将地租给汉人种。蒙民则专以放牧为生。同时他们对做奶食方面也积累了一套经验，有奶饼、奶油、奶皮子、酪旦子^①、奶粉、奶茶等。因此在图王的初年时代，人民安居乐业，太平盛世。

图王考虑到将来萨尼萨达可能与他争夺王位，暗与心腹计议，不如早作打算，斩草除根，免留后患。便差心腹带着信件前往土默特旗迎接小王回旗，行至云寿村时，使小王服毒而死。

图王大权在握后，由于撤换了大批官吏，渐渐实行独裁集权制，事无大小独断独行。但只有对毛昉肯与耳居巴图，因办理王位有功，稍受重视，而且对这两人也有所顾忌。其次对大地主史套，也敬之如宾，有时与史套同车逛庙会，亲近无比。图王执政后，即布告禁止赌博。他在公余之暇，为了消遣，常率三五侍从，驰马郊外射猎。他的箭法纯熟，时有收获，兴趣所在，风雨不避。他常说：“人不能饱食终日，象前代王爷那样，醉生梦死地虚度光阴。”并以此教育他的子女。他生有两个儿子，长子名逊博尔巴图，次子名清克力巴图。逊博尔巴图个大身长，体格肥胖，声音洪亮，貌似其父，幼读蒙书，长学汉语；清克力巴图则面带忠厚，懦弱无能，常受其父训斥。逊博尔巴图聪明，常得其父的宠爱，其母对之更是娇生惯养，学会了养尊处优的一套享乐生活。因他父亲对他约束很严，常避不见面

^①酪旦子——即奶酪。

但他也很能体察他父亲的颜色行事。当他父有病时倍献殷勤，亲自煎汤熬药，侍奉在侧，博得其父欢心。祖母对他也很溺爱。他常利用祖母的庇护，惹事招非，又借封建王储权势，欺压人、打骂人，人都敢怒而不敢言，还得给他跪地磕头求饶。他稍不如意，即暴跳如雷，鞭打群众，特别对待奴才们，更是暴虐无比。有些使女更是不堪他的蹂躏，除常挨打外，稍具姿色，即强加奸污。这种事情，图王初尚不知，时间长了也有耳闻，乃厉加追问，逊博尔巴图拒不承认，图王也无可奈何。蒙民一提起王储，都很愤恨。

图王到了晚年，认为政权巩固，也就对仕官们的监督有些松弛了。有一次让毛呖肯检查一件人命案，毛认为发财的机会到啦，就带着王府的卫士们亲到现场验尸，证明确系被人杀害。遂横生枝节地召集当地参领、苏木达等，说这个人命案必须追查清楚，捉拿凶手，限十天内将凶犯查获归案。参领、苏木达慌了，就无中生有地以三十里为近邻，四十里为飞邻，在这范围内的都算是凶手。吓得老乡们坐卧不安，都怕坐牢，就没法疏通毛呖肯，送银两，送大烟。毛呖肯满载而归，对这个人命案也就不再追查了。

这时，正是帝国主义势力大肆侵入中国的时期。帝国主义借传教为名，到处盖教堂，收教徒，扩张宗教势力。在达旗大小淖^①盖天主教堂，神甫们披着宗教外衣，凭借帝国主义的权势，欺压善良百姓，借机霸地霸产，奸污妇女，引起了反教事件。全国闹义和团运动，烧教堂、杀洋人。其后八国联军进北京，满清政府割地赔款讲和。达拉特旗也赔款三十七万两，闹得民穷财尽，天主教的势力更加猖獗。大小淖附近

①大小淖一村名。

成了帝国主义宗教势力范围。直到解放后，进行了土地改革，才将帝国主义势力彻底清除。

满清政府在入关定鼎之初，知道蒙古民族强悍，不好统治，乃采取怀柔政策和笼络手段，对各蒙旗王公贵族上层人物，论功行赏，封王赠爵，规定让各旗王爷三年去北京朝拜皇帝一次。图王继位后，也随盟长王爷去京朝拜光绪皇帝，蒙亲赐御宴，优礼相待。图王经过这次朝觐后，更开阔了眼界，游览了名山大川，学会了一套官场习气。回族后，大摆威风，官气十足，把艰苦朴素的作风，几乎全部丢尽。他头戴红宝石顶子，身穿黄缎马褂，威风凛凛，大有不可一世的气概，群众望而生畏。

图王戴的顶子耀眼夺目，细致美观。每次去包头，都是全身披挂，轿车卫士，前顶马^①后跟随，二十余人进行护送。蒙民路遇，如接天神，夹道跪送，叩头行礼。由于他出生在参领区，认为一参领区是他发祥地，便规定一参领戴红顶子，其他参领戴兰顶子，苏木则戴白顶子；一参领到王府能坐下与王爷谈话，其他参领没有专设座位，见了王爷先行跪拜礼，然后再谈话。有一次王府的使女们为了开玩笑，偷把王爷的顶子衣服穿着取乐，正遇参领们觐见，不分皂白，即跪地磕头，闹得哄堂大笑。

图王在位十年，最后身染重病，到处请名医，不见疗效；又请喇嘛医生，也不见痊愈，病势日渐沉重。又去包头医治，终因气血双亏，转成不治之症。当时笃信鬼神之说，又请巫婆神官，烧香许愿。神官说前十三代王爷将他控告了。图王一闻此言，心中十分畏惧，更增加了病势。图王自知不可救药，乃

^①前顶马——派骑兵卫侍，在前面开路护卫。

厚賜神官，并召集仕官們到床前安排后事，略謂：“各位隨我多年，方期共享太平，不幸我病入膏肓，恐不能久於人世。百年後，望扶持王儲遜博爾巴圖襲承王位。要體念我的苦心經營，慎勿辜負我意。”言罷不久即逝去。圖王死後，仕官們共議立遜博爾巴圖為王，繼承世襲職位。

（二）遜博爾巴圖王朝

一九〇七年（光緒三十三年）正月，遜博爾巴圖在老爺廟營盤內宣告承襲王位。同時派人去盟長處報喪，並報請批准承襲王位。圖王出殯之日，盟長親派仕官來旗吊唁，各參領、蘇木齊來送殯，又請喇嘛為之念經祈禱，請來風鑑^①為之選擇占地，葬儀異常隆重。為了慶祝新王即位，遜博爾巴圖又派人去包頭請來名廚師，殺牛宰羊，各辦酒席，大宴來賓及僚屬，用蒙古最隆重的“五剎禮”^②招待來賓。同時還以演戲、摔跤、賽馬、跳鬼、唱歌助興。又暗示八大參領地區的地戶，動員群眾，慶賀新王，送幃子，送銀盾，送大烟，送牛羊。讓每參領區選送名馬一匹，名曰八駿馬。這期間共演戲四天，每天都是大擺宴席。遜博爾王初即位異常高興，在席間也講了些一定繼承先王遺志，勤政愛民，上報國家厚恩，下謀群眾福利等冠冕堂皇的話。

遜博爾巴圖上台後，初尚遵守其父遺志，循規蹈矩，不敢奢侈浪費。其後就漸漸變樣了，嫌使女人少，又下令選了二十多個幼女，進府服侍王爺；挑選了十多個青年，擔當勤務；又組織了一連衛隊，守衛城防。在擴大編制的情况下，房舍也不夠了，

①風鑑——地輿先生，專為人選擇墓地。

②五剎禮——即整羊席。

于是大兴土木，修建扩建华丽的王府，修城筑墙，增强防守力量。吃的嫌不对口味，又调来包头的名厨师包做酒席，奢侈浪费，不一而足。他吸食鸦片，有专人给他烧烟泡，每天就得一两烟膏。在达旗王府还嫌寂寞，又在包头彭贵人巷和金龙王庙巷各买下房院一座。每到春暖花开之际，携带娇妻美妾坐上轿车，前呼后拥地去包头游览散心。他为了联系包头的军政大员，经常摆酒请客。每次总是宾客盈门，高朋满座。正因为应酬频繁，开支增大，因而不得不巧立名目，增加苛税。除应纳的税收外，他又增加养兵费、人丁差、水草费、靠圈费等。劳动人民本来收入微薄，哪经得起如此盘剥。丰收之年尚可勉强维持温饱，一遇荒年饥岁，人民就流离失所，饿殍载道。逊王只知享乐，那管群众疾苦死活。他常说：“地上长的一根草，天上飞的一只鸟，都是我王爷的。群众谁不满意，请走他的！”

当时有些人不甘饥饿，相率参加了哥老会、青红帮。初尚讲点道理，继则聚众逞强，以强迫入会为名，实行勒逼财物。善良人民无法生活，相继为匪作歹。当时民歌有：“二十五旅马二营，后边跟着杨二红。小五杨是哥老会的总龙头，谁要随了哥老会，吃饭、穿衣不受穷，谁若不随哥老会，被刁、被抢白送命。哥老会，闹得凶，杀人放火进北京。”逊王由于兵少，寡不敌众，整天住在包头不敢过问。当时还有杨猴小、陈得胜等匪首，有的聚众三四十人，有的一两千人，到处流窜。有的说：“三只大枪两只牛（即八音手枪），当下当起小班头。”后来逊王请来官兵进剿，才平息一时。

辛亥革命之际，外蒙宣告独立后，逊王曾命巴彦公率三百人与卢占魁一起去过外蒙。其后卢占魁哗变为匪，聚众六千余人流窜内蒙各地，到处骚扰，达旗受祸尤烈。逊王又请来萧司

令进行堵截。卢占魁窜至南老山，又与大耳佛爷合流，行至黑牛沟，才被打散。达旗经此浩劫，闹得十室九空，大伤元气，民穷财尽，不堪收拾。

逊王一生共娶过五个女人。他的原配，后套人，早死；第二个女人是归化文哲辉（满清都统）的女儿，所生两个儿子。长子是康达多尔济（即康王），次子是章巴拉多尔济（即是章景文）；第三个女人是北京汉人，姓蔡；第四个是满洲人，生下汪鹏程；第五个是蒙人。姓蔡的女人原是北京天桥说鼓书的，说一口很流利的北京话，善于交际应酬。逊王去北京朝觐时，在天桥结识，带回达旗，形影不离。逊王为了表示对她的宠爱，让王府仕官们跪拜迎接，引起仕官们的不满。有的说：我们真下贱，见了姨子女人也得叩头跪拜。当时有西梅伦阿尧尔色那心中不悦，说：“谁要叩头就叩去吧，我是不会去的。”因而闷闷不乐。在逊王带蔡女回旗后举行的喜庆宴会上，逊王看出阿尧尔色那不满，故意向他敬酒，阿拒不饮，并说：“我去撒尿。”逊王怒形于色，随即不欢而散。阿尧尔色那气愤之下，当天即回恩克背老家，暗行串联群众，揭露逊王如何荒淫无道，如何横征暴敛等种种罪恶事实，号召蒙、汉人民起而抗议。群众本来受尽压迫，已经忍无可忍，听到号召，都很拥护。在群情激愤的情况下，便闹起了“独贵龙”运动，提出请愿书十三条。其中有不准出卖达旗土地，必须把蔡夫人驱逐出境等。逊王阅后，拍案大怒说：“好个小小梅伦，竟敢聚众造反。”随即商讨对策，有的说事态不宜扩大，应当慎重处理；有的说应当派兵镇压。最后决定先礼后兵，派西官府乌力吉巴达尔胡携逊王亲笔函前往宣慰，严禁继续捣乱，否则决不轻恕。群众听到恐吓言语，更加愤怒，将西官府团团包围，在众怒难遏之下，对西官府拳打脚踢，几乎要了他的老命，经阿尧尔色那力劝，才将

他放回。逊王一看西官府受了重伤，更加气愤。当时在座的白通达林德山说：“这是群众暴动，须用缓兵之计，暂时接受他们的要求，比较妥当。不然上级见责，恐受影响。”逊王认为此话有理，就接受了群众的部分要求，对蔡妇一字未提。接着又派白通达林德山再去恩克背进行商谈。白见了阿尧色尔那，说明王爷接受群众部分意见，允许从长计议。但是群众认为这种含糊其辞的答应，不能满足要求，知道打了西官府，王爷不肯轻饶，一不做，二不休，又把白通达打了一顿。

逊王看骑虎难下，遂派登二秃带队前往捉拿阿尧尔色那，必要时可当场打死。阿尧尔色那虽有部分群众拥护，但毕竟少枪无马，自己又无战斗经验，于深更半夜被登二秃等包围，当场将阿打死，取下头颅，带回王府。群众见阿为蒙汉人民的利益遇难而死，群众义愤填膺，誓为阿报仇，遂公推莽格奈组织力量，并邀集柴登、呼如哥、红海补拉米老爷（忘其姓名）及召滩尔什全林召五处人马，约八千余人，于四月十四日，将逊王府围了个水泄不通。王府卫兵人人自危，逊王吓得面如土色。激战一天，“独贵龙”军的带队指挥官高德海大呼攻城，被王府卫士一枪射死。逊王也急于求和，允许派人协商，一定满足群众要求，才得解围。这是一九一五年（民国四年）的一次人民群众反抗统治阶级的斗争。

经此教训后，逊王也知众怒难犯，从此小心谨慎，不敢再为非作歹，颇有一番政绩，群情也逐渐缓和。民国七年，郡王旗的盟长王爷逝世，逊王又升为伊克昭盟七旗的盟长王爷。在开印那天，逊王通知全盟参领以上全来庆贺，并携带水礼。这一次收到大量的金银珠宝和各种礼品。

逊王自从当了盟长，更是耀武扬威。每次出行，都用绿围子轿车，前顶马，后跟随，前呼后拥的卫士不下三四十人。逊王

为了显示威风，又旧事重提，将曾参加“独贵龙”运动的胡日格扣捕回旗，脖子上带了八十斤重的铁链，关押了一年，一直囚禁至死。

逊王晚年，开支浩繁，为了筹措款项，又把王府附近的可耕土地尽行放垦，出租给汉人八家大地户，号称“八大家”。这些大地户狐假虎威，欺压穷苦农民，把到手的土地转租给贫农，地主吃股子，有的是三七分，有的四六分。为了收租，他们又私立公堂，凡交不上租的，即扣押勒逼，不少被逼得鬻妻卖了，妻离子散。

逊王极为忌恨那些聪明有才干的人。尤其对台吉中的佼佼者，怕争夺他的王位，视为眼中钉，必欲设法清除。当时有一小台吉，聪明过人，常在逊王面前耍小聪明，显露自己。逊王怕他而又妒嫉他，竟诬以勾通哥老会，将这个小台吉打死。逊王对比其亲生子聪明的孩子，都不让入学，扬言说：“凡聪明的孩子都是顽皮不好学。”实际上是怕人民有了知识不好统治。逊王一生，对达拉特旗的蒙民，采用愚民政策，不设立学校，所以达旗蒙民的文化在伊克昭盟来说，是最落后的。

逊王自打死那个小台吉后，自知屈杀无辜，整天坐卧不安，心神恍惚。惟恐群众为小台吉报仇，为阿尧尔色那报仇，遇机行刺，乃加意防范。因他居住的房不够坚固，夜间设卫士轮流守夜坐班。看到所住的营盘不够高，则培土加高加厚，亲自督工修造。一九二三年十月廿日，他吸罢了鸦片烟，喝足了清茶后，携带警卫，亲到城墙上检查工程。猛然觉身体不适，急回寝室，得了中风不语之症，次日天明就死了。

(三) 康达多尔济王朝

逊王死后，当由各仕官筹备治丧，并召开了五金肯会议^①。在会上，有人主张立即将盟长印玺交与副盟长转报上级；有人主张先上报康王袭位，再交印玺，这样免去盟长批准一关，可节约很多水礼。最后决定秘不发丧，先用盟长印信转请上级立康达多尔济为达拉特旗王爷。到了一九二四年正月经批准康王即位后，才把盟长印信交与副盟长。

康王自幼浪漫成性。其父在世时，曾因屡教不改，将他送交绥远都统马福祥代为管束教育（因马福祥与逊王交厚）。马迫于情面，委康达多尔济为上校副官，出入都统府，住在其外祖父文哲珥家中，让文也相应地加强教诲。但文年老多病，马忙于公务，对康很少有教育机会；而且迫于情面，不便过于管束。二年之后，康积习难移，仍将其送回达旗。逊王看其浪荡不羁，恐不能继承王位，有废长立幼之意。由于逊王急病而死，康王才能继位。

康王身体细长，面貌黄瘦，声音洪厚，由于从幼浪漫，全是一派大少爷作风。继承王位后更是无拘无束，作了一个浪荡的王爷。吃喝嫖赌吸，无所不好，花钱不数数，挥金如上。继位三五年，即将其父搜刮的元宝一千八百多个（每个五十两），烟土一万多两，另外还有金条、首饰、珠宝、玉器等，全部挥霍净尽，约计二十余万元。逊王一生最贪财、吝啬，其子又最挥霍浪荡，形成强烈对照。

康王自八岁入学读书，一直到十八岁；二十岁上袭了王

^①五金肯会议——旗衙门五位主要官员的会议。

位，至四十四岁死去。在这二十五年中，共挥霍了其父遗产及王府每年各项收入与放垦款约五十万元（硬币）。他除吃喝嫖赌外，喜好骑马射击，据说有百步穿杨之能。还好玩汽车、钟表、照像机三种物品，不论何时何地，手中如何困难，只要有新的产品或新的式样，他总要设法向人高利贷款置买到手。如遇机件发生故障时，他还不厌其烦地自己修理，经常自己开上汽车，驰骋取乐。在他念书时期，好耍小聪明，好捣蛋。由于身为王储，无人敢管，养成骄横脾性。在十二岁时就和左右婢女做了许多淫秽不堪之事。

康王一生共娶过六个女人，原配是准旗蒙人，早死。第二个女人是绥远满族举人锡蒙九之女，因嗜好鸦片病死。一九三二年他同时娶了两个十八岁的女人，都是满族。一个姓关，一个姓唐，同一天结婚，同入一个洞房，不分正偏，规定谁先生下男孩子谁为正室。后来关因生下康孝宽，立为正室，唐为偏房。不久他又把本旗的奴才阿哥拉（汉名阿培华）收为庶妾，为第五个女人。阿培华姿色秀美，康王最为宠爱。在抗战期间，因康王投降日本，被马占山将军扣解榆林时，因照顾其是封建上层，又在榆林结纳了一个汉族妇女，婚后数月又退亲了，为第六个女人。这些女人自入王府后，均染有鸦片嗜好。

康王吸食鸦片的工具精巧绝伦，都是名牌商品。如太谷烟灯，寿州烟斗，苏州钎子，真正象牙制做的烟枪，其他零星工具，也都是名贵珍品。他吸的是清水净烟，烧制烟泡，设有专人。康王吞云吐雾，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康王自三十岁以后，又染有海洛因嗜好，每天得一两多。因购买费款，且需派人到北京采购，往返途中诸多不便，遂精心研究，学会自做。常与关、阿二夫人秘密制造，整夜不睡，日出才就寝，真是晨昏颠倒，日夜不分。每到夜静更深之际，才进午餐。所以王府

的男女人员，均染有吸毒嗜好，非此不能适应王府生活。

康王挥霍无度，只要喜爱的东西，不计花钱多少。他曾到北京汽车行购妥一辆汽车，已交纳六千白洋，尚未取货。又到天津看到一部流线型的汽车，随又用一万三千元买回。北京汽车行的汽车款全部浪费。他一生除将库银和逊王遗产挥霍外，又将后套土地大部出卖。一九二五年他将后套西部土地报垦，成立达旗地亩局，后改设治局，又改为临河县，约放土地一万余顷。一九二八年又将长济、塔布、洋堂三渠约土地四五千顷，隆兴长桥东街可耕地五六百顷，相继报垦。一九三一年又出卖了义和渠约一千顷，一九三三年把后套东部二三千顷全部报垦。因而引起蒙民的反对，积极组织“独贵龙”运动，后经驻军镇压及仕官们调处才算平息。

康王报垦收费的办法亦很巧妙。垦局也感难以应付。向来蒙旗报垦，由垦务局划界勘放，转给农民，先种地后收款，按百分之三十五交给蒙旗。但康王则硬要于报垦时即提款三成五，名曰予支押荒款，否则即不报垦。康王一生挥霍之款，祖遗财产约占百分之五十，垦款约占百分之三十，其余开支，则是达旗的收入。挪用的维持费流通券一万五千元，赈灾款一万元。康王初上台时，大成官府（康王的从祖父任西官府）和管旗章京等有时尚加劝说指责，他也有所忌避，迨后劝也不听，仕官们因系属下，无可奈何，只好听之任之。

康王由于嗜好多端，嫌住达旗不便，经常住在包头，接交拉拢当地机关及驻军长官等。包头王府车马盈门，高宾满座。室内陈设华丽，洋烟灯、麻将牌应有尽有。叫条子玩姑娘，司空见惯。一夜之间曾花过一千余元的硬币。他在包头有几个酒肉朋友，最知心的如南汉三（电话局长）、胡××（电报局长），时称浪荡三侠。他们常在由美斋钟表铺王老板处打麻

将，叫姑娘，吃喝玩乐。由于康王挥金如土，大手大脚，满不在乎，人们多利用他的“豪爽”来“揩油”。特别是驻军长官们为了消遣取乐，经常到其王府打麻将、吸大烟。他吃饭的地方是福聚成、聚德成两家饭店，凡由京津一带运来的名贵珍品，都要先让康王尝试，再行出售，把他看作财神爷。专为他设下最漂亮最能干的女招待，吃饭不收现款，有的年底清算，有的月终结帐。另有贩卖鲜货的天津人，也是逢迎康王，把运到的鲜货（如鲜桃、鸭梨、苹果等）先送王府，由康挑选后再行出售。他常说，人生一世，好活一天算一天，管它明天与后天。

由于康王荒淫无度，不理旗政，造成仕官们营私舞弊，上下争利。有个名叫奇小朋素的，系西官府耳居巴达尔呼的奴才，看到西官府的倒行逆施，于一九二四年将耳居巴达尔呼打死，畏罪潜逃。康王大怒，因扣捕未获，遂将奇小朋素的全家老少捉进官府，披枷带锁，追逼送案。其后又将其亲朋好友一同拿问，共计二十多人。一九二五年开印时，竟当众宣布，将这一伙人全部枪毙。可怜这二十余人无辜惨死，人皆目不忍睹，耳不忍闻。康王却得意洋洋地说：“这些家属包庇坏人，可杀不可留。”

是年四月西北军冯玉祥来绥远后，曾一度宣传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统治等先进口号。康王的舅父三道尔济，系逊王第一个夫人之弟，思想进步，响应这一号召，由包头来树林召向喇嘛进行宣传，并与黄维世、恩肯八赖一起参加了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一九二七年，奉军万福麟占领包头时，到彭贵人巷康王府追问达拉特旗有无红党，如何处理。康王借此机会，将恩肯八赖叫至罕太畔处死。又将其舅父三道尔济捉到树林召王府，未进城门，康王站在城墙上，让捉的人闪开，亲自举枪

将其舅父击毙，以显示自己枪法的准确，左右为之喝彩。当时黄维世亦被捉住，因黄为东官府协理台吉的女婿，经康王的秘书张韵荪解劝始免于难。以后还要打算追查其从叔父西官府布伦巴图，诬其与三道尔济生前有勾结，经仕官们说情，才告无事。这一时期，军阀混战，对各蒙旗内部事务无暇过问，因之康王独操生杀大权，如此暴虐专横。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为了维护其统治，尽量利用蒙古上层人物，以蒙古人治蒙古人，对康王的杀人违法行为，一概不加过问。这样康王就成为当地的一个最残暴的土皇帝。

“九一八”事变后，日寇疯狂侵略中国，推行满蒙政策，利用德王（德穆楚克栋鲁普）在百灵庙搞什么内蒙古自治。康王也积极响应，并派大员驻在百灵庙伪组织内进行策划。康曾亲去一次，秘密联系。当时绥远傅作义为了拉拢蒙旗，不影响税收，也在绥远成立绥境蒙政会，请康王担任委员兼实业处长职务。南京政府也对蒙旗采取笼络手段，给予物资方面的援助。康王趁机在平津沪宁各地奔走，穷奢极欲，把达旗更搞得一团糟。

一九三七年日寇大举侵华时，凡有爱国心肠的人士都参加抗战救亡图存的事业。当时康王为了巩固王位，采用两面手法，一面声称抗战，一面暗中勾结日寇，组织了三个地方团队，以森盖为第一团长，乃未代为第二团长，土布吉尔格勒为第三团长。待日寇占了包头，他暗派森盖与日寇取得联系，双手将达拉特旗交与日寇。凡过境的抗日部队，他受日本指示，进行截击，认贼作父，甘当日本走卒。当时马占山途经达旗，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六日派人伪装成日军，前来康王府。康王煞白通达孟克不浪迎接回府，及看出破绽，已无法抵抗，康王束手就擒，当被捆走，连袜子都没穿上。王府卫队全部被缴械，

康王只带一个副官兰庆如跟随。马占山部对王府进行严格搜查，将金银珠宝席卷而去，大烟膏子劫走几大瓮。康王被解押到榆林，乘飞机解往重庆，经一年多的反省，恢复了自由，携眷到了陕坝，仍回达旗，继续统治。

康王经此教训后，思想有所转变。认为当汉奸是可耻的行为，乃一心一意依靠蒋介石、傅作义等维持他的王公地位。傅作义乘机侵入，以组织训练达旗民众抗日为名，成立了达拉特旗组训处，对汉民实行统治，把全旗八个参领区建立了八个乡公所（即以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字为名），乡以下又设立保甲制度。康王的权力大为削弱，仅能统治全旗少数蒙民。为了争夺行政权利，一九四七年达拉特旗与组训处大战于耳字坨，把蒙旗八个参领的兵力组织了三个团，将组训处团团包围，双方互有伤亡，后由傅作义的东胜警备司令陈玉甲进行调解，始告平息。组训处为了防备自卫，也组织了三个团的自卫队地方武装。因双方培植武力，交纳双份银粮，加重群众负担。加之这些武装部队缺少训练，纪律不严，因而官匪不分，你抢我夺，骚扰不堪。康王迫于傅作义的势力，对组训处虽内心仇恨，但也无可奈何，造成旗与处并存的局面。康王说：“只要不影响我花钱就行。”他不论什么钱，到手就花，连上级拨发的办教育款五百元也都花了。

康王共执政二十五年，荒唐了一辈子。一九四八年包头第一次解放，他病死在彭贵人巷。其子康孝宽年才十一岁，性顽皮，不爱念书，由于娇生惯养，常常欺压、打骂奴才们和左右人员，如他父亲小时一样恶劣。康王因子年幼无知，遗嘱让其弟章景文暂时代理王位（扎萨克）待孝宽成年再行袭位。并嘱咐对孝宽加强教育，培养成人。章景文按照遗嘱，报呈盟长及绥远省主席批准，暂代王位。这时其三弟汪鹏程正在南京政府蒙

藏委员会，听说其兄康达多尔济已死，立即收拾行装，带着行军夫人曹惠芳，奔回达拉特旗。看见二哥代理王位，心中不服，召集了卫士荷枪实弹走进王府，立逼章景文将印信交出，自立为王，章景文本是软弱无能之辈，一见情况不对，遂将王位让出。

汪鹏程自攫到王位后，大摆王爷威风，嫌房舍简陋，立即在树林召动员群众新建王府，选青年，捉民女，充实王府。因“加克尔齐”杜发祥忠于其二哥章景文，汪即派卫士鄂四喇嘛将杜刺死。在赶庙会时看见蒙古民女乌龙桑生得标致（年十五岁），让卫士们抢在马上驮回王府。他代理王位虽不满二年，其横行霸道的罪恶事实，罄竹难书。解放后为了照顾其起义，又是蒙古上层，本着不究既往的精神，让其暂代人民政府的旗长职务，希望他主动赎罪，重新作人。但是汪鹏程恶性难改，竟联系德王，阴谋叛变，遂于一九五一年三月十六日受到人民的强力制裁，关进了监狱。三代王朝，至此结束。

一九六五年八月

阿拉坦鄂其尔事略

陶布新

阿拉坦鄂其尔（阿王），号宝珍，内蒙古伊克昭盟杭锦旗的扎萨克郡王，曾任伊克昭盟盟长等重要职务，为伊盟王公贵族中重要人物之一。他一生政治活动很多，兹仅就我所知和访问杭锦旗旗长色登道尔吉、杭锦旗政协副主席图们桑等所谈，写在下边。

阿王的父亲阿拉宾巴雅尔，曾任杭锦旗扎萨克亲王及伊盟盟长等职务。阿王年幼时在王府学习蒙文，长大在旗府担任金肯笔帖式^①，办理文书工作。他娶了三个福晋，第一个叫拉西朝克珠玛，生有长女奇默色楞；第二个叫明拉，是拉西朝克珠玛的妹妹，未生育；第三个叫赛吉德玛，是达拉特旗人，生一子二女。在他未娶赛吉德玛以前，曾过继阿尔吉卜彦色楞的孙子哈斯包特尔为子。阿王二十七岁，其父病故后，继承了杭锦旗扎萨克，从此官运亨通，不久即担任了伊盟副盟长职务。

阿王对于宗教信仰很深。信教主要是从政治着眼的。他在王府中专有念经室，室内陈设富丽堂皇，放着一些经卷。每天早晚，他穿上喇嘛服装，手持佛珠，正襟危坐地去念经。有时还召集各寺庙喇嘛，自带食粮前来旗府所在地的贝勒庙^②上，

①金肯笔帖式——主要秘书。

②贝勒庙——即贝勒的庙。

陪伴着他共同念经。他以为这样一来，可取得喇嘛们的好感，并通过宗教势力的帮助，取得人民的拥护，以巩固其统治地位。不意却因此引起喇嘛们的不满。以浩钦召的大喇嘛为首发起“独贵龙”运动，到盟长公署告了他一状。第一告他召集各寺庙喇嘛自带食粮到旗府所在地念经，是增加众僧负担；第二告他以王爷身份，穿着喇嘛服装是僧俗不分。盟长接状后，即把他叫去，当面做了申斥性的劝告，叫他不要再这样做。阿王碰了这个钉子后，便不再到各大庙去念经，只在自己王府中念。他知道宗教在蒙古人民中的信仰是很深的，要想巩固自己的封建统治，非借用宗教势力不可。因此，他于一九三四年，又专意把班禅喇嘛请到杭锦旗来诵经。这一来，招惹了伊盟七旗蒙古人民争先恐后地来参谒班禅。当时杭锦旗除设有几百座蒙古包外，又搭起了很多帐房，还不够朝拜者居住。蒙古人民在参拜班禅时都把自己世代积累的血汗财物踊跃捐献，使班禅一行人员都满载而归。阿王也因为把班禅活佛请来，在本旗提高了他的威信。

阿王不吸烟，不喝酒，饮食上也不大讲究，但却好阔气、讲排场。住则必有像样的王府，行则必备新型的汽车。在杭锦旗阿其楞图本来就有祖居的王府，却又在锡尼镇修建一座新王府，仅修建费一项就化了一万四千多元，再加府中豪华奢侈的设备，数目就更大了。同时因常去包头、归绥、北京等地办公或游览，还在这些地方置有府第。如归绥新旧城各置一处住所，每处均价值数千元。北京置有一处住所，价值一万多元。他坐的汽车旧了就买新的。除了以前曾买过两辆汽车外，在伪蒙时期又经西协理^①色登道尔吉在天津为他买过一辆崭新的

^①西协理——见29页注^②。

汽车，化了六千五百元。他平时广交游，好请客，每到归绥，绥远饭店、麦香村和风林阁三大饭庄，常能看到他的踪迹，不是他请人家，就是人家请他。尤其在兼任乌、伊两盟办事处处长后，更常是“宾朋满座”。据说有一个时期住客很多，一日就化招待费四百五十多元。他这样纵情挥霍，所需钱财当然是向人民摊派。因此他每到归绥、包头或北京等地走一趟，就要给本旗人民增加一项沉重的负担。而他则乐此不倦，目的是为了多拉拢当时的头面人物，巩固和提高他的政治地位和声望。但他对部属和家奴却非常吝啬，不但很少赏赐，还要求部属对他献赠。他心眼太活，变幻无常，对大的政治活动是这样，在小的生活方面也是这样。就以服装方面来说，他时而穿上蒙古长袍，打扮成旧式王公的派头；时而穿上喇嘛服装，打扮成佛门弟子的模样；时而又穿上军装，摆出高级将领的气派。他有一个最主要的思想，就是爱官。不仅是要千方百计地维护现有的统治地位，并且还尽力向上爬，做官是愈大愈好，兼职是愈多愈妙。他在抗日战争以前的一个时期，作了杭锦旗的扎萨克郡王、伊克昭盟副盟长、乌、伊两盟办事处处长还嫌不过瘾，仍然到处钻营找官做，就是空头的包头区防副司令他也肯干。他对百灵庙蒙古自治运动，虽然没有积极参加，并且还反对过，但是百灵庙蒙政会成立之后，发展他为委员兼实业处处长还不满足，还希望给他更大的官。嗣经伊盟盟长沙克都尔札布劝说，才勉强接受，虽心怀怏怏，仍遥领干薪。

他知道武力是巩固统治的有力工具，因此对组织武装，统率部队，颇感兴趣。在民国初年，就以防御匪患、保卫地方为名，着手组织杭锦旗游击队。一九一七年适逢卢占魁队伍里有个格尔计老五率领的一部分蒙古兵，形成流寇，到处窜扰，阿王便乘机向这一部分人进行了收抚工作。对自愿投降者，每人

发给帐幕、牲畜，还给妻妻安家，结果有四百多人归顺，编入了杭锦旗游击队。这些人安家落户，生男育女，不但成了杭锦旗的人，也成了阿王一股有力的亲军。他为了装备这个游击队，一九二八年曾亲赴归绥向李培基主席赠送马匹和毛毯等物，希求帮助。李培基拨给他一些枪械子弹，从此杭锦旗的游击队就有了初步的装备。在傅作义任绥远省政府主席时期，他更是常去谒见，馈赠礼物，进行拉拢。傅作义除了给他以枪弹外，还给了他一个包头区防副司令的头衔。一九三三年他又亲率西协理色登道尔吉前往太原面见阎锡山，献送马匹。阎当即拨给他三八式步枪一百支、山西式自来得手枪十支。他回来后就进一步扩充武力，依照国民党蒙藏委员会颁布的保安队编制大纲的规定，正式建立了杭锦旗保安司令部，自任保安司令。除把保安队扩编为两个团外，还编有两个直属警卫连和一个炮兵队，作为他的卫队。两个团长分别由东协理乌勒吉巴雅斯古楞、西协理色登道尔吉担任。全体官兵约一千二百多人，从一个蒙旗来说，真是一支不小的武装力量。所有官兵均系义务制，仅给服装，不给薪饷，所需给养，一律责成各营所在防区的人民供应。当然这又给人民增加了一项沉重的负担。

阿王认为这支武装是他亲手培养起来的，一定能够忠实于自己。不意第一营副官阿木古郎，自恃剿匪有功，骄傲蛮横，擅收所在防区捐税，打死四人，声言谁如告发，就处死谁。他把阿王也不放在眼里。当傅作义给阿王以伊盟区防司令的名义和拨给经费时，阿王私吞了经费，反叫杭锦旗人民均摊区防司令部所需各费。阿木古郎大为不平，就揭露阿王私吞公款的隐私，并力持反对摊派之议。事为阿王所闻，对阿木古郎恨入骨髓。适值阿木古郎与其舅桑杰感情恶化，有一次在喜庆宴席上，阿木古郎酒醉，大骂桑杰，桑杰也不相让，结果桑杰被阿

木古郎用木杠子痛打一顿，并扬言要杀桑杰的两个儿子。桑、阿二人因此到王府衙门打官司。当时阿王正去归绥，西协理色登道尔吉即将双方管押，并电阿王请示，阿王正要除去阿木古郎，即电令以擅收税捐、反抗旗府、杀害人命的罪名，将阿木古郎处死。色登道尔吉接电后，以处分过重，不忍遽行加害。旋又接到阿王电令速即执行，如再迟延，即以违抗命令论处。色登道尔吉无奈将阿木古郎在狱中处死。可见阿王排除异己的手段是多么毒辣。事后阿木古郎的亲属虽曾向盟政府告发，由盟派员调查此案，但来员因受阿王厚贿，竟以阿木古郎罪有应得上报了事。

阿王为了维持他自己的统治，还有他狡黠之处。如一九二八年杭锦旗遭受严重的旱灾，草原枯干，牲畜由于冻饿而死者甚多，以致民不聊生，纷纷逃亡。阿王面对这一情况，至为焦急。他知道如果杭锦旗人民跑光，自己就成了空头王爷，没有人民，也就没有税收来供他任意挥霍了。于是和仕官们商讨对策，大家一致认为发放户口地，给人民土地权，可以使旗下人民不向外跑。阿王采纳了这个意见，就给本旗每一户蒙民发放一里宽八里长的户口地一份，小召庙也给一份，大召庙给十份，总计达千顷。而对本旗官员也都发放户口地：协理每人六份，管旗章京和两个梅伦，每人四份地；其他官员们也都依照职位大小，分别给以户口地。另外，还发给土地执照，规定不许典卖，不许出租，不许闲置不用，只许合伙耕耘。在开始发放户口地时，每一份地收洋十元，无力缴纳的贫苦旗民，准予缓期交纳。保安队士兵不发放户口地，但得就地征收粮草和一切供应物品，并具体划定征收地区。至于收租标准，在平年每一犏牛收三斗五升糜子，丰年多收，歉年少收，无力缴纳者得酌量少收或免收。这个办法实行后，在旗居住的蒙民，便安下心来；外逃的

蒙民也陆续回旗要求发放户口地。取得户口地的蒙民，有劳动力的除自行垦耘外，均和汉民合伙垦种；无劳动力的却打破了“不许出租”的限制，转租与汉民耕种，一般是按三七或二八收租，各庙所得的户口地，也是这样转租。这样一来，榆林、神木、府谷、包头一带的汉民，纷纷前来租种土地。当时限定汉民春来秋往，不准盖房久居。但日久天长，禁令废弛，汉民也就春来而秋不往，盖下房子久居下来。这可以说是阿王把本旗人民拴住的妙法。在发放户口地当中，他还得了很多的肥沃土地，征收了很多的租金，真是名利双收。

阿王对于振兴教育，培养青年是漠不关心的。他在杭锦旗执政时间很长，仅设立国民小学一所。学生不多，设备简陋，时开时停，处于不死不活的状态。对于保送青年到外地求学，更是很少的事情。以致杭锦旗在解放前的长时期中，文化落后，知识分子极少。

一九三三年，德王（德穆楚克栋鲁普）在百灵庙发起自治运动，曾派员前来归绥和阿王联络。阿王当时力表赞成，曾将伊盟各旗王公名单开去，在要求自治通电上署名。嗣因迫于绥远当局的势力，又不敢公然参加，只是徘徊观望。尽管德王屡次来信催促，他仍是逡巡不前。接着就改变了态度，常去归绥和傅作义打交道，赴太原和阎锡山拉关系。据说他到百灵庙请班禅活佛时，曾暗中劝说各王公应当维持现状，不可与国民政府脱离。在蒙旗代表赴南京要求许可统一自治时，他曾和伊盟盟长沙王向绥远省府声明：“伊盟七旗不愿与乌盟共同组织一个自治区，愿自成一个自治区。”这个声明转到国民党中央发表后，惹起蒙旗进京请愿代表的反对，声称这是绥远省政府对蒙旗横施压迫恫吓所致。国民党中央政府却因为有了他俩的声明，将蒙古自治问题延搁了一个时期，才加以许可。一九三

六年他与沙王赴南京给蒋介石献马祝寿，得了很多的馈赠。这些都说明他始终不愿放弃国民党的立场，怕的是惹翻了国民党，丢了他的王位和官职。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德王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卵翼下，在归绥成立了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把伊盟列为统治区域。但日伪政权仅能达到达拉特、准格尔两旗的河东部分地区，不能控制全盟七旗。日伪积极争取阿王，作为号召伊盟各旗的招牌。一九三八年一月底，一面派伪蒙古军团长明安巴雅尔和日本指导官等率领部队三百余人，乘汽车到达阿王府，一面派方员顾问带同六辆汽车和士兵，胁迫鄂托克旗的扎萨克旺沁札布和鄂如根巴雅尔梅伦前往阿王府。他们会面后，坚“请”阿王赴绥。阿王推托要过新年正月初三再走，但始终不能推脱，终于在腊月二十九日随同去了包头，投入日伪的怀抱。不久日本又派飞机把他的第二个“福晋”明拉和他的养子哈斯巴塔尔也接到包头。

阿王投降日伪之后，德王和日本方面如获珍宝，极表欢迎。即将原封未动的归绥新城阿王府发还，并任他为参议。阿王也颇知趣，对德王是时往参谒，极力恭维，表示亲近；对日本人更是低声下气，表示服从。这样为时不久，他的官运就又亨通起来。日本帝国主义为了配合进攻西北和囊括伊盟，要在包头成立伊克昭盟公署，作为御用的机关，于是便任阿王为伊盟副盟长代行盟长职务，不久又提升为盟长，还兼任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兴蒙委员会委员。他是一个爱官如命的人，得到日伪这样的信任和优遇，便感恩图报，尽量设法争取伊盟各旗归顺日伪。如在达拉特旗大树湾举行成吉思汗大祭盛典时，他亲临主持，大力诱惑蒙古人民，拥护伪蒙傀儡政权。在伊盟发生“三二六”事变时，他曾秘密派员策动沙王归向日伪。为了拉拢各旗，

还在伪伊盟公署内给每旗设置参议一人。扎萨克旗是僧格林沁，乌审旗是孟和乌力吉，杭锦旗是仁亲旺济勒等，都分别负责联络本旗作投顺工作。

阿王得到伪伊盟盟长的职位，还兼任鄂尔多斯挺进军总司令，进一步抓军权。不期日本人为了拉拢实力派，把这个总司令的头衔，给了森盖林庆。因此阿王与森盖林庆之间就发生了矛盾。一九四〇年秋，阿王的副官吉儒穆图 and 卫士哈拉金前往杭锦旗保安队第二营防地，声称阿王叫保安队前去包头，归降日伪。第二营员兵未为所动，吉儒穆图等又去第一营策动，并有森盖林庆的连襟赵那逊从中煽动，结果第一营两个排长日克登巴吾、布仁胡受了诱惑，带同兵民百余人，跑向达拉特旗柴登地方，转往包头去见阿王。阿王说他没有叫杭锦旗保安队前来包头之事，这是森盖林庆打着他的旗号去叫的。又说：

“你们现在来这里也起不了多大作用。”变逃的兵听了阿王这一番话后，知道受了愚弄，在包头也受到当地伪军的歧视和欺压，就又逃回杭锦旗原防。阿王为什么要这样呢？这主要是权力关系，他不愿把杭锦旗的队伍编归森盖林庆掌握，怕的是自己将来成为光杆司令。

在经济上阿王与森盖林庆也有矛盾。日本帝国主义挑起太平洋战争之后，为了用日常生活必需品换取军用物资，特准由吴鹤龄一手操纵的“蒙古生计会”成立“豪利希亚”（即供销性质的合作社）。伊盟的“豪利希亚”由森盖林庆负责，并发给资金数万元。“豪利希亚”所经营的业务，是向蒙旗输入日用品，向外输出畜产品。一转手之间，获利甚多。阿王竟利用盟长职权，把这笔“豪利希亚”的资金扣留不发，森盖林庆大为不满，经一再追要，始发给一部分。

阿王在政治上向来是多方面拉拢，进行投机。他对德王、

对日本虽表示恭惟服从，但时间长了，他怕国民党政府回来，又暗与傅作义频送秋波。不意他密致傅作义的信件，竟为日本人所获。从此日本人对他就不能信任了。反之，对森盖林庆却很信任。这是因为森盖林庆在据守柴登地方时，曾为日本卖过很大的力气。因此，阿王不仅要对日本人表示恭惟，对森盖林庆也不能不敷衍。日本人虽知他有暗通傅作义的嫌疑，但因他是号召伊盟各旗的唯一招牌，仍希望他能起些作用，也就未作深究。

一九四一年日本人为了加强配合西犯的行政力量，特成立了西部临时行政区，把萨县、包头、安北等县市都划归管辖。因需要傀儡工具，又派阿王兼任行政长官，并把这个区和伊盟公署合署办公，设有总务、警务、民政、实业各处和警察队，都归阿王这个盟长统辖。接着伪蒙军为了扩大编制，增加力量，又把盟和行政区的警察队改编为警卫师第十二师，师长也由阿王兼任，下有三个骑兵旅。森盖林庆所统率的鄂尔多斯挺进军，也编成十二师的一个骑兵旅。于是阿王这个盟长有地盘、有军队、有政权、有收入，从而大大地过了他的官瘾，真可谓踌躇满志了。

一九四二年，吴鹤龄以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政务院长的身份，组织了“兴亚协进会，”发动各界献金、献铜、献铁，支援日寇。并且在张家口向经营鸦片业者勒索了一大批资金，购买了日本飞机二架，想为伪蒙军建立空军奠定基础。飞机买来后，在包头举行命名典礼，一架名为“天马”号，一架名为“飞虎”号。阿王是包头的军政长官，很想首先坐上去翱翔一番。不意日本人却抢先坐上，带着包头饭店的几个穿红戴绿的日本下女，飞在包头上空盘旋。日本下女还频以彩色手巾伸出机外，向观众示意。阿王这时很感难堪，认为自己是一个堂堂

的军政长官，还不如日本下女能首先坐上飞机。不料日本人在飞机上正兴高采烈低空飞行之际，“飞虎”号竟撞着电线，应声撞到一间房屋的墙上，机头钻入墙内，机身留在墙外，所有机上的日本人都被撞死。这时参与命名典礼的人员，都暗地替阿王庆幸说：“还是阿王爷命大。”阿王也就打消了对日本人的怨愤。

一九四五年，随着苏联出兵东北，日本无条件投降，中国抗战取得最后胜利，伪蒙疆政权宣告瓦解，傅作义派兵接收包头，阿王又摇身一变，投靠了国民政府。傅作义到包头时，阿王特率他的参谋长图布升巴雅尔前往迎接，表示恭顺服从，祈求取得谅解。傅作义为了拉拢阿王和他所属的部队，特给阿王伊盟保安师师长的职务。杭锦旗护理札萨克色登道尔吉即派东协理图门桑和梅伦布彦托克托胡等，率保安队三百余人，前往包头迎接阿王返旗。阿王为了抓权，竟限令色登道尔吉把印信送至途中交献。当时色登道尔吉因限于上令，未能照办。阿王返旗后，对色登道尔吉很不高兴，责备他在抗战期间为什么不派人到包头取联系，并仍催交印信。色登道尔吉为了顾全大局，免起争端，就先交了印信，并因上级没有交代护理札萨克职务的命令，曾亲去归绥面见董其武请示。董对他说：“任命你为杭锦旗护理札萨克兼保安司令，是蒙藏委员会的命令。命令既然出自中央，地方政府当然无权处理。”接着又说：“阿王投日当了汉奸，现在不治他的罪，也就够宽大了，还急欲恢复札萨克的职务，真是太糊涂了。”色登道尔吉当即表示说：“我认为还是把护理札萨克兼保安司令的职务交给阿王为好，因为阿王急欲恢复他的权力。我如不交，他必然对我不满，导致我们二人之间发生冲突；我们如果冲突起来，对于旗政和人民都不利。”董其武答应通过绥境蒙政会、伊盟政府

转请国民党中央指示办理。一九四七年蒙藏委员会下令恢复阿王札萨克的称号，色登道尔吉便退居西协理原职。阿王重掌旗政以后，认为自己是伊盟王公中资格最老的一个，仍有想当盟长的企图，但怕被人揭发他投日的劣迹，不得不暂时收敛起来。

一九四九年春，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到达准格尔旗一带，特派贾文华到杭锦旗劝说阿王迎接解放。阿王偕同色登道尔吉、索米亚二人以全羊席招待贾文华并秘密商谈，贾对阿王说：“现在准格尔旗业已解放，傅作义已经和平起义，杭锦旗也应顺应形势，迎接解放。阿王听了后，便说：“现在我已接到绥远省政府任命鄂齐尔呼雅克图为伊盟盟长、我为副盟长的通知。我和沙王（沙格都尔扎布）图王（图布升吉尔嘎拉）是老一辈人，鄂是我们的晚辈，我却作了他的副手，实在于心不甘。我愿意迎接解放。”并即派布彦托克托胡、杨敦二人持贾文华的介绍信，前往准旗联络。托、杨二人在将到准旗时，适逢国民党军进扰，未能和解放军取得联系。迨贾文华返回杭锦旗时，阿王便变了卦。说什么：“不能冒然从事，看看局势演变再说。”他为什么变卦呢？原来，这时德王在阿拉善旗又搞起所谓“西蒙自治运动”，派员邀请阿王参加，阿王即欲动身前往。色登道尔吉劝止说：“傅作义握有几十万大军，还不得不和平起义。现在解放军已经到达准格尔和东胜一带，大局已定。为今之计，只有和共产党联系，准备迎接解放，不应再反复动摇，使杭锦旗导致混乱局面。”阿王说：“那么怎样回复德王呢？”色登道尔吉说：“王爷不能去，可派代表前往。”阿王即派脑门拉白率同其女婿，前往阿拉善旗定远营面见德王。德王对他们说：“现在蒙古自治筹备委员会业已成立。主任委员一席，推定阿王担任，我甘愿退居副主任委员的地位。希望

阿王速来参加自治，主持进行一切事宜。脑门拉白回报后，阿王听了甚为高兴，因此就对贾文华变了卦。贾文华走后，阿王还向色登道尔吉说：“贾文华还对你另外说些什么？再来叫他见我，应当把他扣起来。”足见阿王已决心不向解放军投诚，要靠拢德王。阿王正在兴高采烈准备前往定远营就任所谓蒙古自治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大过其官瘾之际，突于一九四九年旧历三月二十九日，患脑充血症不治身死，结束了他反人民的罪恶历史。

一九六二年八月

回忆阿王片断

奇天祥

我是在一九三九年参加日伪政权的。走在我前头的杭锦旗王爷阿拉坦鄂其尔(以下简称阿王)是我的顶头上级。他是伪蒙疆政府伊盟公署的副盟长。盟长的位置,日伪仍留给抗日地区的扎萨克旗的沙王(沙克都尔扎布),以示招徕。在当时一般日伪高级官吏,都认为“皇军”战必胜,攻必取,对进占伊盟信心很高,并打算将伊盟公署设立在伊盟中心地——具有历史意义的“伊金霍洛”(成吉思汗陵寝所在地),在包头只不过是临时寄居而已。当时阿王更是盼望早日重返,以掌握其王爷的实权。

这时伪伊盟公署的辖区,除了准格尔旗一隅之地外,有森盖林庆开辟的达拉特旗北部一角的西碾房、柴登、昭君坟等地。伊盟公署的组织也很不健全。在日本人方面,名义上虽由包头市的顾问兼伊盟公署最高行政官——参与官,但实际上却不常来,仅派一个辅导官名叫大伴的代理办事。以后相继来了两个日本警官,一是杭锦警佐,一是上恒夫警尉,才开始组成了雏型的警务厅,负责指挥我的部队和森盖的残余部队(森部的主力已由他的第一团长马子禧率领反正归了傅作义)。这时阿王虽是代理盟长,但一切事务都由辅导官大伴和民政厅长吉尔嘎朗负责。他只是携着他年轻的新婚“福晋”,漫游归绥、北京等地,欣赏名胜古迹,过着愉快自在的“蜜月”生活。反正每月总有他数百元的薪俸,以供挥霍。

阿王虽不能管伊盟的事，但他并非甘心淡泊，无意政治。实际上他的名利心极为浓厚，只是由于主观条件和客观环境的限制，才表现出这样的消极态度。日本人曾说他：“官要大大的，钱要多多的，事情要小小的”，这倒比较符合实际。

当时，伪伊盟公署的王公和高级人员，仅有阿王、森盖林庆、章景文和我。章景文虽然代理其兄康王（康达尔多尔济）的职务，是达拉特旗的代理扎萨克，在大树湾设有旗公署，但他不去上任，成天在包头守着太太，闭户吸大烟，即近在咫尺的伊盟公署，也非请不去。我是一般人认为初出茅庐的黄口孺子，且常在准旗，也不常和伪伊盟公署的人联系。唯有森盖在包头很活跃，极想染指伊盟的军政大权。森盖曾因他的部下主力“叛去”，由吉尔嘎朗吸引到伪伊盟公署内一度担任过会计长。虽然他感到委屈了自己少将司令身份，但他却利用这个地位以及其他种种关系（如给日本军部搜集抗日地区的军事情报等），去拉拢日伪有权势的人，想当上日伪的伊盟司令。阿王知道这个情况后，大为吃醋。他表示，按身份、地位、资历以及对伊盟王公的影响，只有他才配当指挥伊盟七旗保安队的司令，因此就竭力和森盖争夺这个权位。两人在日本人面前争宠、告状，互相诽谤，斗争甚为激烈，并且还拉拢过我。阿王曾派他的心腹林谘议，请我到饭馆中，转达阿王“爱护”我的意思。向我说：“你虽然年轻，还会做事，王爷很佩服你。森盖心眼不好，难与共事，他现在想利用你的军队，当伊盟七旗的司令官。你想伊盟“收复”过来，谁愿意归他呢？还是咱们王爷好。你要拥护他，他一定提拔你，因为他是盟长，是我们大家永远的长官。”阿王本人也一反过去不理睬我的态度。我由准旗赴包谒见他时，他问长问短，很关心我，常留在他的公馆里打牌、吃饭，殷勤和霭地招待我。森盖对我也表示异常亲热，

约我到平康里嫖妓，混烟酒，过那种纸醉金迷的可耻生活。但他比较直爽，使人容易亲近。有一次曾向我说：“咱们蒙古的事情，千万不能靠王爷们，他们非常糊涂。多少年来，咱们蒙古人让人家看不起，都是因为他们这帮混蛋的关系。今后我们老弟兄两个携起手来，把咱们伊盟团结起来，可以好好地干一干。”他又说：“我当一个老大哥，你没意见吧！我的事成功后，你当副司令，伊盟将来的军队就是你的。你年青有为，我不过是开个头，这样对要求补给军饷、武器等都方便得多，因为日本特务机关已经同意帮助我。”当时包头日本特务机关帮助森盖确是事实。包头特务机关情报部第一部长内田，第二部长平井等日本特务们，都和森盖的关系好。这些人差不多每天晚上都在森盖家中狎妓、赌博、抽大烟，一起鬼混。以后虽然伊盟司令没有下文，但日本特务机关，却给森盖搞出一个“鄂尔多斯挺进队司令”的头衔，所有军费、武器的补充，均直接由日本特务机关负责。森盖率领残部，开到柴登，他的部队由百十多个人，扩充到四百多人，在包头滩上，作恶不少。

阿王和森盖对我的拉拢，我当然明白，意图都在利用我。我也采取了两头应付的办法。但实际上，我还是偏向森盖的多。因为阿王从一开始就给了我不好的印象。似乎在我先天之中，就对他有一种厌恶之感。他那圆圆的面孔，凸出的大肚子，笨得几乎连汽车都上不去，我总认为他是个饱食终日，根本不会关心别人的人。

其次，在我初接任准格尔旗的协理台吉^①兼保安队总队长伪职时，他恰巧不在，是吉尔嘎朗顺水推舟做了个人情。他回来以后，很不满意。认为我当一个协理，起码要对盟长奉送一笔巨

^①协理台吉一见29页注^②。

款，才能买到手。偏巧我又是个缺乏官场人情世故的人，既没有向阿王奉赠名马、白银，也没有向他的左右贿赂，因而这件事竟激起了一番轩然大波。那时，正在归绥开三个伪政权的合流会议，我们这些人齐来凑热闹。阿王对我很不好，他埋怨吉尔嘎朗局长不应该上报让我担任了准旗那个协理的角色。吉据理力谏，也没有得到阿王的谅解。阿王还把这件事向伪蒙疆主席德穆楚克栋鲁普作了反映，结果讨了一场没趣。据吉尔嘎朗说，阿王在德王跟前报告说，我们轻举妄动，在伊盟这样紧急情况下，委了一个小娃娃当协理，能办出什么事情来，徒惹得蒙旗人们笑话。却不料在他报告后，总参议吴鹤龄当着德王的面给了他一个难堪。吴鹤龄很不客气地说：“有些王爷们，一点也不为蒙古民族着想。在百灵庙闹自治时期，受傅作义利用，反对德王，今天还要争权夺利。拿伊盟来说，绝大部分都在敌人手中，只有准格尔旗河北一块地方军民未归。人家要拥护这个吃奶孩子，我们为了收复伊盟，为什么不可以利用一个孩子呢？为什么要不同意呢？”弄得阿王当时几乎下不了台。

由此，我和吉尔嘎朗走得比较密切，对阿王索性不搭理了。偏巧在这一年冬天，傅作义进攻包头失败，包头市长刘继广和阿王都有了“通敌嫌疑”。包头商会长董五三和市公署的总务科长都让日本宪兵抓起来，吓得阿王胆战心惊，而我和国民党军门炳岳的战斗，却得到日本人的奖励。于是阿王便低声下气地和我折节下交。我虽然也虚与委蛇，但总是心鄙其为人。因此，在阿王和森盖争夺伊盟司令的这幕闹剧中，我几次和包头特务机关长晤谈，都表示支持森盖。日本特务机关的人员也同意我的意见，说“阿王决不是可靠的人。”

以后，森盖担任了鄂尔多斯挺进队司令，驻扎在西碾房、柴登、昭君坟等地，因兵力不够，我还派去一百多人，驻在包

头西的昭君坟支援他。这是由特务机关动员我派去的，却不料遭到阿王和伊盟公署的日本人很大的嫉妒。因为森盖的司令是特务机关委任的。我当时是伊盟警察第一大队长，一切给养、装备都来自伊盟警务厅。伊盟公署的日本人当时不敢得罪日本特务机关，却有理由以此压制和摆弄我，使我不得不把队伍抽回。以后，阿王又凭藉伊盟公署日本人的支持，到包头日本司令部和伪蒙疆政府活动，将森盖的部队要回来，经伊盟警务厅编为伊盟警察第二大队，以森盖为大队长，鄂尔多斯挺进队司令便无形中取消了。日本特务机关虽在森盖部队仍驻一、两个日本人，但不负指挥责任，只能是搞搞情报，不久也调回包头，一切都由伊盟警务厅的日本人作主。这时还发生了一件滑稽事：森盖和日本人利用阿王的名义，派人到杭锦旗、郡王旗^①、乌审旗调保安队来西碾房、昭君坟一带。结果杭锦旗派来一百多名保安队，郡王、乌审两旗为了应付，也派来二、三十名，这使伊盟抗日区发生了很大的震动。当然，这与国民党压制伊盟各旗有很大关系。否则，这些抗日地区的军队是不会来的。但事被阿王知道后，非常气愤。认为不给我官做，却用我的名义调动伊盟的军队，便暗地把杭锦旗来的保安队的军官叫来，大骂一顿，责备他们不应该来。蒙旗的军官们，都还有封建式的服从性，一看王爷生了气，知道上了森盖的当，就赶快率领原来的部队，连夜赶回杭锦旗。郡、乌两旗派来的队伍，看见如此情况，也都随着各自回去。森盖因好事，就向日本人告状，说是阿王破坏警务厅调动军队，否则伊盟的保安队都能调出来。日本人杭锦旗特务机关的内田就气势汹汹地带森盖和我去见阿王，问他：“杭锦旗军队来的，你的不愿意，你的命令，他们统统的跑啦，你

^①郡王旗——今伊金霍洛旗的一部分。

的为什么不跑！”当时把阿王问得脸面失色，哆嗦地几乎语不成声。事后，日本人向我和森盖说：“阿盟长的心大大的坏了，死啦死啦的。”森盖瞪着眼看我，并不发言。我解释道：“不能以这种毫无根据的事，害我们一个盟长。他的心要是坏了，我们也一样，你这话，对我当部下的也是一个污辱。”森盖眉头紧紧地皱起来，嘴张了张，但没有说出来。日本人听了，反而由嗔作喜给我解释了几句，假意地笑了一阵就走了。过后，森盖问我：“保安队分明是阿王鼓动走的，你为什么反而替他掩盖？”我说：“你今天害了他，你和我能当盟长吗？我们伊盟一共几个人，就你害我、我害你的，不怕人家笑话吗？”森盖虽然再没有往下说，我看他的态度，是很不以为然的。

阿王和森盖的斗争，在钱财方面也有一段波折。伊盟公署的经费开支、收入完全是日本人把持，根本用不着他们费心，甚至于他们对全盟每年的经费预算也不明白。只是吴鹤龄在日本学习三年返国后，提出成立留日学生后援会和各旗设立“豪利希亚”（合作社），他们才对公用款项有了染指的机会。

“豪利希亚”的成立，主要是用盟、旗产品皮毛等换日本军部的布匹、烟、茶等人民生活日用品。在当时，这些日用品，日本人控制严格，是很难得到的，而盟、旗所出产的皮毛，又多让日本浪人和奸商骗去，使牧民们吃亏很大。因此吴鹤龄这一提议，博得很多人欢迎，德王也全力支持。曾开过多次会议，召集蒙旗王公在德王公馆讨论成立“豪利希亚”。我参加这种会议不多，阿王参加的最多。决定后，伪蒙疆政府由银行拨出一笔款项，借给各旗，利息很小，作为“豪利希亚”的开办费。伊盟因仅有达、准两旗部分地带，只借到三万蒙币，却还被阿王将这笔款压起来，不给我们两旗拨放，并用八千元让他那年

轻夫人的父亲黄毛，在达拉特旗来往做投机买卖。同时为了这位岳父好活动，还给了个加克尔齐^①的名位。但他这位岳父，是达旗有名的二流子，烟酒嫖赌样样都干，结果这八千元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森盖听到后很是动怒，立刻差人到准旗向我说明此事，要我俩一起向阿王要这笔款，彼此均分。我很同意，即到包头见森盖，并要他联系章锦文同去和阿王谈判。但森盖说：“我们两人去就行了，章二爷是个活死人，找他干吗？”我知道当时达旗扎萨克虽是章锦文，但“豪利希亚”是森盖主持的，因而也没再坚持我的意见。在同见阿王说明这事时，阿王有些不耐烦地说：“杭锦旗不久有大批人来，我需要这钱救济难民。”森盖接着说：“难民自有救济款，不能用这笔钱。”阿王面红耳赤地说：“这是我向德王交涉后向银行借的款，我愿意怎样处理都行。”我说：“上面已有文件，说明此款用途，现在‘豪利希亚’准备就要开办，急需此款，还是请盟长及时发下，否则日本人又要说长道短。”阿王理屈，但仍不愿拿出来。我两人又好说歹说，才拿出两万元来。因为开办费，森盖在包头需要多一点，他拿去一万二千元，我拿回去八千元。在提款时森盖向我说：“你知道吗，阿王不愿把钱给我们，主要是因为现在东西一天一天地涨价，拿到手的钱，能买下东西就有利，所以他争用此款。我还听说吴鹤龄曾就此事当面讽刺过阿王，说：‘阿王爷您把此款拿去，不给准、达两旗，存入银行就赚了利了。’这话说得真不错，咱们今后得注意‘豪利希亚’的钱款、东西，千万不要经阿王的手，他是吃惯了人的人，一定要剥削咱们的。我把这事反映到德王、吴鹤龄的耳朵中，以后都由我们直接去办。”这是我们同阿王争分利润的

^①加克尔齐——见29页注③。

一幕。

森盖和阿王的明争暗斗很激烈，只要有机会就不放过，尤其在日本人面前。我听到森盖几次说过：“阿盟长一点也不为蒙古人着想，民族观念根本没有。只要他有官坐，有财发，完全可以出卖良心……。”日本人也顺着森盖咒骂阿王。有一次扎萨克旗^①沙盟长派在伊盟公署的“加克尔齐”僧格林沁（在伪伊盟公署担任科长）和他的弟弟（也是伪伊盟公署的职员）因某种款项问题打起架来。这哥俩内讧，本与公事无涉。阿王听说后，硬说土官兄弟打架，应该严厉处分，向日本人提议，扣发这两个兄弟的薪俸。日本人曾假惺惺地说：“这样不给钱行吗？”阿王很自然地说：“我们蒙旗干工作的人，根本就不给钱，还要打屁股呢！”这些话，当时的人们听到都传为笑柄。森盖更加有声有色地宣传阿王曾因为虐待杭锦旗的人民，激起过“独贵龙”运动，藉以攻击阿王。后来阿王也听到这种闲话，有一次向我说，杭锦旗起“独贵龙”，是在他年轻时期，因不管旗内事务，成天烧香叩佛念经才引起的，并不是虐待人民引起的。他还夸耀说，旗内人民对他非常敬仰，称他如佛爷菩萨一样。这些事我当然无暇调查，不过僧格林沁兄弟俩打架，阿王确实罚过他们二百九十元，入了自己的腰包。这是僧格兄弟们亲自向我说的（本来罚下五百块，他们拿了二百九十元后，再拿不出来，最后算是阿王“恩免”了）。

阿王对森盖的不满，也经常怒形于色，并向日本人说他的坏话。最显著的是森盖在河西防地发财的问题。由于森盖驻防地西碾房、昭君坟都是通往包头的的一个关口，在抗日战争时期，投机倒把发国难财的好商猾吏特别多。尤其是驻在伊盟

^①扎萨克旗——今伊金霍洛旗的一部分。

的国民党军队官长们，最会干这手。他们自己做买卖，也伙同宁夏商人们合股做，多用贵重药材和黄金、皮毛等物换取沦陷区的烟土（鸦片）。森盖把守这个关口，谁要是不给他行贿赂是通不过的，因此获利不少。阿王对此肥缺非常垂涎，也非常嫉妒。他几次向我说：“森盖发的财可太多了，金子弄下不知够多少条。他不给官兵部下分一点，就是我们也休想沾一点光。”并且将这话向日本人说过不知有多少次，日本人却对此不加过问。当然日本人早让森盖拿钱买通了，反而讥笑阿王不识阵势呢！阿王向森盖叫过苦，希望分一些肥，但森盖却装做不解事的样子，置之不理。据我所知，一直到日本人投降，阿王都没沾上森盖一点光，而森盖一次就用三百五十两黄金在北京赵府街购买了满清某王府的一幢带花园的小楼房。可见森盖确实是多措了油，这怎能不令阿王眼热呢？

阿王的官瘾最为浓厚，由以下一些事情也可以看出：

一九四二年以后，伪伊盟公署范围扩大了，将伪巴彦塔拉盟的包头、固阳、安北、萨拉齐县等划入伊盟管辖区内，阿王也由代理伪盟长升为正式的伪盟长。在伪伊盟公署举行的一次盛大的就职典礼大会上，阿王说了许多能力浅薄、威望不够的客气话，并且说，如伊盟“收复”过来，他决不恋栈，还要退位让贤呢。接着就是说他一向恭维“皇军”的一些肉麻的话。但我看到他在会后却非常得意，首先嘱咐他的秘书给他印上个“正盟长”的名片，他的秘书很作难地说：“印个盟长就行啦，这样也说明了您是正盟长了。”阿王气势汹汹地说：“我当副盟长时，人们就称我盟长，现在当正盟长了，还是盟长吗？”

一九四四年，日本已走下坡路，他们所谓的“赫赫战果”再也吓唬不了谁了。人们都看出世界法西斯垮台只是时间

问题，因而对日本人也不象以前那样害怕了。日本人自己也气馁下来，以往那种穷凶极恶的本色一落千丈，伪官吏的权势却相对地增长起来。在好多问题上，日本人对伪官吏们有了明显的让步，他们极力宣传说：“日本无领土野心！”“皇军来蒙疆是扶助蒙古人独立自主。”这些话使不少伪官吏产生一种错觉。尤其是阿王受宠若惊，当即高唱起“日本政策已改变，现在是真正扶助我们民族的时候，我们努力干吧！”他还向我说：“我们要乘机会扩充军队，储备实力，以便于我们将来通过外交途径找寻独立的道路。”我想这话大约是张家口伪蒙疆政府高级人员透露出来的。因为这时日本人已明白自己的结果，不仅一反常态，培养起伪官吏们的权力，而且还协助伪蒙疆政府扩充军队，供应武器装备，其目的是想换取点好感，可能在收场时得点便宜。而阿王听到这话，却真以为是主子开恩提高其权位的机会，便由不得手舞足蹈了。这真是一付十足的奴才相。以后，也确实向这个方向发展，五个盟共编了五个防范师，伊盟是十二师，由阿王兼任十二师的中将师长。当我看到命令（我恰巧在包头伊盟公署），向阿王说：“您是中将师长了！”阿王高兴地哈哈大笑起来，还拍了我一下肩膀说：“中将师长……，”他得意忘形极了。接着就大摆其中将师长的威风，除了早起身着呢料协和服在伊盟公署内上班外，一到下午就换成呢料军服、马靴、洋刀、肩挂将军金花，腆着大肚皮，坐着马车，招摇过市。他到部队中去，既要阅兵，又要听取军官汇报军情，还要巡察军营，煞有介事地排演起来。他还到过准旗党三窑子视察过我的部队，除了给官兵讲团结友爱、服从长官、努力恢复成吉思汗的伟业一些话外，曾讲了成吉思汗祖母用五支箭比作团结的故事，并且还对我说了一些恭维的话。这一点他确实不同于其他王爷，他想拉拢你、

利用你的时候，很会对你灌几句米汤。为了保全他的官位和实力，在各方面都有他的深谋老算，这一点森盖是远远不及的。如在抗日战争胜利后，森盖是惊惶万状，深怕有大祸临头，而阿王则是谈笑自若，毫不介意。我当时估计，阿早已和国民党拉上关系，因而才能有这样稳若泰山的镇静。虽然，我由麻池谒傅作义返回包头时，和他谈我离开十二师的问题，他再三说：“蒙旗的力量，让人家分割多少年了，如单独分开，势必让人家各个消灭我们。你明白的事比我多，定晓得他们会怎么利用和消灭，到时候把你放在危险的地方，一下子牺牲了，后悔也晚了。你可不要上他们的当。”这些话好象还有点反抗傅作义的意思，但不久，有些蒙旗人大谈蒙古自治，他却沉默起来，不表示态度。我曾问他，他长叹一口气，说：“我已年老，再不能闹什么啦，今后让你们年轻人干吧！”这前后说法，好象判如两人。实际上，前者是怕我脱离他的管辖，失去政治本钱，后者是怕触怒国民党的统治者，要明哲保身，这都是从个人利益着想。此后，阿王又得到国民党的信赖，担任了伊盟保安司令，虽事实上也是个“空军”司令，连司令部的经费也领取不下来，但总算有了这一道官衔，又可以印在名片上了。一九四八年，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大局已很明显，国民党高级官吏，都有点灰心丧气，蒙旗王公也感到大祸已经临头。有些不甘心自己阶级灭亡，还提议扩充军队，增加武力，并选用年轻有能力的人掌握，以图最后挣扎。这时，我闲居归绥，不知阿王怎样又想起了我，他特地来找我谈了一次话。他说：“你很能干，这是咱们伊盟都知道的。不过，人们对你有点怀疑，有的人说，你是倾向了共方，我是不相信的，最好你表明态度。那么，我们大家还是爱护你的。”我蒙受青睐，虽然感激不已，却在当时不知为了什么，始终未表示态

度。秋后，奇致中被押，我却蒙荣祥、胡风山等诸先生保举，担任了准格尔旗保安司令。那时，阿王又特从杭锦旗来信，祝贺过我，并说了许多同舟共济、团结一致、共赴国难等官样文章的话。由此可见阿王仍不忘对我的拉拢，这也是他保官位的一惯手法。

以后，听说在德王、达王（达理扎雅）搞西蒙自治政府时期，曾邀请伊盟各旗王公参加，阿王为了他的官位，准备出席这个盛会，打闹个重要角色。他旗内的掌印协理色登达尔吉不同意，说：“当您参加蒙疆政府时，我无可奈何地每天背上大印，提心吊胆。您现在又要走了，我可负担不起这全旗责任！”于是阿王就未能前去。不久，因脑溢血逝世。在逝世前，（大约一九四九年春天）他看见大局将起变化，就下令全旗保安队，对国民党军或八路军都不准开枪抵抗。这种“中立”的两头不敢得罪的政策，也可以看出阿王的狡猾处。

一九六二年九月。

伊克昭盟“三·二六”事变 的一些回忆

李 知 非

伊克昭盟扎萨克旗^①“三·二六”事变，发生在一九四三年的春季，距今已将近四十个年头了。沧海桑田，变化巨大，这个事件在我的记忆中几乎濒于消失；近以整理文史，看到这方面的材料，不免触动旧思。爰执笔为文，聊尽个人的历史责任，亦供作历史家的参考。

一、我接受了一个任务

一九四三年春，我充当国民党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部参谋处作战课的上尉参谋。有一天（当在伊盟“三·二六”事变发生后不久），参谋处长关海珊命令我说：“现在你到傅长官那里办公，直接听长官的指示办事。干什么你去了就明白了。”

我到参谋处大院（当时在陕坝，今杭锦后旗政府所在地的西南角）对门的傅作义办公的地方，向傅请示。傅叫我在他的卧室外屋办公，把有关伊盟警备总司令陈长捷的来电交给我，并说明情况，说要派部队进行剿除。我当即遵照指示，查阅地

^①伊盟原扎萨克旗，郡王旗解放后合并为今伊金霍洛旗。

图，部署进击，除命令驻守伊盟杭锦旗桃力民附近的暂二十六师并配属骑兵第七师第二十一团，统由二十六师何文鼎师长负责指挥，迅即前往扎萨克旗进兵以外，还分别给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驻甘肃兰州）、国民党中央军委会军令部（驻四川重庆）电报备查。

记得当时在傅作义外屋办公的，还有一位非军职人员，名叫智南屏，是蒙古指导长官公署的一位处长，坐在我的对面也是办理有关伊盟扎萨克旗事变的问题。有时候曾厚载（当时是绥远省府的秘书长）也去过，与傅作义研究工作，指令智南屏起草文电。据我所知，他们对逃出扎萨克旗的沙王（沙克都尔扎布），正在通过各种关系，想方设法接回来，具体内容不详。我的责任是调兵打仗，不管别的闲事。至于为什么把我叫到傅作义那里去办公，奥妙何在，我当时确也没有考虑。现在看来，无非是为了保密，或者是为了下达作战命令和指挥比较方便。

那时候，傅作义先生四十开外，面色红润，身着士兵黄军装，与我们一个样。他在我们办公的外间屋，口叼其其棍儿，来回踱步，若有所思。我因为与傅每天升旗跑步站在一起，有时也拿着文稿去请他划行，他知道我是参谋处的一个小参谋，故而感到熟悉，并不拘束。

二、当时第八战区在河套的作战形势

那个时候，正在抗日战争时期。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部的所辖范围前沿阵地，在河套的东部地区为：右起黄河的马七渡口，亘北沿西山嘴乌梁素海的退水渠，到乌镇相连之线；在黄河以南，则是伊克昭盟沿黄河向东南流向的沿岸，如沙圪堵、昭君坟、大树湾、喇嘛湾、榆树湾。马栅相连之线；以南与陕西省

府谷、神木相接。在这个漫长的战线双方，是以傅作义部的三十五军、暂三军、暂四军（一度改为骑兵第四军）等部为主力，坚守河套前线阵地，构筑工事，与当时日伪绥西联军王英部互相对峙；傅作义所指挥的东北挺进军马占山部的两个骑兵师（新骑五师、新骑六师），还有第一、二、三、四游击挺进纵队（司令分别为高荣、李作栋、郭长清、邬青云）、则是挺而不进，分别担任沿黄河右岸的守卫任务。另外，伊盟还经常控制着一些正规部队，如步兵暂编第二十六师何文鼎部于桃力民附近，以及骑兵第七师朱巨林部。傅作义为了加强伊盟的守卫，以防止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边区向伊盟发展和日寇伪蒙疆的侵袭，特在东胜县设立伊盟警备司令部，任命他在山西阎锡山部下的老同事陈长捷为警备总司令^①，代表傅作义坐镇指挥，处理伊盟地区的军政大事。

如上所述，当时日伪和国民党双方各守阵地，互相对峙，形成一种僵持状态，除小有接触以维持敌我对战的局面外，河套地区在一九四〇年绥西战役之后，直到“八一五”日本宣告无条件投降，日伪军和国民党军根本没有大的战争。

三、伊盟“三·二六”事变起因和结果

伊克昭盟“三·二六”事变的起因，主要是由于开垦蒙旗土地。当时，伊盟警备总司令陈长捷，假借国民党中央关于开垦蒙旗土地、增加军粮民食之名，奉行强权政治，未经与主持当

^①陈长捷在山西阎锡山部下曾任师长、军长、集团军司令。他在任李生达二十六师旅长时，在阎锡山、冯玉祥联合反对蒋介石的战争中，曾归属傅作义指挥。

时伊盟政务兼盟长的沙王和各蒙旗领导进行协商，即擅行决定招人放垦，以致引起蒙民的强烈反对。特别是沙王的亲信官员白音仓，与陈长捷狼狈为奸，出卖蒙民群众利益，严重影响到蒙民的生产、生活，更引起扎萨克旗官、民的极大愤恨。在这样的形势下，扎萨克旗沙王府以老瑞排长为首的保安队，先是在由榆林至扎旗途中派人袭击了白音仓，又于三月二十六日发动起事，于夜间包围了绥境蒙政会、绥蒙国民党党部和伊盟中学等处，击杀了与白音仓连通一气的蒙政会秘书王兰友、顾兆忠等人。这就引起了陈长捷的震怒，一方面严厉谴责沙王必须缉拿凶手，另一方面派遣骑七师第二十团驰赴扎旗镇压。随着部队的进攻，扎旗王府保安队英勇对抗，终以寡不敌众，难以抵抗，不得已撤出王府，护持沙王出走，向乌审旗西部的解放区方向而去。

陈长捷感到事态扩大难以收拾，深恐进一步引起全伊盟的动乱，乃急电傅作义派兵镇压，迅速剿灭扎旗保安部队，将沙王劫持回旗，以防事态继续扩大，从而镇慑伊盟各旗对扎萨克旗事件的支持和响应。傅作义据报后，如前所述，立即将我由参谋处调到他的住室外屋办公，当即电令驻伊盟桃力民附近之国民党中央军暂二十六师何文鼎部，并派骑七师第二十一团（团长胡逢泰）迅速由河套开到伊盟，归何文鼎指挥，步骑配合，向扎萨克旗以南方向的乌审旗扫荡进攻，务期速战速决，歼灭扎旗保安队。与此同时，副司令长官部设法沟通关系，经由伊盟鄂托克旗保安司令章文轩，派员与跑到乌审旗西部解放区的沙王取得联系，从中说项，几经周折，才将沙王由乌审旗接回扎沙克旗。最后，还是以停止开垦，撤消陈长捷伊盟警备总司令职务，赔偿沙王府的损失，并由国民党中央派大员会同傅作义亲到扎萨克旗王府进行慰问，始告结束。

四、镇压与反镇压战斗概况

伊盟事变发生后，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部根据陈长捷来电的建议和要求，立即部署军事进攻。进攻的部署是，以步兵暂二十六师为主力，配属骑兵第七师第二十一团为侧翼，立即由桃力民地带向扎萨克旗方向攻击推进。这个时间，当在一九四三年四月中旬至五月中旬期间。对于进攻部队的战术要求，大概提出了以下几点：一是，要求速战速决，彻底捕歼扎萨克旗保安队，并劫回沙王；二是，根据伊盟地形特点，沙漠、红柳林多，缺水少路，不宜于大部队运动战，可适当采取疏散队形和包剿捕歼办法；三是，严明军纪，不得骚扰群众，安抚蒙民生产等。

随着战斗的进展，二十六师由桃力民出发，由西向东，扫荡进攻；到达扎旗后，继续向乌审旗西南方向扫荡前进。这时，蒙旗保安队奋起反击，利用沙漠红柳林阻击战斗，且战且走；继而乌审旗奇玉山部也投入战斗，协助扎旗保安队，利用有利地形，迂回阻击，迫使国民党部队每前进一步，均须付出很大代价，很多士兵在冷枪下被打死。由于扎、乌两旗保安队灵活机动，顽强战斗，使国民党军疲于奔命，胆颤心惊，计前后损失近一个营的兵力。

随着战斗的进行，各该进攻部队，除少数单位贯彻上级命令，能够严守军纪并安抚群众生产外，有不少部队是趁火打劫，明目张胆地抢掠王府财物，破坏蒙民房屋，抢拉牧民牲畜，焚烧林木等等，严重危害了群众的生活与生产。战争结束后，国民党仅将骑七师第二十团团长沙迪光扣捕、师长朱距林

撤职，这不过是国民党一向惯用的敷衍人民的作法罢了。

这样的战斗，经过一个多月的周旋，当进攻部队推进到乌审旗王府时，何文鼎才与乌审旗保安司令奇玉山取得联系，以私人友谊关系敦促奇玉山停止战斗，并请奇玉山来到何文鼎司令部，保证一切恢复旧秩序。对于伊盟此次事变的善后问题，由副司令长官部会同有关方面具体解决。

五、伊盟事变陈长捷应负主要责任吗？

纵观这次伊盟事变的发生，一般人都认为陈长捷应该是罪魁祸首，同时应该负主要责任。当然，陈长捷在处理这个问题上，骄横武断，倚强霸道，办事过于操切，以致造成严重的后果。非但开垦不成，反而破坏民族团结，几乎引起更大的动乱，影响抗日大业的全局。他是应负一定责任的。

但是，当伊盟发生武装冲突之后，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部，并不是侧重于寻求和平解决，而是听信陈长捷的意见和主张，继续沿着他铺陈下的专横霸道、迷信武力的道路走下去，立即派遣多于起义部队五、六倍的兵力进行镇压。显然，这是一个更加严重的错误。这样作，非但不能弭平事端，反而火上加油，更加激起了蒙旗部队的武装抵抗，甚至一时形成各盟旗“鸡毛信”纷纷传递，互通讯息，观察风向，待机而动的紧张局面。幸而这种形势没有继续发展下去，沙王被接回了扎旗，经过协商解决了问题。否则伊盟局势和绥西抗日全局，都将受到严重影响，甚至不知将伊于胡底！总之，伊盟事变，陈长捷肇事于前，而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部则是派兵镇压于后，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是有其推卸不掉的罪责的。当然，这主要是由整个国

民党的反动统治以及它的歧视和压迫少数民族的大汉族主义政策所造成的，而非个人所能代替了的。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部在镇压伊盟事变的同时，一方面电报第八战区长官部朱绍良长官，一方面也直接向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蒋介石作了汇报，也就是说向主管军事作战的军令部备了案的。

六、伊盟事变平息以后

一九四三年夏天，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军训部派校阅团前来绥西陕坝，对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部及所属各军、师部队进行校阅。当时校阅团决定到陕北榆林及伊盟等地校阅部队，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部派参谋处教育课长王兴和我，陪同校阅团前往。我担任的是为校阅团团长江（忘其名）兼写所谓“视察记”的任务。当路经伊盟扎萨克旗时，骑兵第七师尚驻扎在这里，校阅团在对该部校阅的同时，顺便到蒙政会、扎萨克旗王府进行了视察，并听取了蒙政会党政方面关于伊盟变变的介绍。我们还察看了扎旗保安部队围攻蒙政会时顾兆忠等据室抗击的房子，墙壁上尚有掏挖的窟窿，在室内墙上还有顾兆忠等人被保安队击毙前所写下的字迹。同时，我们在扎萨克旗王府内，察看了攻占王府的国民党部队挖地三尺，抢掠一空的真实情况（实际有的深挖丈余）。当时，沙王府破坏不堪，沙王的家属还没有搬进去。对此，校阅团据实综合了部队军纪败坏的情况，除向上反映外，并编印在校阅团的“视察记”之中。以后，听说我们曾校阅的骑兵第七师第二十团团长江迪光被扣押，而师长朱钜林包庇放走，也因此而被撤掉师长职务。

一九八〇年三月二日

绥境蒙旗地方自治指导

长官公署的始末

王运昌

绥远省境内蒙旗地方自治指导长官公署，是伴随着绥远省境内蒙旗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的产生而产生的。成立于一九三六年秋，撤销于一九四六年秋，中间还经过两次较大变更，一次为一九三九年绥境蒙旗地方自治指导长官公署增设了一个朱绥光副长官，一次为一九四三年副长官又改为傅作义兼任，都有其时代背景和一定的历史条件。这十年期间，我一直在绥境蒙旗地方自治指导长官公署工作，这个机构究竟为什么成立，后来又为什么撤销，中间搞了些什么名堂，兹就记忆所及，作一个简要的介绍。不周的地方，还希有以指正。

绥境蒙旗地方自治指导长官 公署的成立及经过

绥远省境内蒙旗地方自治指导长官公署（以下简称绥境蒙旗指导长官公署）的成立，是针对绥远省境内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以下简称百灵庙蒙政会）的成立而成立的。原来百灵庙蒙政会于一九三四年成立后，操实权的不是委员长云王（云端旺楚克），而是委员兼秘书长德王（德穆楚克栋鲁普）。那时德王还是一个青年，胆量大，魄力足，在蒙旗王公中，确系首屈一指的人物。“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为实现

其“满蒙政策”而节节侵略我国，假使德王在当时，能激于爱国热忱，与国人紧密团结，一致对外，谁能不钦佩？而德王不此之务，却是在国难临头，为日本帝国主义效劳，搞民族分裂活动。先于一九三二年赴南京，同蒙旗王公代表因补英达赖等二十余人，勾结蒙藏委员会委员白云梯、克兴额，大闹改组蒙藏委员会，闹得乌烟瘴气，无结果而散。百灵庙蒙政会成立之前，国民政府派黄绍竑和赵丕廉来百灵庙慰问时，德王即与其部下秘商，想对黄重演汉朝苏武留胡故事。幸其部下劝阻，以今非昔比，黄非蒋（介石）心腹，留之亦无益，才未成事实（这是赵慰问返京后和我们谈的）。其后又勾结日寇，假自治之名，行叛国之实。一九三四年春天，蒙古各盟旗联合驻京办事处，还在南京各报登载启事，为德王亲日辟谣。不料经过此次辟谣，德王之行动，反更为国人所注意。同年四月，蒙藏委员会派我担任驻绥远杀虎口^①台站管理局局长后，有一次与石华岩总办（绥远屯垦办事处）晤面，石即告我，军事委员会近有电报，叫注意德王之亲日活动。你在台站，如有所闻，可随时报告傅主席（傅作义）或我。我当时激于爱国热忱，即将石所言，向蒙藏委员会报告。哪知此事竟为德王所知。适蒋介石巡视华北，来到绥远，德王与之见面，即要求将我撤换，蒋即面允，于返京后通知蒙藏委员会撤换了我。与此同时，张家口台站局长，由于向蒙藏委员会报告此类消息较多，竟被察哈尔主席宋哲元应德王要求，押解南京。到京后，才由蒙藏委员会无条件释放。一九三六年春，土默特旗青年云继先和朱实夫，以百灵庙蒙政会科长名义，率该会八百名保安队，自动脱离百灵庙蒙政会，进驻平绥铁路毕克齐车站。同年冬，即爆发了绥

^①杀虎口——山西左云境内。

远百灵庙抗战。这些，对百灵庙蒙政会是一个打击。另一方面也教育了绥境蒙旗十八旗王公和青年，纷纷要求与百灵庙蒙政会分家，成立自己的自治机构。时晋、绥还系一家，适阎锡山以共赴国难之名，到中央述职和参加国民党中央第四届六中全会。一九三五年十一月（汪精卫被刺的那次）驻陵园孔宅时间较长，与蒋接触较多，即电绥远傅作义主席，将蒙旗自治方案迅速具报，凭蒋核夺。于是绥境蒙政会和绥境蒙旗指导长官公署，即于一九三六年秋，在绥远同时成立（前者成立于百灵庙，后者成立于归绥城）。

绥境蒙旗指导长官公署成立后，阎锡山虽兼任长官，但一切重大问题，仍由傅作义就近决定解决。日常事务即委派与傅接近的石华岩担任参赞并负责处理。参赞之下，设秘书长一人，下分总务、政治、军事三处和一参事室。

绥境蒙旗指导长官公署成立后，在团结御侮、救亡图存和一致对外的口号下，蒙汉人民是团结的，心情也是舒畅的。但它的成立，虽说是负有指导地方自治责任，实际寓有监督蒙旗之意义。为尔后的撤销种下了因素。

抗日战争爆发后的绥境蒙旗 指导长官公署

“七七”事变后，日军沿平绥线大举进犯。时傅作义统率大军转赴山西作战，绥远省城归绥很快就被日军占领。石参赞此时单独走汉口，适蒙藏委员会迁重庆路过武汉，石与之联系后，又折返西安。当时沙委员长（沙克都尔扎布）已回到伊克昭盟扎萨克旗，土默特特别旗荣祥总管和不少青年，也纷纷到了榆林。石参赞则派陈玉甲和我等四人，前往榆林和扎萨克旗

联络，并于一九三八年春，石到榆林后才将绥境蒙旗指导长官公署正式迁移榆林办公。当年夏，石又亲往扎萨克旗会见沙王。不料沙王称病拒绝接见。沙王意思是局势和缓你们跑来了，局势紧张，你们又走了。我们该将如何？所以石参赞在扎萨召住了多日，终未会见沙王。石睹此情形，遂返回榆林。此时，各方认为沙王意志消沉，纷纷建议沙王到重庆一行，以坚定其抗日情绪。哈拉寨^①马占山将军和西安十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均有同样主张。沙委员长才由我陪同于一九三八年冬，乘汽车前往重庆，石参赞和荣总管乘飞机前往。到重庆后，蒙藏委员会只招待沙委员长和荣总管，对石参赞不予理睬，即在宴会场所，对石也非常冷淡。

当时，各方乘沙委员长到重庆机会，纷纷主张调整蒙旗机构。蒙藏委员会副委员长兼山西代表赵丕廉，急电阎锡山，请速将指导长官调整蒙旗机构的意见，电报中央以备采择，并附报了自己的意见。电文大意是：沙王到榆后，各方对调整蒙旗机构有不少意见。大多数认为沙王年老，亟须在蒙政会添设常务委员，以襄助沙王。至绥境蒙旗指导长官公署，因钧座此时无暇兼顾，可增设副长官等语。阎除复电照办外，并荐西安蒋鼎文以代己（因蒋对蒙旗有不少意见）。这就是绥境蒙政会添设三常务委员的来由。三常务委员由沙王之子鄂齐尔呼雅克图、郡王旗^②王爷图布升吉尔格勒和荣祥总管三人担任。此乃绥境蒙政会常务委员之设和绥境蒙旗指导长官公署增设副长官，由阎的参谋长朱绶光充任的经过。这时已届一九三九年春，沙王和荣总管、石参赞才北返。

石参赞回到榆林后，着手对伊克昭盟各旗保安队进行调

^①哈拉寨——在准格尔旗境内。

^②郡王旗——见84页注^①。

整。具体办法是：乌审旗保安队编为西蒙抗日游击军，司令由保安司令奇玉山兼；另划伊克昭盟为第一游击区，由准格尔旗奇文英担任司令，驻神山；乌兰察布盟为第二游击区，由陈玉甲任司令，驻河套米仓县杨柜；土默特旗和绥东四旗，划为第三游击区，由荣祥任司令，先驻达拉特旗柴登召，后又移驻郡王旗王什考察。同时，为了训练部队骨干，还成立教导大队，由慕幻声任大队长，亦驻米仓县杨柜附近。另外绥境蒙旗指导长官公署还兼管李堃玉的晋绥谍报处，驻榆林红石峡。各方对蒙旗指导长官公署和蒙旗意见，至此始归平息。朱副长官到榆林就职，石参赞移交后，驻西安。

朱绥光担任副长官时期的 绥境蒙旗指导长官公署

朱绥光，是阎锡山多年的参谋长，为人老诚稳健，在晋军中素有和事佬之称。此次担任绥境蒙旗指导长官公署副长官，完全依照阎锡山意旨和他的四句口号为治蒙方针。口号为：“推崇王公，培植青年，实惠蒙民，争取内向”十六字。不久还荐蒙旗青年白音仓、贺耆寿、经天禄和胡凤山四人，为绥境蒙政会委员，以期群策群力，治理蒙旗。规定每年春秋绥境蒙政会开会两次，自己亲往参加，解决存在问题。在争取内向方面，除大力宣传抗战必胜，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我们外，更注重对蒙奸与蒙疆政府的策反工作，各旗保安队也作了进一步的整顿。由是，在朱担任副长官三年期间，伊克昭盟未再丧失一寸土地，群众生活也比较安全。另一方面，绥境蒙政会内部明争暗斗不团结的现象，始终未能扭转。各项工作因囿于所处环境，不仅与各方配合不力，同时也很少有积极的主张。东胜警备司令

陈长捷到职后，与朱副长官写信，称参谋长或参座，到了后来，即改称兰蒞先生或兰蒞兄（朱的别号）。朱在指导长官公署内部也常常说：“我们不能像陈长捷那样硬性对待蒙旗”。郡王旗西协理贡布扎布看见蒙政会内部不团结，也常常和我谈：我们蒙旗照这样下去，是永远不会好的。将来不亡于日本，也必走外蒙道路，其他的道路是没有的。贡布扎布是主张维持王公制度的，但对现状非常不满。在一九四二年秋，绥境蒙政会开会时，朱未亲自参加，派我临时代理，适乌审旗西协理奇国贤代表该旗出席参加，为东胜警备司令陈长捷侦知，即在开会那天早八点，陈以看马为借口，将奇诱至大门口，予以逮捕。临行还拿出给沙委员长一信，谓系奉委员长之命逮捕，望不要惊异。当时代表们还纷纷与各方打电报营救，不料陈到东胜即将奇枪决。奇协理是一位进步人士，乃竟遭此不幸。绥境蒙旗指导长官公署，也无可奈何。当时，国民党中央为统一军政大权，发表傅作义兼任绥境蒙旗指导长官公署副长官，而陈长捷竟又大闹开发伊克昭盟。跟随沙王多年的白音仓，平时瞒着沙王，独揽大权，早为沙王左右所不满。因之，扎萨克旗西协理鄂齐尔巴图 and 保安队老瑞排长等，枪杀白音仓于赴榆林（距扎萨克旗不远）中途，接着就爆发了“三·二六”事变。

傅作义兼任副长官时期的绥 境蒙旗指导长官公署

傅作义任绥远省主席多年，早为蒙旗人民所熟知。经过百灵庙和五原两大战役，消除了人们的不少恐日病，所以傅作义兼任绥境蒙旗指导长官公署副长官，大家是满意的。接任之初，伊克昭盟爆发了“三·二六”事件。当时我正由榆林随接收

人员到了陕坝。傅问我：扎萨克旗平时是否潜伏着共产党？并问了扎萨克旗保安队团长毕宝熙的情况。我当即告以扎萨克旗平时看不出有共产党活动，但不满现状的人却有。至于毕宝熙司令系满族人，黄浦军校毕业，现年不到三十，平日沉默寡言，不善与外人交往。傅说：这种人最厉害，毕亦系这次事变主要负责人之一。当时即设专门机构处理这一问题，并急电陈长捷，将开赴伊金霍洛的骑七师（距扎旗三十里），只许兜弯不准射击，静候和平解决。陈长捷听到要和平解决，竟不服从傅的命令，擅自向沙王府进军，逼得沙王于仓猝之间，不得不一面抵抗，一面携眷逃奔乌审旗。傅听到沙王出走消息，甚为愤怒。为维持绥境蒙旗秩序和安定人心之计，发表郡王旗图布升吉尔格勒，暂代绥境蒙政会委员长职务的命令，并怕沙王走解放区不返，派出多人寻找沙王。经两月的努力，沙王才又重返扎萨克旗。另外傅作义还拨十万法币和其他物资，予以救济。至此，“三·二六”事变才告一段落。傅作义兼任绥境蒙旗指导长官公署副长官后，凡遇与蒙旗切身有关问题和比较复杂问题，都由绥境蒙旗指导长官公署配合处理，因而军粮的征购工作等，均能达到预期目的。一九四四年春，傅还将乌兰察布盟中公旗林沁僧格全家，由敌占区原王府海留图庙（今乌拉特中后联合旗所在地）接到后套。另外，傅作义在五原战役中予日寇严重打击，这也对蒙旗人心鼓舞很大。因之同年秋，即有乌盟茂明安旗齐王（齐木德仁庆好日浪，已死）夫人额仁钦达赖，携幼王自动脱离敌占区到了后方。这些，都是以往绥境蒙旗指导长官公署没法做到的。但另一方面，也有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主要是开发伊克昭盟土地和编制户口问题。傅作义对开发伊盟土地，虽不似陈长捷那样硬性强开，但总是主张逐渐开发的。由于这种农、牧争地的矛盾，因而成为难以调和的民族矛盾，造成隔

阎，影响团结。特别是杭锦旗桃力民^①地区所开土地，已渐近王府，这就引起蒙旗的更大不满。“三·二六”事变后，傅作义下了一个明年实行闭地的命令。到第二年，傅虽表示，省府闭地命令一定要贯彻，但当桃力民汉人群众向沙王府请愿时，傅又派绥境蒙旗指导长官公署秘书携带礼物到杭锦旗政府协商，临行傅一再表示，省府闭地命令不能更改，而汉人群众之生活也是个实际问题，请王府发发慈悲，想一个妥善办法，省府无不同意。当时旗政府看了汉人群众之哭哭啼啼可怜状况，才又允许暂不闭地。这就是国民党统治者对待民族问题的阴阳两面的手段。

绥境蒙旗指导长官公署的撤销

如前所说，绥境蒙旗指导长官公署成立，名义上虽系指导蒙旗地方自治，但骨子里却寓有监督、统治蒙旗之意，经过数年实践，更显得格外明显。所以蒙旗知识分子，对国民党中央之下的这第二个婆婆，均有不满之意，这种情况，为在国民党中央的李永新等所知，遂于一九四四年酝酿取消。在征求傅作义意见时，傅以抗日期间，蒙旗机构不可随意更改而作罢。抗日胜利后，李永新等又旧调重弹，正式向国民党中央建议取消绥境蒙旗指导长官公署。适傅作义到南京，蒋介石征求傅的意见，傅表示原来绥境蒙旗指导长官的成立，为的是抗战，现抗战已经结束，这个机构应否存在，请中央确定，我无意见。于是成立整十年的绥境蒙旗指导长官公署，便随着抗日战争的

^①桃力民——在杭锦旗、达拉特旗和原扎萨克旗三旗交界处。国民党于三十年代设立相当于旗、县一级的办事处，准备设立县治。解放后原绥远省人民政府明令撤销办事处，所辖土地分别归还杭、达、扎三旗。

胜利，于一九四六年秋撤销。此后绥远省又在省府内附设蒙旗文化福利委员会。

以上的情况说明，在旧中国根本不可能产生各民族真正的地方自治。绥境蒙旗指导长官公署的成立，与其说是指导地方自治，勿宁说是统治蒙旗的一种工具。绥境蒙旗指导长官公署的撤销，也只不过是便利国民党的中央直接统治，他们所说的地方自治，真是一句鬼话。

一九六二年五月十四日

我从茂明安旗出走的经过

额仁庆达赖

我们伟大祖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经过艰苦卓绝的英勇斗争，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反动统治，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并在此基础上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直至今天又纳入了“四个现代化”的新长征的伟大进军之中。抚今忆昔，总结自己走过的路程，不由得心潮起伏，思绪万千，许多往事涌上心头。

抗日战争期间，在日寇、伪蒙疆残酷统治下的茂明安旗，人民备受苦难，惨遭蹂躏。兹将当时茂明安旗扎萨克齐木德仁庆好日浪被日寇杀害和我出走到国民党第八战区绥远省西部河套防区的经过记述如下。由于自己年已衰迈，记忆力差，水平有限，难免有不正确之处，尚望知者予以指正。

一九四〇年，在百灵庙的日本特务机关，曾前后几次到我们茂明安旗^①，逮走了苏格拉、达格、额尔登达赖等七八个人，一直没有下落，听说都被他们处死了。一九四一年四月，百灵庙的日本特务机关派汽车到我们旗，诡称请我旗的扎萨克去参加会议（扎萨克是我的头一个丈夫，名叫齐木德仁庆好日浪）。他去了之后，日本特务机关即把他扣押起来，逼他承认是红党（即八路军）的密探，管押了有二十多天。一天，他们

^①茂明安旗——原为乌兰察布盟的一个旗，解放后与达尔罕旗合并为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

又突然乘车向我旗驶来，日本特务机关长哈斯格在上面坐着。我迎上去问话说：“我们的扎萨克怎么没有回来？”他答复说：“你们的扎萨克与红党有关系，是八路军的密探。他自己打死了自己，我们将尸体给你们送回来了。”我听后既悲痛又愤恨，与他们抗声争辩：“不行！送回尸体不行！你们叫走的时候是活人，送回来的却是尸体。他走时也没有带枪，怎么能自己打死自己呢？这不明明是你们特务机关干的吗！”他们毫无人性，蛮不讲理，对我的质问非常恼火，反而诬说我包庇红党的密探，给八路军通风报信，命令士兵搜查我的家，寻找我私通八路军的证据。他们把搜查出的现洋、枪枝和各种布匹等日用物品，都硬说是由外蒙古红党那里弄来的，被他们抢掠而去。这时我们旗里担任梅林职务的额尔登朝克图，早已投靠日本特务机关当了蒙奸、特务，也为虎作伥，对我进行威胁。他还恬不知耻地诱骗我，说什么“你不要苦恼和悲伤，扎萨克是自尽而死。你现在年纪轻轻，不要为死人难过，应该愉愉快快地生活下去。特务机关会照顾你。他们那里有一个年龄和你差不多的吴科长，你与他一起生活不是很好吗？”我听了他这些卑鄙无耻的话，更加气愤，并暗下决心，迟早非把你枪崩了不可。我按捺不住心头的怒火，当即斥骂他：“你这个豺狼，竟会使出这样的手法诱骗我、谋害我，我算是看透了你！”

额尔登朝克图秉承日本特务机关的指示，派根东扎木苏、三在关其格、老布胜敖斯尔等人对我进行监视，先后有八个月之久。额尔登朝克图和吉计玛（吉是茂明安旗官布沙仁图斯勒其的小老婆，在他丈夫患病死后，她与日本特务机关发生关系，与额尔登朝克图一起为日本特务机关工作）勾结一起霸占了我旗扎萨克和保安队的丰收地^①。旗保安队吃粮发生困难，

^①丰收地——拨给旗政府和保安队的土地，以土地收获作经费。

逼着向额尔登朝克图要粮。额为了减少用粮，就精简了旗保安队，把原任保安大队长图旺扎布推下台，把副队长金雅道尔吉降为班长，把保安队的汉人全部赶回农村。这样，保安队的力量大为减弱，而额尔登朝克图的丑恶面貌也越来越被人看清了。流窜这一地带的土匪，随着我旗保安队的削弱也乘机活跃起来，与一些杂牌部队联合一起，在我旗到处抢掠奸淫，杀人放火，把牛羊一群一群地赶走。在这种情况下，牧民们不能安心放牧，也无法安定生活，更加怀念齐木德仁庆好日浪扎萨克在世时的生活情景，同时对额尔登朝克图越加憎恨。人民为了发泄愤恨，还编唱歌曲来咒骂他。额听到这些歌曲非常恼火，不是骂这个，就是打那个，弄得谁也不听他的指挥了。这时，监视我的一些人，由于对额尔登朝克图不满，也放松了对我的监视，甚至给我传送消息。我趁这个时机，与我的弟弟那木海商量，并串通倾向我的一些人，计划除掉这个危害人民的蒙奸、特务。

我们从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开始，经过研究准备，到一九四二年的二月初一，就把额尔登朝克图逮起来，并在毛忽洞村把他处死。尔后，我们跑到乌拉特中后旗的四大沟村，准备休息一下，再把女蒙奸、日本特务吉计玛逮捕处死。但这个狡猾的女人先已得知消息，就跑到中后旗的恩根塔特务机关去了。百灵庙日本特务机关据报后，哈斯格亲自率领满载全付武装警察的两辆汽车追赶我们，在四大沟把我们包围住。当时我们只有三、四十人，虽然都有坐骑，但逃跑已来不及了。我们被迫交械后，哈斯格答应不追究打死额尔登朝克图的事，允我回旗。日本特务走后，我和那木海、金雅道尔吉、毕克道尔吉、根东扎木苏、贡齐克、阿拉布腾等人，都不同意回旗，主张另谋出路，决不在日寇的蹂躏下屈辱地生活。同行的保安队员大都

是茂明安旗人，不愿离开家乡，他们就向旗里走去。我们决定到绥远西部的河套参加抗日战争。走在半路上，原来回旗的巴彦尔、五十一、二老虎、锁玛等人又返回赶上我们。于是，我们十一个人经过长途跋涉，昼夜兼程，终于来到了据守在绥西河套的傅作义部队防区——五原县。

那时绥西河套地区是国民党军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傅作义的部队驻守。在五原县以东的乌镇亘西山嘴一带地区与日伪军互相对峙着。暂三军军长孙兰峰将军担任前线指挥，司令部驻于五原。我们通过封锁线与孙之所属部队取得联系，说明情况，受到他们的欢迎。到达五原后，驻军对我们举行欢迎会，有一千多人参加，孙兰峰将军还在会上讲了话。以后我们又到了陕坝，当时的国民党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傅作义接见了我们。傅作义对我们说：“你们来了，很好。我们团结抗日，一定能够取得最后胜利。现在好好地休息，等候安排。”我们在陕坝住了有六个多月，于一九四二年秋天，傅作义给我们成立了茂明安旗临时政府，由我担任旗扎萨克，金雅道尔吉担任保安队队长兼行政科长，那木海担任总务科长，并给我们这个茂明安临时政府成立了卫队，一切经费开支都由傅作义部发给。这样，我们茂明安旗政府与其他的各蒙旗政府一样，在河套地区坚持抗日斗争，直至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宣布投降，我们才随同傅作义进驻到归绥（即今呼和浩特市）。以后，由于国民党挑动内战，我们旗政府一直滞留在归绥，还一度迁往过河套，直至一九四九年随同参加绥远省“九·一九”和平起义。

一九七九年八月十日

我出生前后的热河南部蒙旗社会

李守信

在内蒙古近代史上，我是一个相当典型的反面人物。从我初给土默特右旗的喇嘛旗官充当“炮手”（卫士），继给热河游击队的统领，管带担任差官，于一九二一年升为奉军的营长，一九二六年编为热军的团长，一九三三年跟随东北陆军第十七旅旅长崔兴武投降日寇，进犯察北六县，其后又利用“七七”事变前后华北的政治形势，一跃而为伪“蒙古军”总司令达十年之久，抗战胜利以后又投靠蒋介石，参加反革命内战，全国解放前夕，又由台湾返回内蒙西部继续与人民为敌，最后成为罪大恶极的战争罪犯。这近四十年的复杂经历，真是臭名昭著。我的反动本质真是冰冻三尺，绝非一日之寒形成的。说来话长，下面我先从我的家乡情况，特别是我的阶级出身谈起。

我于一八九二年七月十一日（光绪十八年壬辰前六月十七日）出生于内蒙古卓索图盟土默特右旗的一个蒙古小地主家庭。我家居住的村子叫古力古斋（音台）大庙，归热河承德府朝阳县第七区管辖。它位于牯牛河东岸，南距朝阳县城一百八十里，北距土默特右旗黑城子王府九十里，从那里往东再走三十里，便是以后划为阜新县的土默特左旗。热河蒙古有好几个部落，分别在两个地方会盟，南为卓索图盟，北为昭乌达盟。清朝光绪初年，这两个盟以辽河上流的老哈河和西拉木伦河为界。老哈河南岸是农业区，西拉木伦河北岸是牧业区；老哈河

和西拉木伦河的中间地带，大多是半农半牧区。到了一九二四年第二次直奉战争前后，因为各旗相继放垦，在设治开鲁、林西、林东、围场、经棚之后，又设治了鲁北（即今扎鲁特旗所在地）和天山两县，因而老哈河北岸基本上也成了农业区，西拉木伦河的北岸也变成了半农半牧区。

卓索图盟由两部和两旗组成。两部是西南的喀喇沁部与东北的土默特部，两旗是土默特部东北的唐古特喀尔喀旗与锡埒图库伦旗。喀喇沁部分为左右中三旗，和古北口北面的长城接壤。土默特部分为左右两旗，和山海关外的柳条边墙毗连。这两部的蒙古人，很早就接受了汉族的文化影响。土默特部来源于现在的呼和浩特附近，故又称为东土默特部。据说在明朝嘉靖年间，有两家贵族领着一帮奴隶从俺答的统治下逃出，跑到这个临近海滨的高山深沟地带游牧，过起所谓“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掉进饭锅里”的狩猎生活。土默特部于满清入关以前，就投降了满清，被编为左右两翼。

土默特右旗在康熙年间，便有口里的汉人移入。少数是跟着公主、郡主下嫁而来的，称为“八大匠”的北京工匠，多数是贪图高额利润和种地不纳粮而来的山西商贩与山东农民。其中不少人跟蒙古妇女结婚而入了蒙古籍。土默特左右两旗，右旗在左旗西南，紧靠山海关外的锦州、义县和开化更早的喀喇沁部。这个旗在乾隆初年为塔子沟的东境，以后又在该旗的三座塔地方设治了三座塔厅，即后来的朝阳县。朝阳县的城里，有一座康熙年建造的喇嘛庙朝阳县佑顺寺。在建庙之前，那里就有了直到“九·一八”事变时仍然存在的山西人所开设的“三泰号”商店，故朝阳有“先有三泰号，后有喇嘛庙”的乡谚。可见土默特右旗在距今二百多年以前，就开始了蒙汉民族的杂居。蒙民里有姓鲍和姓乌两家贵族和姓白、姓高、姓戴等

家奴隶。由于他们的祖先来自呼和浩特地带，被当地人称为“真蒙古”；其他姓李、姓王、姓张和姓周等家奴，因为他们的祖先系娶蒙古妇女而入蒙古籍，均被称为“随蒙古”。土默特左旗在右旗东北，和汉族居住的地区，不像右旗那样临近，要晚开化好几十年，所以又称为“蒙古真旗”。

我们古力古畜大庙的李家是“随蒙古”。我的祖先是山东济南府长清县李家庄人，单身跑来土默特右旗给蒙古人种地。后来被主人招为养老女婿，入了蒙古籍，成了“随蒙古”（我父亲曾和朝阳寺村的汉户李家联过宗）。不过，以后我们好几辈子再没有和汉族通过婚，我的祖母、嫂嫂和我的元配女人，都是天足，会说蒙语。

最初移居牧区的汉人，都依附于蒙古人。正如农业地区的少数民族，遭受大汉族主义的压迫一样。游牧地区的汉族人民，也遭受地方民族主义的欺侮。据说初到牧区的汉人如果不入蒙古籍，可以说动辄获咎，除了砍柴不许越界，牧养不准出圈，并且有蒙古地痞流氓，随便闯入汉民家中索要酒食。所以在土默特右旗不只有单身汉入赘蒙家的汉人，也有全家入了蒙古籍的汉户。这是清朝康、雍、乾三朝时的情况。以后由于蒙民掌握了农耕方面的生产技术，奴才不堪贵族压榨，亦有“出旗”逃跑到汉族的村庄，入了汉籍的蒙人和蒙户。在我能记事的时候，热河南部只有蒙汉上层人士在制造民族分裂，一般蒙汉劳动人民，已经很少有强烈的民族观念了。

土默特右旗设治三座塔厅和后来的朝阳县之后，口里的汉人大量涌入。这些汉人的阶级成份非常复杂，不仅有劳动者和商贩，也有匪盗与封建会道门分子，以及遁逃的罪犯与失意而有野心的文人。就是在劳动人民里后来也分成两极：有的成了地主和开设“烧、当两行”的财东，有的成了贫雇中农和手工

业者。农民非常封建保守，不像牧民那样轻易流动，在一个地方住久，便产生了“热土难离”的情感。牧民定居下来变成农民以后，也是如此。

民国初年我刚当兵时，开到西喇木伦河以北的林西和开鲁驻防，那里把种籽扔到犁过的地里，不用锄耩就可以生产出“成亩打石”的粮食，可是人烟非常稀少。而我的家乡上默特右旗，早把高山变成了梯田，用毛驴驮粪在好多炕大的小面积土地上施肥。据一九二七年调查，朝阳全县的人口已达到六十五万四千余口，绝大部分是汉族农民，不论是“真蒙古”和“随蒙古”，合计起来也不足一万人。此外还有极少数回民。在朝阳县城以南，蒙古人多系上默特左右两旗和喀喇沁部不堪王公贵族压迫的“逃户”。他们改名换姓潜居到汉族的村庄，给汉族地主佣工受苦或饲养牲畜。县城以北凡是川口地方，多系以蒙古人为主的村庄，称为某某营子，山沟里完全是称为孤家子、两家子以及三十家子与五十家子的汉族村庄，表现出一种人稠地窄的状态。

朝阳是热河人口密度最大的一个县，以来自山东的移民占全县人口的多数。这些山东移民把山东的各种风俗，完全搬到上默特左右两旗及敖汉部与奈曼等旗。在热河朝阳人多好勇斗，特别是朝阳城南羊山、犂子沟、二十家子和松树嘴子一带的农民，表现更加突出。有些人因不满王公、地主的压迫，愤而起事，也有的因贫困无着，散而为匪。尤其朝阳境内尽是大山深沟，牝牛河日夜吼叫，所谓“山高水暴出刁民”和“险固足以自守”，越发成了生长胡匪的窝穴。朝阳县城不只一次被“暴民”和胡匪攻破，故有“久反朝阳”之称。朝阳最初的土匪，是朝阳寺附近头道营子根顿召的几个喇嘛。他们在道光年间便跑到柳条边墙东边的奉天境内抢掠，人称为“马鞑

子”。以后回子沟的回民韩三、韩四弟兄，也跟着蒙古喇嘛效尤。到了咸丰初年，就有称为“教人好”的胡匪在朝阳境内出现，开始了绑票。接着关东奉天、吉林的胡匪（内中有科尔沁部白凌阿率领的蒙匪），不断闯入朝阳。朝阳的地主阶级组织起民团，城里的商户设立了铺勇。同时因为土默特右旗和敖汉部均发现了金矿，朝阳本地也出现了私开金矿的“金匪”。在英法联军把咸丰皇帝从北京撵到热河的那年，有冀东昌黎县秀才柴宝善，鼓动朝阳金场沟的“金匪”李凤奎称帝，于阴历二月初二日攻入县城，其母穿戴着戏班的凤冠霞帔招摇过市。与此同时，土默特左旗蒙民因王公差丁过重，由恩合巴图等组织“老头会”进行反抗，将阶级斗争转化成民族仇杀，也进入朝阳县境焚掠。

上述这些都是小的骚动，大的变乱是一八九一年（光绪十七年）金丹道的起义，和一九〇〇年至一九〇一年（光绪二十六年至二十七年）二十家子和铎子沟“联庄”跟松树嘴子天主教堂展开反帝斗争的两次重大的历史事件。

金丹道起义，发生于敖汉旗，后来波及到喀喇沁和土默特左右旗。朝阳的蒙汉人民称金丹道徒为“学好”，可能是这些道徒仿效胡匪的行径所致，所以关东和热河的胡匪首领多以“好”字为号。如前述咸丰年间在朝阳扰乱的“教人好”，以及后来张海鹏部下的王永清叫“天下好”等等。金丹道起义时的政治口号是“天清扫胡”四个大字。这是由于蒙古王公、旗官压迫汉人，金丹道徒利用这种情况而挑起了事端，聚众攻打敖汉旗贝子府。

大汉族主义固然能给少数民族带来灾难，地方民族主义也能挑起边疆地区的变乱。“九·一八”事变以前我在开鲁和林西驻防时，还听说迁入科尔沁草原种地的汉人，一旦发家致富

之后，即有被当地的牧主和大喇嘛派人把全家屠杀的危险。巴林左、右旗中间有个蒙古豪强×××，他住在大草原中间一个单独的大院，到那里投宿的汉族商旅，只要行囊沉重，也有永远失踪的危险。

敖汉贝子兼昭乌达盟盟长府邸被金丹道徒包围烧杀时，唯一逃脱的是他的一个孙子德松坪，人们称为“老德王”（热河人称西苏尼特旗的德穆楚克栋鲁普为“小德王”）。此人于我当了军官之后，和我变成称兄道弟的朋友。据他亲自和我说：他家居住的上府街北面十五里，有一座东西二百里、南北五十里的大黑山，埋有康熙皇帝嫁给翁牛特部和喀喇沁部的两个公主，所以称为东陵和西陵，蒙古王爷就借此严禁汉人入山砍柴。有一次一个砍柴人被敖汉贝子府的兵丁衙役逮捕，用树杈插入肛门扔到空中处死。金丹道首领、建昌县医生杨彦春和齐老道等，便以此挑动起民变。他们除烧杀了敖汉贝子府和附近所有的蒙古村庄，并于是年阴历十月十二日，攻入朝阳县城。后经佑顺寺喇嘛潘成连夜骑马跑到锦州告变，由一八九四年“甲午战争”死于朝鲜平壤的那个左宝贵，率领马步三营军队开到热河始将战乱平定。

到锦州搬兵的潘成，就是我曾给充当过“炮手”的罗旺喇嘛的师父，即热河很出名的周仓喇嘛，拉扯起来还是我的师祖。因为金丹道徒看见蒙古人“格杀勿论”，敖汉部白塔庙出了一个三喇嘛，也因替父报仇，聚众惨杀起汉人来。这样民族间互相仇杀的结果，把敖汉、喀喇沁和土默特的好多蒙古人，都逼得跑到科尔沁部，谓之“跑学好”和“躲学好”。汉人被杀据说有三四万人，双方的财产损失更无法估计。战乱过去以后，朝阳、建昌北部出现了好多无人的村庄。清廷曾每人发给三串朝阳“塔帖”，对蒙古人进行过赈济。我父亲那时扔不开

家业，把妇孺们寄藏在山上，他一个人留在村子里看门，钻到灶火的炉坑里面，用头顶起铁锅瞭望外边的动静，他曾看见从敖汉部退往阜新县的“学好”，从我们村边整整过了一天一夜，官兵追了上来，他们发出“逮逮逮”和“杀杀杀”的喊声上去包围。因为“学好”们尽拿着土枪刀矛而缺少快枪，最后剩下一万七千多人，都被左宝贵的军队兜围到我们村东一条名叫“寻死沟”的深沟中完全歼灭。

我是“跑学好”的第二年所生，当一九〇〇年义和团掀起反帝斗争时已经九岁。因为义和团攻打的是天主教东蒙古教区主教所在地的松树嘴子，那里在朝阳县城东南。朝阳县南北长达七百余里，松树嘴子和二十家子、铎子沟一带，距我家有三百多里，故未被战争波及。朝阳县东南事态闹得很大。铎子沟和二十家子的地主，早已建立起联庄的组织，而松树嘴子的地主武装，有比国神甫给弄来的洋枪，把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势力结合在一起，这两方面经常发生摩擦。当时，铎子沟和二十家子的“联庄”，由朝阳庠生邓云成（字莱峰）领导，在义和团攻打松树嘴子教堂时，“联庄”没有派人直接参加，只供给食宿和借给火枪等武器。就是这样，当天主堂从奉天把俄国军队调来，将义和团击退以后，便向松树嘴子以西的蒙汉人民展开了报复性的焚掠。除火烧永顺寺和云楼寺等蒙汉召庙外，还进入朝阳县城劫狱，沿途奸淫烧杀，无所不为，因此激起朝阳广大蒙汉人民的义愤。

天主教徒和俄国兵攻打二十家子时，邓云成叫“联庄”退让，最后天主教徒和俄国兵包围铎子沟时，邓云成才决定抵抗。因为“联庄”那时也有了八厘米快枪，并且民团义愤填膺，在沙皇军队和汉奸洋狗的面前，抵抗得非常英勇，所以铎子沟始终未被攻破。一直从一九〇〇年秋天支持到一九〇一年

夏天，由直隶提督马玉昆亲自前来调停才停战。天主教堂斗不过“联庄”，却利用法、比等帝国主义向清廷施加压力，而邓云成表现出地主阶级的投降妥协性，以为事情就此罢休。不料是年初冬，清廷把宋庆的毅军调来，对铎子沟“联庄”按暴民进行了剿除。邓云成和他弟弟邓云祥及儿子等，突围出去跑到柳条边墙的清河门，被追兵杀死，方使松树嘴子的外国神甫消了气，将这一风波结束。

朝阳于扎鲁特部放垦设治为开鲁县以后，好多农民都搬到那里种地。我的朋友张秉彝（字子良，朝阳照星沟人），曾任赤峰商埠交涉员和开鲁县长，在那里购买了好多土地，他的儿子张念祖是开鲁的大恶霸地主。在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时，还率领当地的民团，缴过进入东北苏联红军的武器，得了不少转盘机枪。

朝阳在我出生前后，差不多年年有战乱，因此几乎家家有武器，人人都会骑马打枪。加之当地赌风很盛，到处有赌场，好多青年因为输干要光，逼得当了胡匪。我住的那个第七区，有两班一百二十多人的“京梆子”剧团，春夏秋三季经常在各村巡迴演唱。天不落雨唱“祈雨戏”，天要落雨唱“谢雨戏”，无非是利用庙会聚赌，绅士和军警借给戏班抽价向“宝棚”领钱。至于地主人家，一遇刮风下雨就开局，掌柜的把伙计们的工钱，完全用“宝盒子”扣入自己的腰包。这种现象不仅是朝阳如此，我在经棚驻防时，看到西拉木伦河北岸的乡下，赌风比朝阳还厉害。那里有一个当乡约的刘祥兆，是一个白手起家的大地主，也用“宝盒子”和其他方法剥削长工，以致给他受苦的人负债累累，成了他的不吃草料的牛马。朝阳因设治已久，不像北边那样“开放”，但是赌毒和烟毒，可以说遍地皆是。至于各部的蒙古人，用一种染有红白颜色的牛骨头做为赌具，

也赌得很凶，以致不少人倾家荡产。热河的锥子山盛产鸦片，共有四五个品种，到了天气上冻时，还割不完烟浆。锥子山的鸦片行销热河各旗县。各旗县也多种植此种毒品，使许多人沾染上不良嗜好。民国初年，日本人又从奉天方面给热河输入进金丹和吗啡，毒性比鸦片还要强烈。这样赌博添上烟毒，把不少劳动人民胁迫进胡匪里。我家东南八九十里地方，有一座广岭山（亦称翳巫吕山）便成了关东和热河的贼窝。广岭山东是张作霖的老家黑山县，广岭山西有汤玉麟的故乡阜新县骚虎营子。

热河蒙汉人民称胡匪为“耍人的”。主要来源于染有烟毒嗜好的劳动人民，不过也有民团中的乡勇和军队中的士兵，以及地主家庭的子弟，由于种种原因而走上此道的。三五成群的小胡匪，当地人叫做“地蹦子”，他们势孤力单，民团还可以对付；如果遇到立起“字号”的大胡匪，他们能成为几百甚至千余人的伙子，民团便得和他们交朋友，不敢采取敌对态度。热河各县的民团，完全由地主和一部分烧当两行掌握。朝阳附近的地主所拥有的土地面积，虽然不如西拉木伦河以北以及察绥两省的大地主多，但是差不多都像王英的父亲王同春那样，在家中养有护院的“炮手”。并且他们互相联络勾结，结成很坚固的“联庄”组织。必要时，“耍人的”因他们平日供给械弹和负责掩护，也纷纷前来“帮忙”，成了他们豢养的爪牙羽翼。朝阳的地主阶级是结成集团来对抗官府。光绪年间，因为反对成立警察和创办学堂，都跟政府闹过事。民国年间由于反对铲除烟苗，经常把军警赶跑。汤玉麟统治热河时，曾激起朝阳的民变，几乎被羊山和二十家子的“联庄”和红枪会，把他的五弟汤玉书包围歼灭在朝阳县城。

朝阳的汉族“大家”（内蒙西部称大户）都有炮台，中等

户也是好多家建有一个围堡，凡是他们对付不了的胡匪，均在里边窝藏。土默特右旗的王府，除了在黑城子经常驻扎着一百多“小队”，王爷收地租的“局子”以及旗官们种地的“青房子”（即窝棚），均有四五十个“炮手”保护。他们和汉族的地主一样，也包庇收容立有“字号”的胡匪。至于土默特左旗、喀尔喀旗与库伦旗那里的王爷、旗官、牧主以及召庙的大喇嘛，不仅养有“炮手”和交结胡匪，并且和外蒙的哲布尊丹巴活佛和内蒙的巴布扎布“宗社党”勾结，受沙俄和日本帝国主义利用，培养出好多蒙古的亡命徒，于民国初年形成了所谓的“蒙匪”，在热、察、绥三省和科尔沁等部捣乱。后来变为我的帮凶的田英（曾任伪蒙古军副师长）和胡宝山（曾任伪蒙古军团长），就是土默特右旗的人。田英于一九一三年参加外蒙军队，到过张北县以北二十里地的白城子。胡宝山在一九一六年巴布扎布战死林西之后，才到热河游击队当了兵。据他们后来和我说，在这些“蒙匪”里，外蒙古人很少，大都是察哈尔和热河的蒙古人。由于以上原因，所以朝阳一县经常有十几营官兵驻防。二次直奉战争前，朝阳城里还设立着一个镇守使署。官兵开到朝阳，也不敢过于蛮干和硬剿，必须和民团、胡匪取得妥协，才能够站稳脚步，因而朝阳是官兵、民团、胡匪联成了一气，像三座大山压在善良百姓的头上。劳动人民不想做俯首贴耳的奴隶，就得挺身当打家劫舍的盗贼。失败的固然要杀头挨枪毙，立住“竿子”的便会升官发财。我就是成长于这样的环境里的。

土默特右旗设治朝阳后，王公、旗官、贵族据有大部分好地，山野完全卖给汉人辟为农田，给一般奴才分配的“户口地”很少。王公、旗官因为放垦时得到好多“荒价”，并且年年能向汉族农民收取“小租”，所以都过着腐化堕落的奢侈生活。

贵族拥有大面积土地和好多奴才，也是饱食懒做终日吸食鸦片，多半活不到大的寿数。特别是王爷以值班为名，常年住在北京，旗下的协理和“堂官”等大肆贪污，因而奴才在政治上遭受苛捐杂税的压榨，经济上还有一层贵族的剥削。在本旗活不下去，出旗逃往外地的很多。土默特右旗的王爷，在北京西城的酱养坊占有一顷地大的一座府邸，里边有楼房假山和可以划船的小湖。日本投降后，“小王爷”沁布道尔济想卖给我居住，索价要六十万美金。

我们古力古斋大庙，共有一百多户人家，一半是蒙古人，一半是汉人。这五十多家蒙古人里边，姓赵和姓朱的三十多户，都是王爷的奴才。地里所产的粮食，只够吃半年，缺短的口粮，必须以佣工和经商来换取。故姓赵的开着留人店和杂货铺，姓朱的给汉人和我家揽工。他们都是“穷蒙古”，只负担黑城子王府的差丁（因为从他们身上榨不出油水，只好服劳役）。我们李家由于祖先来自山东，子孙比较善于耕耘土地，收入稍微宽裕一点，故有过念书当了医生的。我父亲从小弯腰曲背，村子里的人，除过因为他舍不得花一文闲钱，给他起了一个“土包子”的外号，通常称他为李罗锅子，方圆几十里以内谁也知道。朝阳的土地面积讲“天”，一“天”等于十亩。在生我大哥的时候，我父亲已拥有三十多“天”地，还有牛马和羊群（四五十只山羊），经常喂着十几口肥猪，还从几家破产的蒙古贵族手里买到一百多串“小租”。我家一面剥削给我们种地的三四个长工和几十个短工，一面也受外边各种势力的压迫敲诈。

首先干扰我们生产和生活的是一个姓鲍的名叫色楞台吉的贵族。因为他是我们的诺颜（奴主），我们是他的奴才，我们姓李的全归他所有。可是他来到古力古斋大庙，不去找我的

本家(由于从他们身上榨不出油水),专门吃喝我父亲李罗锅子。色楞台吉住到我家以后,每天须以好酒好肉和鸦片款待,临走时还要拿银钱和烟土,以及捉猪宰羊拉米馱面。那时我家不说土炮火枪,单是快枪已购到三枝,我几次想拿枪把这家伙干掉,可是我父亲不允许。他说:“诺颜杀了奴才可以不偿命,奴才杀了诺颜得满门犯抄”。后来我父亲用两万串朝阳的“街市钱”(每百文折铜钱十六文),以一万七千串的整数,交给色楞台吉做了赎身的价款,用其余购买黑城子衙门的“档子房”,给发了和色楞台吉永远脱离主奴关系的执照。但色楞台吉仍不断来我家跌皮耍赖,我父亲依然奴颜婢膝地对他表示恭维,一直把这个没有儿女的驪夫供养到死。

我们由奴才变为“自由民”(达尔罕民)以后,很可以像别家蒙民编入朝阳的汉户,但是我父亲又怕亲戚乡里在背后批评,所以跑到北票山南面八里的下府,给土观活佛仓的喇嘛花钱,领了一张印票,变成了那个召庙的“庙户”。最初土默特右旗的王爷,就住在下府地方,此处在大牛河西岸,离我家五十多里。土默特右旗王爺修的这个召庙极为宏伟,里边有五百多喇嘛,附近的好地都归庙上所有,土观佛的收入很大。属于庙上的“庙户”,只给捐献少数香钱即可,土观佛每年“游旗”到各村给蒙民和他的庙户“净宅”时,也只收取一些随心布施,所以庙户比蒙户负担要轻。虽然这样,但是富裕庙户也得有人给“抗风”,否则仍然有人欺侮,遭受种种压迫。

我父亲已经不会说蒙古话,我母亲会说而不说。我家除了在院子中间有一根喇嘛给立的“玛尼”杆子,生活习惯礼节以及所供的神位和汉族的庄稼人完全一样。我有两个哥哥,大哥按照蒙古人的风俗,许在本村庙上当喇嘛。后来父母舍不得叫他去,就让我去顶替。我本来起乳名为那孙巴雅尔(长寿的意

思)，结果叫成了一个三喇嘛。古力古畜大庙在北往开鲁、南到义县的大路中间。我家是该村的首户，修建着院墙很高的大院，过往军队和商旅，都到我家的伙房中投宿。我家有三枝快枪，仅能堵挡“地蹦子”，但是打不了人胡匪，所以只好和他们交朋友。我七八岁时，胡匪经常拉着整车“肉票”在我家打尖住夜，我们杀鸡宰羊，用好酒好饭招待。到了称为“外八营”的直隶练军开到我村驻防，胡匪才绕开了古力古畜大庙。我从小就爱玩枪骑马，并且喜欢和当胡匪与当兵的人接近，听他们讲那些过五关斩六将的经历。因为自己家中有枪有子弹，时常拿到山上打野兔，我十一二岁时，射击技术就打得很不错了。我父亲怕我长大成人给他生事惹祸，先是以四块银洋的束修把我送到村子里的私塾，念了半年《百家姓》和《三字经》。由于我经常逃学，又叫我带领长工，早起晚睡地做庄稼活，想把我培养成他那样守家过日子的地主。可是，我从小就想到外边广阔的天地去闯一下，我父亲对我没有办法，最后又企图利用女人把我拴住。在我十四岁那年，就给我娶了一个比我大七岁的名叫德力玛的蒙古老婆。

“庙户”不给土默特右旗负担差丁，但是由于我家的土地，大都是向汉族的种地户购买的“粮地”，所以和汉族的地主一样，得给朝阳县衙门交纳田赋，并支应地方上的其它差事。朝阳在宣统年间以前，各区就成立名叫义务警察的一种民团。凡是有地十“天”的担任步警，有地三十“天”以上的担任马警，谓之“步户”和“马户”。我家有地三十多“天”，够上出马警的资格，最初是自备枪马，每年花二百多块银洋雇人到朝阳七区替我大哥当差。我娶过老婆之后，我父亲看见我成天在“外八营”的兵棚子里厮混，并不去田间劳动，索性叫我前去担任“马户”。我当了马警，真是“初生犊儿不怕虎”，

每跟小股胡匪作战，老是冲在前边硬打穷追，发出的子弹讲究必须要“吃肉”，我把杀人当成了儿戏。^②“地蹦子”们听见我很感头疼。我那时还不叫李守信，按我大哥李君、二哥李臣的顺序、教书先生给我起的官名叫李义。因为打了几个小仗很勇敢，“李义”便在民团、胡匪和官兵中间出了点名。连平顶山庙上的大喇嘛和黑城子衙门的协理，也知道古力古畜大庙的李罗锅子家中出了一个少年“炮手”。我父亲听见这些话以后，当然非常担忧，一面怕我“久走冰滩难免有滑倒”的一日；一面怕我跟胡匪结下冤仇给家中招来灾难。因此我当了几年“马户”以后，我父亲又雇人把我替回，以免我在外招风闯祸。

我回到家中，除了当“马户”时交结的朋友，不断前来找我，尤其是“外八营”在我村驻防时，有老板纪小辫部下的一个安大个子（即安静海，又名安占武，朝阳兆星沟人，汤玉麟时代任过经棚县公安局长），这时在朝阳北境当了胡匪，而且立起了“字号”，每次路过古力古畜大庙，总要到我家勾引我去入伙。同时朝阳县的警察、黑城子王府的衙役和过往的军队，路过古力古畜大庙时，因为我家富裕而无势力，老是连人带马住下大吃二喝，吃饱喝足抹嘴扬长走去。我忍受不下这种窝囊气，好几次想把他们赶跑，被我父亲阻止而未发作。我父亲看见我呆在家中也会生事，又想出了一个办法，让我到距家十七里的平顶山上去当喇嘛。平顶山庙上的当家大喇嘛姓白，是朝阳佑顺寺外号周仓喇嘛潘成的徒弟。潘成因到锦州搬兵平定金丹教有功，并且和毅军的宋庆、姜桂题、米振标等结交成朋友，后来成了热河的地方绅士。朝阳县官上任，必须先拜望潘成，才能座稳。他的几个徒弟便借此横行乡里，成了朝阳乡下的恶霸。平顶山庙的白大喇嘛，又名罗旺喇嘛（罗旺是西藏语），我给罗旺喇嘛当徒弟就成了周仓喇嘛的徒孙，我父亲好

借以支撑门户。另外罗旺喇嘛收我为徒，并不是给我传授经卷，因为他知道我很会打枪，是托人指名叫我前去给他保镖。我父亲便在我二十一岁那年，让我剃掉辫子到平顶山“出家”，做了成天背着手枪，伺候军官地主和胡匪头子的蒙古小喇嘛。

平顶山庙是一个只有四十“天”和五十多个喇嘛的穷召庙。可是罗旺喇嘛的声势，却令人侧目。他跟“耍人的”与“官线上的”（内蒙西部称“官面上的”）都交往，热河和关东都有他的好朋友。在我们村里驻过防的纪小辫，跟他磕过头；当了胡匪的安大个子与以后给汤玉麟担任热河保安旅长的赵国增，是他的结拜弟兄。罗旺喇嘛背枪的徒弟，除了我以外，还有一个从小出家叫做吉祥的小喇嘛。此外雇有两个厨师，给他炒菜应酬四面八方而来的客人。由我们两个徒弟，从厨房到客房给端茶递水。他白天给“官线上的”洗尘，黑夜给“耍人的”接风。有时这两方面的人碰到一起，就分别在两个院子里招待，双方都假装不知道，故发生不了冲突。朝阳、锦州和义县等处的大地主子弟和“烧、当”两行的伙计，被胡匪绑去以后，都得托他给“说票”。他仲裁出“赎价”，如果胡匪不买他的帐，可以调动别的胡匪和官兵去联合剿除。“说票”成功以后，地主和“烧、当”两行，以上布施和舍饭的名义，用金钱、烟土和粮食、牛羊对他进行酬谢。罗旺喇嘛每次出门，都是坐着带串铃的二骡轿车，我和吉祥骑着快马，一前一后跟着。我们除了背着一枝八米厘长枪，还挎着一枝德国造“自来得”手枪。朝阳、锦州和义县的商号老板，听见他的串铃轿车从街上走过，多从柜台上出来拱手迎接，称他为“喇嘛爷”。朝阳、锦州和义县的县官出门，也不如他威风。

我一共给罗旺喇嘛当了二年多“炮手”。在这期间，可以说大开了眼界。不仅跟许多“耍人的”和“官线上的”人混

熟，并且知道了不少为匪和官的门径道路与诀窍。认识到当时的世道，原来就是这个样子：只要自己有一套“本领”，得到一帮子人的拥护，就可以为所欲为，扬眉吐气。因此我跃跃欲试，很想自己也创立一个“字号”。我那时就懂得了交朋友的重要，用小恩小惠去笼络他们，让他们做为自己的工具。罗旺喇嘛每年有好多人给庙上上布施和舍饭，但是除了我和吉祥而外，其余的那些小喇嘛，每天早上只有仓里给发一碗米，连老腌菜和大酱都没有。罗旺喇嘛没有客人前来的时候，即到平顶山底下的头道营子，以“回娘家”为名，由吉祥在外边站岗，去和一个蒙古寡妇睡觉。我利用这一空隙，拿枪给小喇嘛们打野兔吃肉，他们当然对我非常拥护。罗旺喇嘛人很聪明。现在回想起来，他总是看见我野心勃勃，恐怕留在身边闯下大的乱子，当我二十三岁那年，说我随便打野兔杀牲，不能当佛门弟子，遂婉言把我辞退，并且把我介绍到黑城子王府，给他的朋友、衙门管印的协理富巴什当了“炮手”。

黑城子因为王府修建着一座黑压压的大土城而得名。城里除了王府和衙门，便是王公、仕官所开的商店买卖。城门洞像张大的血口，吮吸着朝阳城北蒙汉人民的精髓。王爷每年夏天从北京回来避暑，带着一班京戏艺人在王府享乐，不肯轻易出门，公事全交给这个掌印协理办理。富巴什在城里有一处大院，里边还套着一个小院，大院中好多奴才给他铡草喂马，推碾围磨，他在小院中和老婆头对头抽大烟。富巴什在城外有四五处“青房子”，土地达好几千“天”，每年收租在万石以上，粮食堆积如山。他除了指挥旗下的“小队”，身边经常有四个“炮手”保护。由他家到衙门只有百十步地，也要乘坐轿车，让我们在前后跟着，做他的“顶马”。他在“档子房”办公时，我们得在门房中呆着。我那时已经长硬翅膀，如何能当这分“穷

差”，所以干了三个多月，便把手枪扔给他跑回家中。那年我父亲整整七十岁，我看见他风烛残年，由于我二哥病故终日啼哭，故不忍扔下他远走高飞。到了一九一七年，我父亲七十三岁逝世，我再没有牵挂和管束，翌年我二十七岁时，即被安大个子叫到朝阳的邻县建平，参加了亦官亦匪的热河游击队。因为安大个子和赵国增等，被熊希龄的同乡张协堂收抚，在那里都当了军官。从此我就跑到外边闯荡江湖，逐渐走上了直接危害人民的反动道路。

（刘映元整理）

内蒙古的“小北京”——定远营

陶布新

位处内蒙古自治区西端、贺兰山北麓的定远营，是原阿拉善旗^①政府所在地，为塞外的重镇，草原上的名城，人们都把它叫做“小北京”。

解放以后，定远营已经改称巴音浩特。这里既有发电厂、毛织厂、机械修理厂等工业建设；又有中小学、大礼堂、电影院、广播站等文化设施。街道整洁，焕然一新，改变了原来的旧面貌，有了巨大发展，成为西部蒙旗^②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

定远营的形成和由来是有其政治、经济、地理等因素，并经过了漫长的历史过程。

(一)

定远营环境幽美，风光秀丽，地处贺兰山峰环绕之中，北面有半山绵延起伏。阻挡着凛冽朔风的侵袭。两山中间形成一块大的盆地，有三道川流^③经过，登高远望，辽阔草原，牛

①原阿拉善旗现已划分为阿拉善左旗和阿拉善右旗。定远营（现名巴音浩特）是阿拉善盟和阿拉善左旗政府所在地。

②西部蒙旗——指阿拉善左旗、阿拉善右旗、额济纳旗三旗。

③三道川流——系指头道河沟（蒙名：乌日左图高勒）、二道河沟（穆瑞高勒）和三道河沟（奥日格勒图高勒）。

羊成群；俯视近郊，树木苍翠，田野毗连。

定远营气候适中，夏天不感有三伏的炎热，冬季不感有三九的酷寒。春、秋季节，更是天气温和，野花盛开，香飘十里，令人心旷神怡。

定远营交通方便，四通八达。其北，通过广袤草原，可达蒙古人民共和国首都乌兰巴托；南有汽车公路直达宁夏回族自治区首府银川；东部通过铁路及黄河可达包头；西部通过陆路可达河西走廊。这样，定远营便形成西北草原上一个皮毛、盐、碱等土特产品的集散地。

(二)

定远营的形成和发展，是有其长远历史发展过程的。根据史书记载和老年人的传说：原阿拉善旗的蒙古族是从原居新疆的和硕特部落分出来的。在清朝初年，噶尔丹部保希克图被族众推举为部落长，势力强大，四处征杀。和硕特部落一部分人，为避战乱之扰，移至青海居住。该部的郝若力率领几千人，于一六八六年（即康熙二十五年）到了阿拉善旗北部，向清朝报告了新疆噶尔丹部保希克图之乱，表示归向之心。清朝念其率众来归，遂将贺兰山一带很大的地方赏给他们居住。一六九六年（即康熙三十五年），晋封郝若力为贝勒，发给扎萨克印信，于是郝若力便做了阿拉善旗的首任扎萨克，统治这块地方。

到了一七〇四年（即康熙四十三年），他的儿子阿宝已经长大成人，英俊有为，康熙皇帝便将鹅掌公主下嫁于他，晋封阿宝为额駙。郝若力死后，阿宝承袭了贝勒爵位，继续统治阿旗这个地方。一七二〇年（康熙五十九年），西藏发生变乱，

清朝派将军延信调动青海、喀尔喀各地军队前往平服。阿宝与公主也带队五百人随往出征。在平定西藏变乱、保护达赖喇嘛复位上建立了很大的功劳。一七二三年（雍正元年），阿宝王从西藏凯旋归来，因功又晋封为郡王。是年青海又发生了罗卜藏丹津的叛乱。清朝派大将军年羹尧率兵前往征服，阿宝王又率阿旗全体官民随同出征。青海叛乱平定后，阿宝王留在青海镇抚，驻有八年之久，简直成了青海的统治者了。但是原阿旗这块地方，无人管理。清朝于一七二六年（雍正四年）派兵部右侍郎通智率领人员勘查阿旗地方，看到贺兰山北麓一带，环境幽美，地域辽阔，有山有水，树木成林，就请清朝皇帝拨给银两兴建城池。迨一七三〇年（雍正八年）始告竣工，乃定名为定远营城，并设有参将衙门，调军驻扎，管辖和镇抚这块地方。一七三二年（雍正十年）阿宝王从青海回来，清朝皇帝便将定远营及原阿旗全部地区分封给他。阿宝又修建王府，建筑寺庙，定远营便初步形成原阿旗的政治中心。

阿宝王死后，他的儿子罗布僧道尔吉继承王位，曾率领阿旗军队随同清军前往平服准葛尔之乱。据说曾在夜间亲率二十七名勇士，偷袭敌营，生擒准葛尔首领阿布尔撒那。清朝为了嘉奖其功，晋封为亲王，并在北京赏建罗王府，还加封他的部下二十五个云骑尉，一个恩骑尉^①，一千达尔罕^②，准其子孙后代世袭其职。罗布僧道尔吉由新疆凯旋归来，仍为原阿旗

①云骑尉、恩骑尉——封建帝制时代军队中的军阶称号，有的还兼有封地。

②达尔罕——也称答尔罕、答刺罕，蒙古语。古代蒙族社会里的一种称号，意指平民或奴隶因军功或其他勋劳被主人释放的人，是世袭制，有此称号的人，可以免除对主人的人身隶属关系和赋税、徭役负担。

的扎萨克亲王。他的后人第四代旺钦班布尔，第五代玛合巴拉，第六代安都布苏隆，第七代贡僧吉儒穆德，第八代多洛得苏隆，第九代塔旺布力扎拉，第十代达理扎雅，一直住在定远营，承袭扎萨克亲王的爵位，历经二百余年。

定远营在城池和王府的建筑上，市民住宅和街道的布置上，均仿照北京城的式样。特别是西花园一带，在贡僧吉儒穆德执政时期，建有荷花池，修筑一条名谓“长河”的很长的渠道，把三道河沟流水引入，用以摆渡游船。还建有宏伟壮观的如意堂、精制秀丽的亭台，人工制造的假山，开阔宽敞的花园，栽种名花异草，培植各样果树，供作王公贵族游憩宴乐之所。

定远营素有塞外草原“小北京”之称。但后经变乱焚烧，弄得房倒屋塌，只剩下残垣败瓦，如按图索骥，当年的遗迹犹存，还可窥见其宏大规模。

（三）

定远营成为原阿旗的政治中心，随着各种机关的设立，商业贸易的开展，人口也逐渐增加了。

定远营的蒙古族人，一部分是王公贵族，多是长期居住定远营的。在牧区或附近农区有他们的畜群或田地，雇工放牧或放“苏鲁克”^①，把田地租给佃户耕种，他们按时收租分畜，坐享其成。另一部分是在阿旗政府和其附属机关供职的官吏。有的因为是长期供职，就带着家族和仆从在定远营置买住宅长

^①苏鲁克——蒙古语，原意是畜群。解放前，蒙古上层、牧主或商人将牲畜群无固定代价的让牧民代为放牧，进行超经济剥削；或以固定租金形式让牧民代为放牧，进行大量剥削，两种放牧形式均叫放“苏鲁克”。

期定居下来，最大部分是寺庙喇嘛和保安队员兵。据老年人传说，仅延福寺，在清朝时期，喇嘛曾多达二百多人。保安队员兵虽然也是轮流调训换班，但经常住在定远营的，总保持百人左右。此外，还有随同公主下嫁由北京而来的满人和汉人，有八大家、四小家之称，也在定远营安家立业，入户随旗，成了蒙古人。

移到定远营居住的回族人，多是从宁夏银川、盐池、同心、平罗一带来的。他们开始迁来时，多从事饮食、旅店、运输、屠宰各业，只是为了谋生就业，人数不多。嗣后为了躲避孙殿英的扰乱和逃避马鸿逵的抓兵而来的就日渐增多。

在定远营居住的汉人，多是从山西、甘肃民勤、原绥远包头一带来的。他们从事商业和手工业，也有一部分人种植粮食、蔬菜及经营园艺等生计。

定远营的人口，据老年人说，在清朝光绪年间，已有三千多人，到了一九四九年解放时，已经增加到八千八百九十三人。由此可见，随着各族人民的迁入和集中，才形成定远营这个草原城镇。

(四)

原阿拉善旗有辽阔的土地和广袤的草原，各族劳动人民，长期从事畜牧业。据老年人说，在玛合巴拉执政时期，由于地方平静，风调雨顺，原阿旗牧畜总数曾达到二百多万头。此外原阿旗有吉兰太等天然盐池，还出产煤炭和苁蓉（大芸）、甘草、锁阳等土特产品。这些物资，大部分在定远营集中，再向绥远、包头、北京、天津等地运销。因此，定远营便成了皮毛、牲畜、土特产品和粮食、布匹、日用百货的集散地，商业和手工业也随着发展起来。

到一九三六年，资金在七千元至万元以上的商店就有祥太隆、永盛公、兴太隆等十多家，加上中小商号和铁、木、毡靴、铜、银等手工业作坊，以及旅店、饮食、屠宰、运输各业，总共有工商业户一百多家。这些工商业者，特别是如祥太隆等大商号，用各种方法，剥削劳动牧民，赚取高额利润。例如解放前祥太隆等商号在牧区用一方一尺二寸宽老布（土布）换驼毛一斤，半匹斜文布换混合驼毛一百二十斤，三块（四两重一块）砖茶换一只羊，一斤半白面换羊毛一斤，利润均在百分之百以上。如以粮食换取牲畜计算，每石黄米成本二十两银子，可换大驼一头；三斗黄米成本六两银子，可换三岁小骆驼一头；到秋后大骆驼一头售价八十两，三岁小骆驼售价二十两，所得利润约在175——232%。更甚者，有的商号用真假作伪的方法欺骗、剥削牧民。我在定远营居住期间，曾听到流传这样的笑话：有的牧民在定远营买了几瓶酒回家。走在沙漠中，天气甚冷，想饮酒取暖。把酒瓶打开以后却倒不出酒来，仔细看，发现酒已冻结了。各商号用各种剥削方法，赚取高额利润，从而积累资金。就以祥太隆来说，开设之初只是个小商号，并没有多少资金。但到了一九〇二年（光绪二十八年）资金就积累到一万八千九百两银子。因此，定远营过去一个时期，商业的繁荣景象，是建立在榨取和剥削广大牧民的基础上的。

（五）

定远营和牧区的广大劳动人民，自清朝直至解放前夕的漫长历史时期中，不仅深受统治阶级和边客商人的压迫与剥削，还历经变乱，遭受过多次战争的祸害。其较大者就有：白彦虎率同回众的扰乱，哥老会的活动，独立队的滋扰，原阿旗的政变与残杀，马鸿逵的蹂躏和压迫，德王（德穆楚克栋鲁普）、李

守信部队^①的流窜与骚扰。

1、回众起义进攻定远营

回民在清朝没有政治地位，不准参加科举，得不到应有的尊重，深受歧视压迫，因而招致回民的极大不满。到了同治初年，陕西各地回民拥戴教主马化龙为首，起而反对清廷，声势浩大，波及西北各地。回民聚居较多的宁夏、同心、金积一带，因连年天旱，人民生活极端困苦。对此，清廷不但不给予救济，反而对回民横加压迫，不许住在城里，不许携带武器，因此激起回民愤怒，聚众暴动。马化龙率队起义后，很快占据了宁夏城、金积堡、同心县^①一带，并以金积堡为据点，一方面防备清兵的进攻，一方面准备进攻定远营。

当时原阿拉善旗执政的扎萨克亲王贡僧吉儒穆德因听信一位协理新达阿拉坦和回族官吏马四主张通款纳和之言，仍旧住在西花园如意堂，不加戒备。另一位协理阿布尔拉因贡王不听他的调练旗民，准备防守的意见，就到苏木图巴格，调集旗兵，加强训练，作抵抗的准备。嗣因马化龙攻打定远营的风声日紧，阿旗官员们甚感恐惶，就派人请阿布尔拉率领训练的旗兵，到定远营布置城防。阿布尔拉还亲到西花园如意堂劝说贡王进城，贡王仍执意不肯。阿以长辈（贡王叔父）身份严词对贡王说：“王爷是你当，又不是我当。你如实在不愿进城防备，甘愿当俘虏，那就把阿旗官印交出，叫你三个儿子跟我一同进城，以便今后继承你的扎萨克王位，好凭印信号令旗众防守。”这样贡王才应允进城。贡王乘车奔到城边，白彦虎的先

^①一九四九年德王在原阿拉善旗成立的伪西蒙古自治政府分裂后，德李率残部曾在阿旗境内流窜、骚扰。

^①宁夏城、金积堡、同心县——依次为今宁夏自治区的银川市、金积县、同心县。

头部队已经到达西花园。白当时纵火焚烧房屋，贡王遥见火光四起，才深自悔悟。阿布尔拉布置防守，严加戒备，在每个城墙垛口上，布置三个士兵，轮流防守，备有台枪、长龙炮等武器，交替发射，防卫进攻。后山营盘及西关一带亦派旗兵防守。并将马四处死，以除内奸。这时定远营附近几个巴格^①的牧民，为躲避战乱，多携带家口，驱赶牛羊，逃至定远营避难。

白彦虎率同回兵万余人到达定远营后，指挥其部众准备攻城。阿旗方面由阿布尔拉的十弟（人称十老太爷，忘其名）率同马陆（回族官吏）前去与回兵讲和，表示愿从牧区征集牛羊供应食用。回兵方面坚持非把城内武器和金银财宝等物全数献出不可。阿旗代表认为条件太苛，要求回城商量，回兵自恃人多势众，认为一攻即下，当将阿旗代表杀死，强行攻城。回兵人数虽然较多，但使用武器仅是长矛、刀枪，没有攻城利器。阿旗方面虽然兵力较少，但有长龙炮、台枪、九节炮等武器，能作短程射击，倚城布防，居高临下，威力较大，因而打退了回兵多次的进攻。回兵屡次攻城不下，留下一部分兵力围城，分兵四出攻掠。到达南寺时，因该寺已组织起喇嘛兵二百多人，严加防守，未能攻破。北寺则疏于戒备，庙被攻破，活佛逃到贺兰山隐避。后经阿木吉尔嘎朗喇嘛突围前往救出，背负到定元营城。阿旗方面虽然以防守为主，但有时也派兵出击。一次派兵七十人出击，回兵佯为退却，故意抛下白酒两车，蒙人素性嗜酒，痛饮大醉，均被回兵拿获。蒙回双方，时而进行激战，时而处于相持状态，因而围城之战，持续甚久。

阿旗方面因带队官德勒格尔达赖阵亡，旗兵也多有伤亡，深恐长期相持，寡不敌众，乃派人突围前往北京，请求清廷迅速发兵救援。清廷初尚不以为意，嗣因回兵挖掘公主灵柩，暴

^①巴格（巴嘎）——蒙语，牧区内的自然村。

尸于外，始引起重视，派遣张曜统兵救援阿旗，回兵向西撤退。定远营之围始解。

2、哥老会在定远营的活动

清朝宣统三年，民间秘密团体哥老会，在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影响下，在各地活跃起来。宁夏哥老会的首领刘华堂、刘复太等也应运而起。宣统三年九月二十九日晚，发动会员起义，杀死清朝派在宁夏城的游击贺明堂，守城都司多伦岱，理事同知文升，宁夏县知县陈元骥等，占领了宁夏省城。由刘华堂主持组织成立军政府于道署内，推孙廷寿为元帅，刘复太为总兵，牛宪章、黄连升为标统，刘照黎为参谋，宁夏县典史张少棠为行军总稽查。

哥老会占领宁夏旧城并组织新政权后，在定远营和贺兰山潜伏的哥老会员，也随着活动起来，与宁夏哥老会遥相呼应。定远营的哥老会首领坐堂大爷张敬铭，也在人民群众中发展会员，编练包扎黑手巾的黑头军，时常向居民显威。显威的方式是聚众开会，当场表演。在开会之前，发动会员要做英雄好汉，要做敢死队，开会时要大显身手。在开会的那天，凡属哥老会会员，必须结成队伍，排成行列，执掌会旗，入场围站，招来群众聚而围观。这时为首的龙头大爷，就出场说道：“现在发现违反会规、做了坏事的一个案件，经详细调查得知是我们会中人干的。干了这案件的人，要做英雄好汉，来坐第一把交椅，向大家坦白承认错误，并自己惩罚自己。”这时，预先动员安排好的人，就从人丛中突围而出，坐在早已备好的第一把交椅上，坦白地、勇敢地承认说：“这件案子是我自己做的。好汉做事好汉当，我要自己惩罚自己三把刀子六个眼，自己挖坑自己埋。”遂即取出三把尖刀，刺穿腿部，这边见刀柄，那边见刀尖。而表演的人却坦然自若，

毫无疼痛之状。博得围观群众，齐声喝采。定远营的哥老会首领坐堂大爷张敬铭，也曾用聚会方式，在南梁上刀砍过违犯会规的一个会员。哥老会经常用这个方法，显示哥老会的威风，显示会员的勇敢，显示会规的严肃，博取群众的好感，吸收群众入会。因此，入会的人愈来愈多，声势也愈来愈大。这给原阿旗统治阶级，以莫大的威胁。

这时宁夏哥老会派人给阿旗政府送信，要一万匹马，五万两银子，二万只羊，并要尽量供应武器，如不按期送到，就要进攻定远营。这时，曾策动义和团起义的端王载漪，为避八国联军的追索，正在定远营隐蔽。他也同情哥老会的行动，暗地与之联络，派他的随从人员苏顺给刘华堂送信，表示愿作内应，献开城门。而苏顺感到阿旗方面相待甚厚，不满端王这个举动，竟将端王之信，送交塔王（塔旺扎布）。塔王对端王甚为不满，但碍于亲谊关系（端王是塔王的妹婿），没有扣押拘禁，只把端王派人送出阿旗境外了事。

塔王虽解除了端王内应之患，但仍感哥老会人多势众，无法抵抗，并因对方要求条件甚苛，无法应付，准备逃往牧区躲避。朱谏师爷和阿木吉尔嘎朗痛陈利害，力谏塔王不可轻易出走，动摇人心。定远营有城可守，广大牧区也有兵可调，应立即调动旗兵，严加戒备，哥老会不过一时乌合之众，必不能持久，终将溃散。塔王采纳了这个意见，迅即调集旗兵，严加防守。又通过在阿旗政府供职的张凤鸣，劝说其弟张敬铭和刘大顺等，前往宁夏讲和作缓冲。不久到十一月间，西军分统马骥带兵前来剿抚。官军进抵灵州^①和宁夏省城后，杀戮甚众。殃及无辜良民甚多。哥老会首领刘华堂、刘照黎等先期率众取道平罗向北路撤退，仅有张少棠一人为马骥搜获杀害。在定远营和贺

^①灵州——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县。

兰山一带的哥老会徒众，从此也就销声匿迹，不敢公开活动了。

3、独立队的滋扰

一九一七年（民国六年）有甘肃静宁县人吴生彦，小名六吉的，是个巫医，自称有神术，又用阴阳家扶乩问吉凶等一套骗术来迷惑群众，一般无知者对之甚为信仰。哥老会首领高士秀、张九才、卢占魁等推为清裔，奉之为主，僭称皇帝。封卢占魁为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高士秀为御林将军，于凌云为军师，自称独立队，兵力竟达上万之多。

独立队由三边流窜至河套地区及蒙旗地区，攻击绥军于乌兰脑包^①，侥幸获胜，得武器甚多，势愈猖獗。蒙旗各王公惧怕他的势大，不敢违抗，纷纷派人去送献珍物马匹。六吉所到之处，供应招待，无所不至。其后卢占魁在河套经某西洋教士的说项，归附绥远官方。六吉用高士秀西进之策，率所余数千，经西山嘴渡河西犯，占据磴口，大肆抢掠。当地人民纷纷逃散，躲避独立队的骚扰。

阿拉善旗的官员阿木吉尔嘎朗（人称安六大人），适在巴力庙附近的家中，为了探明独立队的虚实，好与阿旗政府通风报信，故而没有逃避。独立队到达后，即将阿木吉尔嘎朗拿获，六吉要拉他入伙，作为进攻定远营和宁夏的内线和前驱。阿诡顺其意，曲意逢迎，六吉甚为欢喜，即将阿释放，令其带路进攻定远营。

阿木吉尔嘎朗即暗派他儿子阿音尔英圭，乘快骆驼连夜赶到定远营报告独立队的情况。为了争取更多时间，让阿旗方面作充分的准备，他又以小路崎岖不安全为由，建议六吉折回改

^①乌兰脑包——今内蒙古自治区五原县的乌镇。另外，固阳、武川也各有乌兰脑包一处。依文中所言，当时吴生彦的兵，可能到达固阳武川一带。

走大路（这样要多走二百多里路程）。独立队不明阿旗地理情况，听信了阿木吉尔嘎朗的建议，改走大路向阿旗定远营进发。阿木吉尔嘎朗趁独立队忙乱之际，隐蔽在沙漠杂克（即梭梭树）林中，悄悄地溜走了。

阿旗得报后，积极准备防守。由杨喇嘛亲率旗兵几十人守护后山营盘，还派人驰赴宁夏请求马福祥派兵救援。果然一天傍晚，高士秀率领独立队拥簇着达儿六吉蜂拥而来。屯聚在离定远营不远的庙家梁子一带，致书阿旗政府，要求准许借道赴宁。阿旗当予拒绝。高士秀便将兵分成三队，一队猛扑后山营盘，一队猛扑定远营城，一队猛扑市街。守护后山营盘的旗兵开枪猛打，城上旗兵亦配合射击，又加天气奇寒，朔风凛冽，独立队伤亡甚重，气势大挫。翌晨宁夏马鸿宾又率大军前来支援，独立队乘宁夏军尚未会围之际，弃马登山，恃险抗拒。宁夏军和旗兵联合进攻，用炮轰击，独立队死伤和冻僵的很多。高士秀见势不佳，率领数人潜逃，其余多被俘获。六吉和“皇后”以及兄弟吴玉庆，隐藏在贺兰山稠密松林中，但终被发现拿获，押解宁夏城。宁夏官方对他们给以较好的生活待遇，并用好言劝抚，六吉非常感激，于是把他们起事始末，详尽地作了叙述，长达数万言。军师于凌云、统领苏学奉、卢占魁等十八人，亦被拿获。民国六年五月，六吉等十九人同被处死。经此搔乱，人民遭了灾难，定远营也受到很大的破坏。

综上所述，定远营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解放后，定远营回到人民的手中，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和党的民族政策光辉照耀下，城市的生产建设规模有着突飞猛进的发展。现在，我们自治区西部的这颗珍珠，更加放射着它绚丽多彩的光辉！

一九六四年四月三十日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内蒙古文史资料第十辑

作者 =

页数 = 150

SS号 = 0

出版日期 =

目录
正文